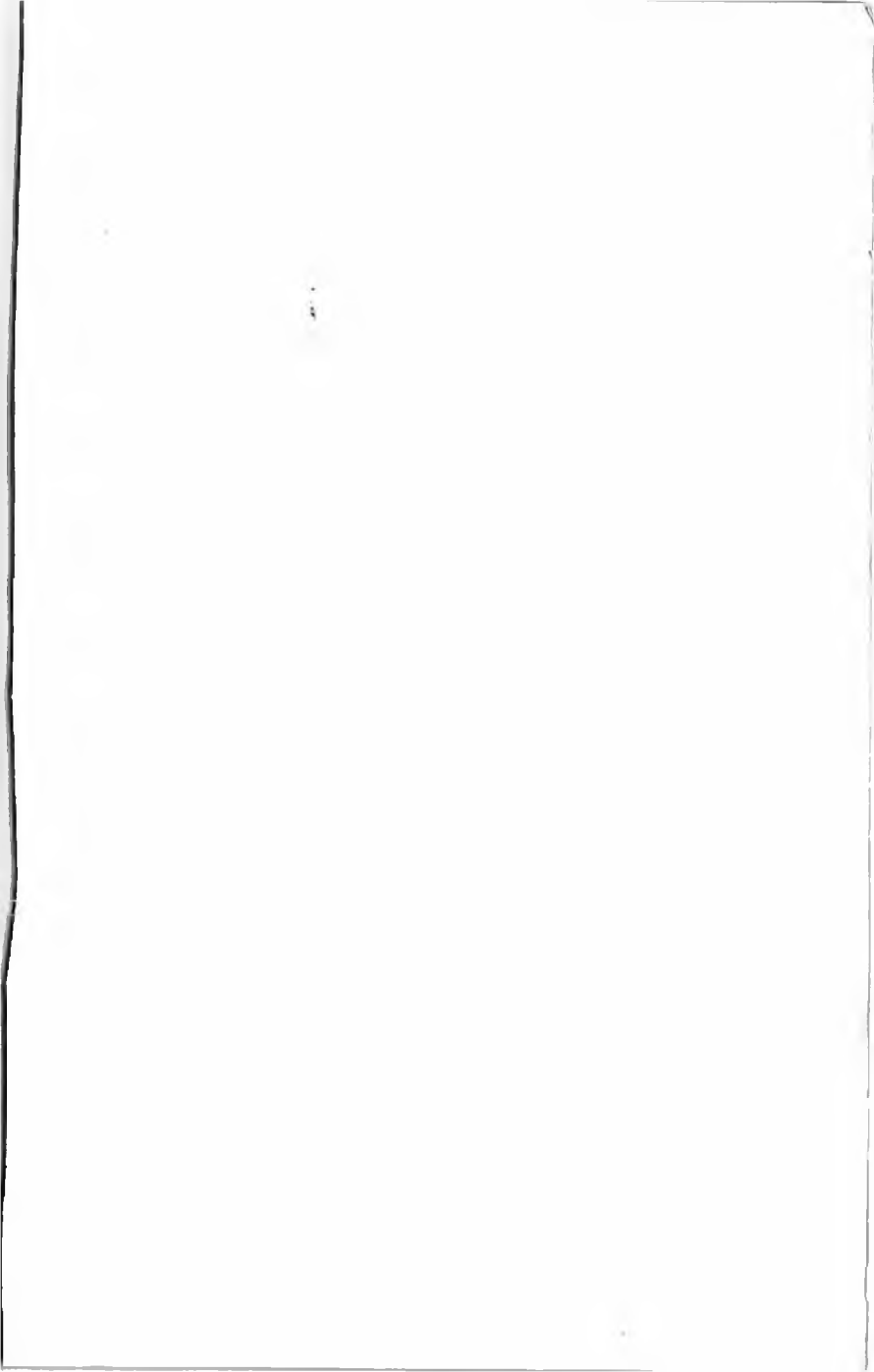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两条路线斗争简史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北京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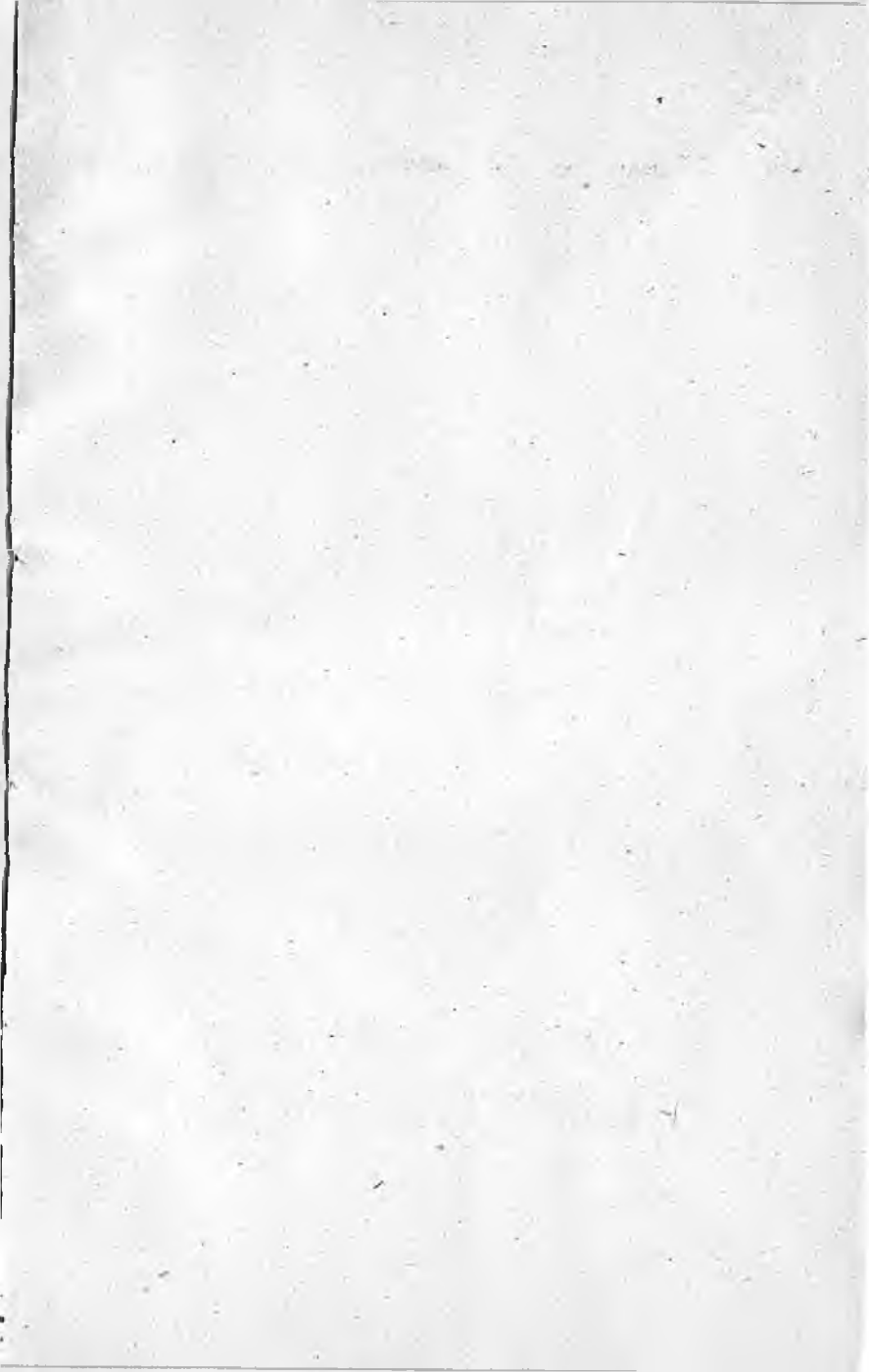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两条路线斗争简史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列 宁 语 录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毛主席语录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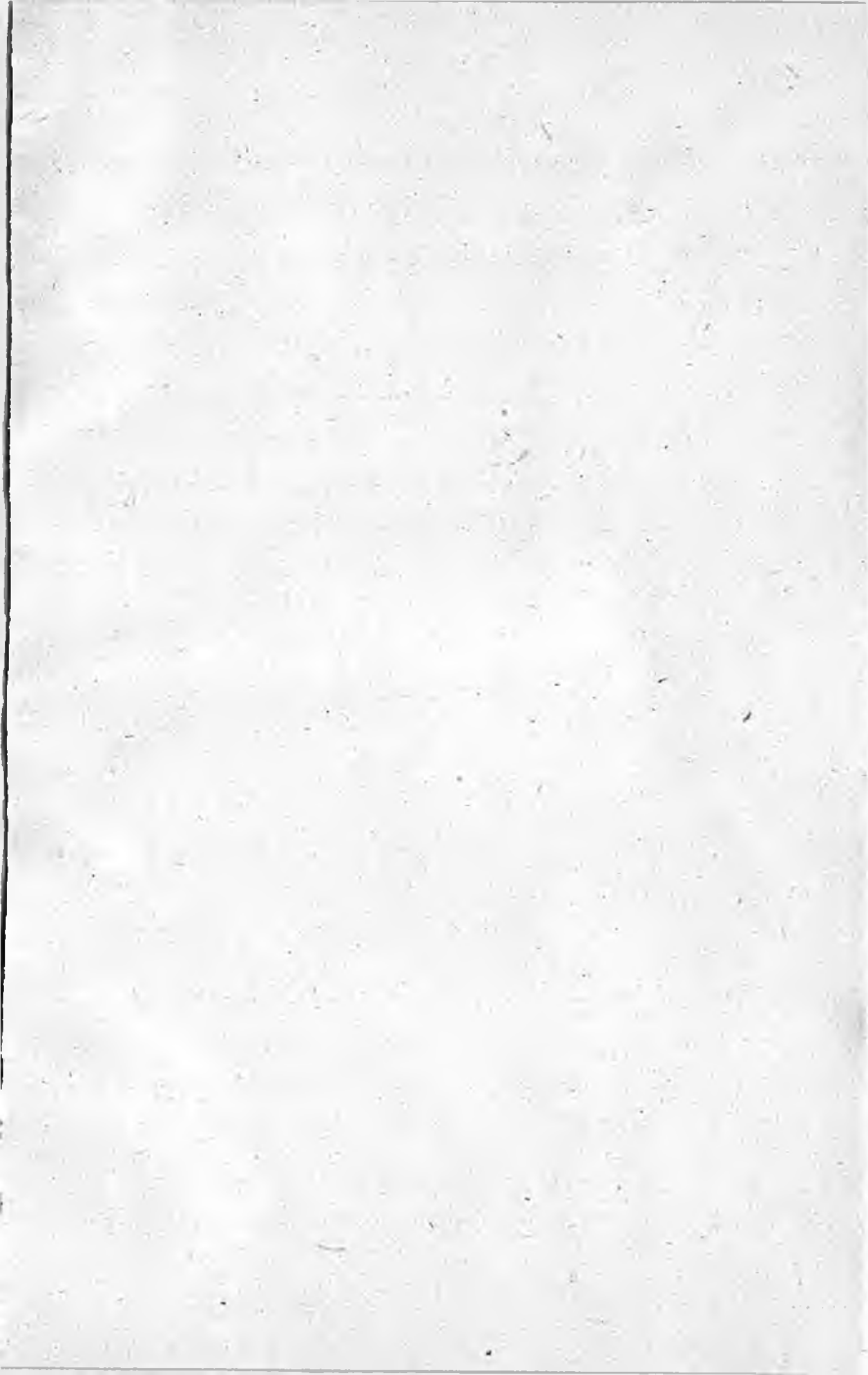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目 录

前 言	(1)
一、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5)
(一)蒲鲁东主义的产生和危害	(6)
(二)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 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 的斗争	(15)
(三)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 关于工人运动的基本路线问题的尖锐斗争	(24)
(四)巴黎公社是蒲鲁东主义的坟墓。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蒲鲁东主义的彻底破灭	(38)
二、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44)
(一)巴枯宁主义的形成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 现	(45)
(二)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集团阴谋篡夺第 一国际领导权的斗争	(58)
(三)马克思主义者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第 一国际的罪恶活动的斗争	(67)
(四)巴枯宁集团的垂死挣扎。马克思和恩格斯 为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的影响而斗争	

.....	(76)
三、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86)
(一)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及其破坏作用.....	(87)
(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路线 和德国统一的道路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 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97)
(三)一八七五年围绕党纲问题马克思、恩格斯 对拉萨尔主义的总清算.....	(105)
(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马克思 主义者反对拉萨尔主义的变种和流毒的斗 争.....	(112)
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	(121)
(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笼和泛滥.....	(122)
(二)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迎头痛击	(131)
(三)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伯 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 孟什维主义的斗争.....	(135)
(四)以列宁为代表的各国左派在国际舞台上反 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146)
五、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155)
(一)考茨基主义的出现和危害.....	(155)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考茨基的社 会帝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和“超帝国主	

义”论的批判·····	(164)
(三)十月革命前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问题上，列宁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	(177)
(四)列宁为建立第三国际、反对考茨基复活第 二国际的斗争·····	(183)
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195)
(一)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生和影响·····	(196)
(二)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201)
(三)列宁逝世前后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反对 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211)
(四)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 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托季反 党联盟被粉碎·····	(218)
(五)各国马列主义者反对托派集团的斗争·····	(229)
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237)
(一)布哈林反党集团的出现和危害·····	(238)
(二)斯大林和联共(布)反对布哈林集团和布 哈林主义的斗争·····	(248)
(三)第三国际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	(261)
(四)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斗争的胜利， 布哈林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267)
结束语·····	(271)



前 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史，实质上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持续斗争的尖锐表现。

马克思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它以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宇宙观，观察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它为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战斗的必胜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一百二十多年前，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一诞生，就引起了世界资产阶级的无比仇恨和恐惧，他们不惜使用一切卑鄙手段，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扑灭马克思主义，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稳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保住他们任意剥削和宰割劳动人民的天堂。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根源。

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大约半个世纪，即第一个五十年中，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时期，资产阶级为了达

到自己的目的，曾通过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如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之流，制造出这样那样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另树旗帜，直接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从而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斗争方向。当资产阶级的这一套表演归于失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胜利，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以后，资产阶级并未就此罢休。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开始，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时期，他们改变手法，又通过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制造出种种借口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妄图使马克思主义徒具虚名，实际上变成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从而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

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我们还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反对和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管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另树旗帜，直接对抗马克思主义，还是乔装打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实际上都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来代替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他们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生产力论和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要用他们炮制的种种假社会主义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用阶级调和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所炮制的谬论对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起过极大的破坏作用，有的还曾经迷惑和俘虏过一些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并导致他们犯过路线错误；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地方，则被用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在组织上搞招降纳叛，搞分裂活动，在手法上搞阴谋诡计等等，更是屡见不鲜。然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不可战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玩弄的这些花招，有时虽能得逞于一时，但最后总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领导的反击下遭到破产。

在阶级消灭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两条路线斗争必将长期存在，始终不息。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以苏修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经常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吸取思想理论武器。可见，在当前重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批判和战胜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到彻底胜利。

这本简史，是在我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于一九七三年毕业实践中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历史资

料》的基础上改写成书的。书中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逐一做了介绍，这可能更有利于读者比较集中地了解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主要反动谬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它们斗争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改写得也比较仓促，书中一定会有缺点错误，切望同志们给予帮助和批评。

一、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蒲鲁东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产生在法国并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之一。

蒲鲁东主义是其创始人蒲鲁东剽窃和承袭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蒲鲁东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影响较大的机会主义头子。

蒲鲁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一条改良、倒退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路线，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根本和工具”是建立交换银行，对小生产者提供无息贷款，建立小生产者间的公平交易市场等等；宣称要建立一个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无政府、无政党、无冲突的“社会主义”社会。蒲鲁东主义的这一套主张，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它直接阻挠和破坏着刚刚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六十年代第一国际（简称国际）前期，蒲鲁东主义者猖狂向国际进攻，力图把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因而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蒲鲁东主义给国

际工人运动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叶至七十年代初进行了将近三十年之久的长期斗争。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彻底埋葬了蒲鲁东主义。

(一) 蒲鲁东主义的产生和危害

蒲鲁东主义的创始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出身于法国柏桑松城郊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农民兼木桶匠，曾经打算开设一个木桶作坊；但是，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债台高筑，无法实现，后来连土地也卖掉了。在家庭破产后，蒲鲁东十二岁就到柏桑松的一家旅馆当佣工；后来依靠朋友的帮助，进中学读了几年书，没有毕业又被迫到一家印刷厂当了排字工人。他为了谋生曾到过法国的许多城市，以后又回到柏桑松和别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小印刷所，但很快就因资金不足而倒闭。蒲鲁东家庭和个人的遭遇，使他深切感受到：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一种每况愈下和不断破产的境地。蒲鲁东通过业余自学读了不少书，受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很深影响。

蒲鲁东从小资产者所处的阶级地位出发，“既迷恋于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页），因而怀着个人成名和充当社会救世主的欲望，自一八三七年就开始写作。一八四〇年，他发表了《什么是财产？》一书，申述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点，使法国人大为惊讶，引起社会的广

泛注意。蒲鲁东为了赢得更大的声望，在一八四六年十月出版了自命不凡的两大卷著作《贫困的哲学》。在这部书中，“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恩格斯：《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69页）后来，蒲鲁东还陆续写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八四八）、《一个革命家的自白》（一八四九）、《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八五一）等许多著作，高傲狂妄地、大吹大擂地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

马克思在评论蒲鲁东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4、147页）；他在科学上搞招摇撞骗，在政治上搞投机，都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象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8页）。针对蒲鲁东的大吹大擂和招摇撞骗，恩格斯形象地讽刺说：“他那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总是同他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例”（《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2页）。这些是对蒲鲁东一生的盖棺论定。

蒲鲁东主义的主要反动谬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英雄史观。蒲鲁东从小资产者的立场出发，为了突出个人，竟从头脑里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并把它宣扬为救世的灵丹妙药，

这样，他必然只能信奉和求助于唯心论的先验论以及反动的英雄史观。“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3页）。他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看作是观念的历史。蒲鲁东说，他所考察的历史，“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见《贫困的哲学》）。他认为，这些观念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即所谓“社会天才”创造的，或是“上帝启示”（见《贫困的哲学》）的结果，而人民群众只“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转引自《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2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蒲鲁东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蒲鲁东就以这种有本事的学者自居，狂妄自大地对以前的一切权威“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恩格斯：《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70页）。这正是他的反动唯心史观的大暴露。

第二，顽固地维护小私有制，竭力主张建立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蒲鲁东力图保持小资产者的太平盛世，他从这种主观愿望和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把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独立”说成是“人类普遍理性”的

最高要求，把维护小生产私有制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贫富不均，违反“平等”原则，而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则是违反“自由”和“独立”原则的。因此，他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和创立一个综合“平等”和“独立”的、超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就是蒲鲁东“恩赐”给人类的“伟大”救世良方，即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蒲鲁东幻想：在这个美妙的“互助制”社会里，每个人制造出的产品，既可以自己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这样，小资产者所理想的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参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页）。恩格斯指出：“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是完全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幻想”，“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1、530页）。这是妄图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

第三，宣扬改良主义，鼓吹建立“人民银行”是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而在于货币、借贷资本、利息的统治与剥削；正是这些交换关系破坏“永恒公平”，阻碍劳动者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因此，他主张由劳动人民入股建立“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协助工人开设合作社、作坊和小工厂，逐渐地使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都变成小业主；同时“人民银行”还收购一切产品，发给劳动者一种证券，作为劳动货

币，劳动者就凭这种证券进行产品交换，取得自己需要的其它产品。在蒲鲁东看来，这样通过“人民银行”进行有组织的、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就可以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消除掉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病，给社会带来平等，保证生产者的“独立”和“平等”；另外，通过“人民银行”协助工人变成小业主，又可以逐步把国内的所有生产资料收买到工人手里来；这样便实现了他所理想的“互助制”社会。（见《社会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蒲鲁东“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因此，“他的整个银行制度，他的整个产品交换制度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8页）

第四，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蒲鲁东从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法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1）资产阶级；（2）中等阶级（小资产者）；（3）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庸之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65页）。因此，他极力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鼓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提高认识，携手合作”（见《贫困的哲学》），反对无产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斗争，特别反对无产阶级从事暴力革命。他不仅公开叫嚷工人“决没有他们所指望的结社权”，工人“罢工是非法的”（见《贫困的哲学》）；而且丧心病狂地赞成反

动政府用暴力镇压罢工，屠杀工人。他诬蔑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是“诉诸霸道”（见《给马克思的信》·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七日）；并起劲地鼓吹革命应该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为了胜利不应该损伤哪怕一个公民的头上的一根头发”（见蒲鲁东一八四九年一月在国民议会的演说）。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所谓“平衡”，就是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永远维持有产阶级的统治，使无产阶级永远遭受剥削与压迫。这是十分反动的。

第五，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鼓吹无政府主义。蒲鲁东认为，国家是由家长制传统和宗教思想产生的，“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见《一个革命家的自白》）。所以他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政党，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府”（见《一个革命家的自白》）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他说：“没有政权，没有政府，哪怕是最人民的政府，——这就是革命。”（见《一个革命家的自白》）这表明蒲鲁东是极端仇视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蒲鲁东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主张，是从施蒂纳那里承袭来的。马克思指出：“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词藻。”（《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一年八月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22页）蒲鲁东虽然吸取了

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词藻，到处兜售无政府主义，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泰然自若地忍受法国专制制度的反动统治。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既对现存的政权不满，想否定它；又惧怕它，并对它存有幻想，因而俯首帖耳地服从它。

概括说来，蒲鲁东主义的核心，就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和复旧倒退，实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他妄图逆转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退回到单独生产、手工劳动的状态中去，也就是幻想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480页）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0、483页）。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为了实现这种反动幻想，蒲鲁东“诉诸资产阶级”（《恩格斯致马克思》，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4页），力图缓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幻想依靠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他先验地构想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结果客观上只能起保存和“健全”资

本主义社会的作用,使无产阶级永远受资产阶级的奴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恩格斯致马克思》·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4页)。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又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总之,“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一年八月十四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29页)。

蒲鲁东主义产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泛滥于五十至六十年代,对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运动都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这些都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在法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发展后进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还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法国为例,直到一八六六年,首都巴黎的全部四十四万二千多工人中,在大企业做工的还不到五万人。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小农和手工业者陷于破产和濒于破产。这些小生产者既饱尝了资本主义发展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和疾苦,更惧怕落入无产者的行列,因此,他们非常渴望免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保持或恢复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幻想有一个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和平盛世。蒲鲁东炮制的一整套改良主义思想和计划,正适应了这些小生产者的要求,代表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反映了他们的主观愿望;同时,在客观上也符合了希望在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消除某些资本主义弊病的资产阶级改良家们的要求。这就是蒲鲁东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

和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

当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阶级斗争日趋激化，反映各个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思想观点在社会上百家争鸣，其中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改造社会的思潮。所以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家们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招牌，企图鱼目混珠，把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在法国比较流行，而且在西欧其他许多国家中也普遍泛滥。蒲鲁东主义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广泛流传，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席卷欧洲大陆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政治上的反动笼罩了整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相勾结，扼杀民主，镇压无产阶级，“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页），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特别在法国，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非常猖獗，无产阶级受到严重的摧残。这种反动形势也为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计划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造成了条件和机会。所以恩格斯称蒲鲁东是“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91页）。

蒲鲁东主义的传播和影响，给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危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

迷惑和毒害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因此，“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必须断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蒲鲁东主义决裂。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对蒲鲁东主义的荒谬性与反动性积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经历了三个时期：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的斗争；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路线问题的尖锐斗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蒲鲁东主义被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彻底埋葬。

（二）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的斗争

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方迅速发展，各国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无产阶级遭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不断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愈趋尖锐化，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不仅成为社会上广泛注意的问题，而且也

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激烈争论的尖锐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指明了解放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之下，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进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而蒲鲁东主义则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妄图把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因此，围绕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西欧工人运动相结合，进行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准备工作，引导各国无产阶级走上解放的革命道路，在一八四六年春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五月五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蒲鲁东，邀请他参加该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并担任法国的通讯人，希望以此来争取、教育、帮助他抛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但是，蒲鲁东立即回信表示拒绝合作，声明坚持他的和平的改良主义路线，并恶毒攻击和诬蔑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他狂妄地叫嚷说：“我认为并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胜利”；“我们决不应该把革命的行动看作是社会革命的手段，因为这种所谓的手段只不过是诉诸暴力和霸道，简单地说，是制造矛盾”；“依我看来，用一种缓慢的火烧毁财产，总比对财产所有者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好些”（见《蒲鲁东给

马克思的信》·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七日)。这充分暴露了蒲鲁东主义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根本对立。

蒲鲁东主义的这套改良主义的反动谬论，不仅对法国工人运动有严重的危害，而且影响了当时旅居巴黎等地的德国侨民中的一些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推崇和吸取蒲鲁东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并盘踞在“正义者同盟”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控制的国际性工人组织中，用保存小私有制的反动幻想和虚伪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口号，诱骗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离开革命道路。蒲鲁东主义者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勾结在一起，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妄图阻止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解放道路，破坏日益兴起的欧洲工人运动。

为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引导欧洲工人运动循着革命的道路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同时，也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一八四六年八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亲自到了巴黎，立即和蒲鲁东分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恩格斯在“正义者同盟”的许多次大会上，尖锐地抨击了蒲鲁东之流宣扬的用工人储蓄来建立作坊，维持小生产私有制，并进而购买整个法国的异想天开的改良主义计划。恩格斯说过，巴黎工人平时要维持最低的生活都很困难，那里还谈得上储蓄，除非能用白色月光铸造出一个个五法郎的硬币，才能实现蒲鲁东的梦想。有一次大辩论连续进行了三个晚上。针对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恩格斯在论战中明确阐明共产主义者的宗旨是：“（1）维护同资产者利

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恩格斯还揭露了蒲鲁东抱怨和攻击革命的原因，是“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六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页）。这就给了力图维护私有制、大肆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蒲鲁东主义以迎头痛击。经过斗争，使在巴黎受蒲鲁东主义影响的“正义者同盟”的大多数盟员都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可是，高傲的、自命不凡的蒲鲁东又在一八四六年十月抛出了《贫困的哲学》这本“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5页），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他那套改良主义的反动谬论，并直接向马克思挑战，说什么“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3页）。

为了反击蒲鲁东的挑战，针锋相对地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散布的各种谬论，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写成《哲学的贫困》这一重要著作，并于七月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批判了蒲鲁东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的反动谬论，揭示了作为新社会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伟大世界历史使命，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道路。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必定会由自在的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因此，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马克思就是这样明确地说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揭露了蒲鲁东改良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基本矛盾的对抗性和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而形而上学地把辩证运动机械地划出好坏两方面；他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0页）。这是企图用对立面的调和来代替对立面的斗争的反动谬论。马克思认为，发展就是矛盾斗争的辩证运动，矛盾是不能调和

的，调和矛盾就是取消辩证法，就是取消发展的历史运动。蒲鲁东正是利用这种形而上学的调和论来为其改良主义谬论辩护的。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好坏两方面，解决的办法就是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用他的组织生产、销售、信贷合作社等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弊病，从而实现小生产者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企图用改良主义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反动幻想。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证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和苦难的真正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要这种制度还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说：“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页）。因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所以会陷入这种“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诡辩论泥坑，是由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他是一个小资产者，“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那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这就戳穿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反动实质。

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献，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宣言”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和实现其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根本道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宣言”把蒲鲁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加以批判，指出：蒲鲁东的消除社会弊病的改良主义“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而是“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0页），“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0页），“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0页）。这就深刻地揭露了作为小资产者代表的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药方，实质上起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反动作用。

《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表，就爆发了席卷欧洲大陆的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次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是主力军，他们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同资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大搏斗，经受了锻炼；同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也做了充分的表演，接受了检验。

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热情赞扬法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亲自领导德国无产阶级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他们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应该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牢牢掌握武装，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坚持不断革命，直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工人阶级专政。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

蒲鲁东极端害怕群众革命运动，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暴力

革命，就在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前几个星期，他还狂叫：“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当革命冲破庸人蒲鲁东的和平梦想而到来的时候，他不是接受教训，与人民群众一道投入革命斗争，而是继续顽固地坚持其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道路。蒲鲁东在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书，提出了他的社会改良计划，鼓吹建立“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相对抗。二月革命后，他先后主编过《人民代表报》、《人民报》、《人民之声报》；一八四八年六月他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他通过报刊和议会讲坛，继续鼓吹其改良主义空想方案。然而，即使蒲鲁东的这些点滴改良的建议，在资产阶级看来也是危险的。资产阶级政府连续封闭了他主办的报纸，国民议会否决了他的“人民银行”方案。于是蒲鲁东就宣布自己发起组织一个股份“互助协会”，发行一万二千张股票（每张面值五法郎），号召工人和小生产者购买这种股票，以建立“人民银行”。他吹嘘说，只要这个人民银行开张，就可以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这样就可以“改变劳动对资本的态度”。一些觉悟不高的工人曾经一时受骗，购买了蒲鲁东的股票，幻想得到无息贷款。实际上这个“人民银行”只筹办了两个月左右，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就在一八四九年二月被迫宣布关闭。蒲鲁东在告工人书中辩解说，由于政局恶化，路易·波拿巴篡夺了政权，才使他的“人民银行”无法正常营业。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的这条通过“人民银行”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反动幻想，是

根本无法实现的；客观上只能是一条诱骗工人群众背离革命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可耻道路，是帮助资产阶级扼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反动道路。

“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嚣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一八四八年革命证明了蒲鲁东机会主义的改良道路是极其反动、极其有害的幻想；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蒲鲁东政治上日趋堕落，思想上更加反动，敌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面目充分暴露。一八四九年四月，他因反对路易·波拿巴被判处三年徒刑。可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波拿巴发动政变后，他却在狱中写了一本名叫《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的变节的书，公开指责革命派，可耻地向波拿巴献媚投降，妄想依靠波拿巴来实现他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方案。马克思愤怒地斥责蒲鲁东的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此后，蒲鲁东又发表了许多著作，继续鼓吹他的改良主义计划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疯狂反对工人运动和意大利、波兰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极力为资产阶级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辩护。这些可耻的言行，充分暴露了蒲鲁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反动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继续坚定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他们不顾反动派的迫害和生活

上的贫困，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积极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在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一系列光辉不朽的著作，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科学地总结了法、德等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全世界无产阶级。

（三）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基本路线问题的尖锐斗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各国无产阶级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迫切要求加强国际团结，统一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八六四年九月，在高涨的工人运动推动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简称国际）。“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

主义的宗派”（《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马克思经过斗争亲自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制定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因此，“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395页）。当时在国际内部，影响较大、猖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

虽然蒲鲁东在国际建立后不久即一八六五年一月就死了，但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以昂利·路易·托伦（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年）为首的他的党徒们继承了下来。他们顽固地坚持蒲鲁东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利用其参加了国际创建工作的有利条件和自己控制的国际巴黎支部，公然拒绝执行国际的革命路线，妄图把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把国际工人运动引上投降主义道路。因此，蒲鲁东主义成了第一国际前期（一八六四——一八六八年）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主要危险。马克思指出：“我认为，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致路德维希·毕希纳》·一八六七年五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6页），“特别是必须防止可

能把我们的协会引到片面性的道路上去的任何表现”（《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1页）。可见，粉碎蒲鲁东主义，捍卫国际的革命路线，引导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革命道路胜利前进，已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战斗任务。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在一八六五年的伦敦代表会议、一八六六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一八六七年的洛桑代表大会和一八六八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公开进行的；斗争的内容已经从理论上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转到实践中关于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路线问题，其实质是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国际的领导权问题；关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关于所有制问题。

第一，关于国际领导权问题的斗争

第一国际成立后，蒲鲁东主义者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立即展开了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蒲鲁东主义者阴谋篡夺国际领导权采取的第一个手段，是进行宗派分裂活动。他们盘踞在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拒不服从总委员会的正确领导，拒不执行国际的革命路线，拒不缴纳会费，大搞独立王国。他们还于一八六五年秋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法国人支部，“事实上是反对派的支部”（《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一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2页）。这个支部的创始人勒·吕贝、韦济尼埃同在布鲁塞尔的整个

一伙蒲鲁东主义者相勾结，在比利时的报纸上发表匿名文章，恶毒诽谤总委员会，并抛出了他们另行制定的原则宣言和章程草案。这个草案反映了蒲鲁东主义者和某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联邦主义观点，妄图把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化为乌有，使总委员会变成只具有通报和统计这些纯粹技术性职能的简单的代表机关。他们企图以这个支部的名义，把他们的草案提到代表大会上去，强使国际接受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总委员会及时识破并彻底粉碎了他们的这一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使这个支部“抛开了它的创始人”（《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三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95页），转而宣布拥护国际总委员会。

蒲鲁东主义者阴谋篡夺国际领导权采取的另一奸险手段，是借口反对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及其战友，妄图把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排除出总委员会的领导，进而实现其篡夺领导权的罪恶目的。早在一八六五年春季，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已经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鼓吹的只有工人才能成为第一国际支部负责人员的错误观点，并在有关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坚决反对只有 Ouvrier [工人] 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91页）。但是，蒲鲁东主义者顽固坚持这一反动观点，在一八六五年九月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上，他们仍然提议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他们胡说什么：国际应当是一个手工业性的、纯粹行会性的社团，它仅仅具有与脑力劳动者毫不相干的职业上的目的。这一提议除了反映蒲鲁东主义者的狭隘的行会意识外，其罪

恶用心主要在于妄图排斥马克思的领导。会议否决了蒲鲁东主义者的提议，挫败了他们的这一险恶阴谋。

在一八六六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第一国际的共同章程时，法国代表、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弗里布尔又一次提出被伦敦代表会议否决了的反动提议。他们声称，必须把国际的会员资格限定为体力劳动者，或者无论如何也只允许体力劳动者作代表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大会的多数代表坚决批判并否决了蒲鲁东主义者反复提出的这一别有用心反动要求。他们在发言中强调说，国际本身的存在就有赖于许多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他们特别称赞了马克思的功绩。作为对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荒唐建议的抗议示威，英国代表在日内瓦大会闭幕后不久，要求任命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主席，马克思婉言谢绝了这一要求。他在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杜邦使我识破了托伦和弗里布尔的行为。他们从只有工人能够代表工人这一‘原则’出发，企图在1869年当立法团的工人候选人。因此，由代表大会来宣布这个原则，对这些先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6页）这就揭穿了蒲鲁东主义者再三坚持这一反动主张的可耻政治目的。

第二，关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的斗争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斗争的另一中心问题，是关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

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已经明确地规定了第一国际的性质和任务：它的性质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

织，它的任务是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

但是，蒲鲁东主义者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篡改第一国际的性质和任务，妄图把国际变为推行蒲鲁东机会主义路线的工具，进而把高涨的国际工人运动引上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道路。

第一国际一八六六年九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就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的一次大会。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大会，企图把蒲鲁东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大会，从而实现其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的阴谋。为此，他们狂妄地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充满蒲鲁东主义教条的所谓《备忘录》。在这个共有十项原则的《备忘录》中，他们公开兜售蒲鲁东反对罢工、反对妇女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谬论；极力鼓吹建立合作社、确立平等交换原则、通过和平途径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蒲鲁东主义的“灵丹妙药”；并胡说什么国际的任务是研究“经济问题”，“本协会的宗旨在于为会员在本国和欧洲各国寻找职业，协会将在世界各地设立联络局，联络局应尽可能开设商店，协会会员可以通过这些商店等价地交换商品”。显然，蒲鲁东主义者抛出的这个《备忘录》，是一个反国际的反革命纲领，是向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公开进攻。

马克思由于从事《资本论》第一卷最后定稿的紧张工作，无法离开伦敦去参加日内瓦大会。但是他非常重视这次

代表大会的召开，并为这次大会作了重要的组织和思想的准备。马克思预见到大会将有激烈的斗争，所以在会前写好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大会主要议程的正确决议的基础。“指示”规定了各国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提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确定了工会和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革命任务；主张吸收妇女和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坚持支援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反对掠夺性战争及其工具——常备军而斗争。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制定的国际的具体行动路线，是与机会主义路线针锋相对的。马克思在“指示”中着重批判了蒲鲁东派鼓吹合作制度是救世万能手段的空论主义，明确指出：合作制度“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合作劳动制度，“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掌握武装，进行暴力革命。因此，马克思认为：“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8页）。

马克思的“指示”与蒲鲁东主义者的《备忘录》，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和对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在日内瓦大会上，拥护国际路线的代表以马克思的“指示”为武器，在所有的主要议程上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否决了他们《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各项错误原则，通过了各项正确决议。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粉碎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击败了他们妄图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

的罪恶阴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蒲鲁东主义者并不甘心于自己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的失败。他们又利用各种手段，纠集多数，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召开的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的反扑，企图强使大会重新讨论和修改日内瓦大会的决议。在他们的操纵下，虽然大会通过了一些反映蒲鲁东主义观点的关于信贷和人民银行的决议；但是由于马克思的拥护者坚持斗争，终于挫败了他们妄图推翻日内瓦大会决议的阴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绝对必要的事情”。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首先参加政治斗争。决议规定：“每年都要重申这种主张。”这是对一贯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的蒲鲁东主义的沉重打击。

洛桑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斗争的决议表明，在关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这一根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斗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其中波兰、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更加激起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强烈同情和积极声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便成了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奉行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坚持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工人阶级，明确指出，

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再次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5页）。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争论的真正中心是波兰问题”（《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一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2页），即如何对待一八六三年爆发的波兰人民反对沙俄野蛮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时“欧洲工人一致宣称恢复波兰是自己政治纲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最能表达他们对外政策的一种要求”（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0页）。而蒲鲁东主义者却顽固地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蒲鲁东本人在一八六三年所写的反对波兰的著作《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代表大会的决议书》中，公开表示反对修改俄、普、奥等国在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上作出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反动决议，竟然为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指责欧洲民主力量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马克思痛斥了蒲鲁东的这一卑鄙行径，指出这是“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在一八六五年九月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上，就是否应把波兰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马克思主义者同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国际讨论波兰问题，他们认为波兰问题与无产阶级无关，无产阶级只需要关心“社会革命”，不需要注意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经过斗争，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使会议讨论了“俄国佬

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把“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这一要求列入下年度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这表明，第一国际从诞生时起，在波兰问题上就坚持了正确立场。

一八六五年伦敦代表会议后，在国际总委员会里，围绕着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继续进行着斗争。为了阐明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一八六六年春季写了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重要文章。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反复论证了波兰独立的恢复必将沉重地打击以沙俄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促进整个欧洲的革命民主运动，并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国际工人阶级必须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恩格斯痛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在反动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掩盖下，在波兰问题上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一方面“充当被压迫的波兰的审判官”，“宣判波兰是‘罪有应得’”（《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页），另一方面却“称赞俄国是未来的伟大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国”（《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页）；指出，这是欺弱媚强的可耻行径，是“与大多数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背道而驰”（《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页）的。同时，恩格斯还针对蒲鲁东主义者诬蔑第一国际支持波兰解放的正确立场是什么遵循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的反动谬论，深刻地揭露了沙俄和法国反动政府利用所谓“民族原则”来吞并弱小民族、扩张领土的险恶用心。他指出：“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

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7页）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这种为侵略扩张打掩护的反动“民族原则”。

一八六六年夏季，国际总委员会连续举行会议，讨论当时正在进行的普奥战争问题。当讨论归结到“民族特性”问题和国际对该问题的态度时，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又趁机宣扬其民族虚无主义，散布其否定民族解放运动的谬论，公然胡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他们主张各个地方的居民都组成自治的小“团体”，然后由这些小“团体”结合为“联合会”，但并不是国家。马克思讥讽了他们的这些无政府主义反动空想，说：“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相互性’向前发展的同时，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我们的跟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页）马克思还揭露了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这一谬论的沙文主义反动本质，指出他们实际上是“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页）。可见，蒲鲁东主义者的这种谬论，完全是为法国反动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效劳的。

鉴于蒲鲁东主义者顽固地反对即将于一八六六年召开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波兰这个所谓“纠缠不清的民族问

题”，马克思在会前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再次论证了支持波兰恢复民族独立的必要性。他明确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反动堡垒，“只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就会使这个强国真正被摧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页）。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击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否决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通过了《关于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复兴民主波兰》的决议。这个决议充分显示了第一国际在民族问题上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立场。

第四，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斗争

所有制问题即是否废除私有制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的问题。它关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第一国际的根本方向。这个关于是否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长期斗争的一个原则问题。

马克思主义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决主张消灭一切私有制，使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条件。

蒲鲁东主义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地力图永远保存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及其商品生产的所有权，疯狂地反对科学共产主义关于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蒲鲁东主义的这种反动倒退主张曾讥讽地说：“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644页注②）

第一国际前期，由于一八六六——一八六七年经济危机的严重侵袭，欧洲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加深，农业衰退，投机盛行，食品价格空前上涨，工人群众急剧贫困化，这就促使觉悟的工人进一步意识到私有制的危害性。因此，在一八六七年召开的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当时，比利时代表德·巴普还建议把土地交给集体所有。这正触犯了顽固地维护小私有制的蒲鲁东主义的要害，引起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的头目托伦跳出来大肆宣扬个人所有制的优越性，狂妄地声称：“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大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由于赞成和反对的双方相持不下，大会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下一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

洛桑代表大会虽然没有解决得了所有制问题，但是这场大辩论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派在国际舞台上就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的第一次交锋。这次交锋具有重大的意义，即在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与蒲鲁东机会主义路线的界限，促进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加速了蒲鲁东主义的破灭。马克思说：“我早就确信，社会革命必须认真地从基础开始，就是说，从土地所有制开始。”（《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一八六八年四月六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7页）洛桑大会的争论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社会革命的基本观点，正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逐步获得胜利。

一八六八年九月六——十三日，第一国际在布鲁塞尔召

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在讨论洛桑大会遗留下来的关于所有制问题时，德·巴普提出关于金属矿、煤矿、运河、铁路、电讯、森林和土地实行公有化的决议草案。蒲鲁东主义者仍然顽固地反对土地公有化的建议，认为这是对私有制的空前未有的侵犯，并诬蔑它是“粗暴的共产主义”。托伦再次声嘶力竭地叫嚷：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最主要的前提”。会上，赞成集体所有制的代表纷纷批驳了蒲鲁东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诬蔑和反对废除土地私有制的谬论。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指出，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过渡到土地的集体耕种，才能消灭剥削，才能采用科学技术消灭农业的落后状态，减轻农民的繁重劳动，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大会经过激烈的论战，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关于实行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决议。这是对蒲鲁东主义思想体系的致命打击。它表明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远大目标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布鲁塞尔大会还根据德国代表的提议，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感谢马克思出版了他的巨著《资本论》，号召各国工人学习和掌握这部伟大著作中的理论。这个专门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经过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不仅使蒲鲁东主义者遭到彻底失败，而且也促进了其内部的分化，出现了以瓦尔兰为首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他们日益接近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和领导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从此，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逐渐下降。

(四) 巴黎公社是蒲鲁东主义的坟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蒲鲁东主义的彻底破灭

蒲鲁东主义虽然在第一国际内部被击败了，但是它对法国工人运动仍然有相当的影响。进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由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特别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实践，进一步暴露了蒲鲁东机会主义路线的荒谬和反动，验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从而使蒲鲁东主义遭到了彻底的破灭。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无产阶级奋起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卖国投降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巴黎公社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曾经积极支持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然而由于当时在第一国际巴黎支部中蒲鲁东主义者还有相当势力，所以在巴黎公社的领导机构中蒲鲁东主义者为数不少。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选出的六十四名公社委员中，蒲鲁东派及其追随者有二十二名，约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为布朗基派、雅各宾派和无党派人士）。蒲鲁东派又分为左派和右派。左派为瓦尔兰、弗兰克尔等人，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也犯了不少错误。右派为贝累等人，鼓吹什么“劳资团结”，妄图建立“劳资协定”，他们对

资产阶级节节退让，犯下了滔天罪行，对巴黎公社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至于蒲鲁东派的首脑托伦，在一八七一年二月曾经作为巴黎工人的代表被选为法国投降派控制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期间，他公开叛变，跑到梯也尔匪帮的巢穴——凡尔赛去帮助阶级敌人绞杀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批准了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关于开除叛徒托伦的决议。

蒲鲁东派在公社时期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和自治，反对公社建立集中的领导和坚强的专政；他们鼓吹“仁爱”和人道主义，反对向凡尔赛进军和镇压反革命；他们坚持蒲鲁东主义的社会改良药方，反对废除私有制和没收法兰西银行。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是根本对立的，是同当时公社革命群众运动的客观要求和革命实践相抵触的，因此，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鲁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的尝试却一点也不曾做过。”（《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恰恰相反，公社所实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措施，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公社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废除面包工人的夜班制，禁止工厂对工人罚款，没收停工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生产协会等法令；“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这是由于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影响，由于汹涌澎湃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创造力冲破了错误理论的束缚的结果。“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

而这却是公社覆灭的一部分原因。”(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由此可见，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宣告了蒲鲁东主义的破产，“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实践。在巴黎公社失败的第三天，马克思就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光辉著作，歌颂了巴黎工人的英勇气概和首创精神，驳斥了阶级敌人对公社的攻击和诽谤，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批判了蒲鲁东主义。从此以后，蒲鲁东主义在法国工人中间就逐渐绝迹了，“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

一八七一年以后，随着革命中心由法国转到德国，蒲鲁东主义的余孽在德国还得到回光反照的反映。一八七二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上发表了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兜售蒲鲁东主义的黑货。作者是蒲鲁东的信徒、医学博士米尔柏格。他针对当时德国工业迅速发展，住宅紧张的情况，提出“改革”社会的方案，鼓吹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把每个房客变成自己住宅的主人，把整个社会变成“独立和自由的房主的总和”。这个方案的实质是企图把社会拉向后退，使无产阶级变成拥有小住宅、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小私有者，重新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显然这是极端反动的。

为了及时肃清蒲鲁东主义的流毒，恩格斯在同年写了

《论住宅问题》的长篇著名论文，迎头痛击了蒲鲁东信徒的反动谬论，戳穿了他们妄图把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和阻止德国工人运动向前发展的罪恶用心，揭露了这些浮到表面上来的社会骗子的真面目。恩格斯指出，米尔柏格之流要使现代无产者变为拥有小住宅、小土地的小私有者的反动主张，是建立在那个使社会“退回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的“反动的蒲鲁东主义原则”上的（《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3页）。这“只能是反动的哀歌”（《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1页）。“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5页）恩格斯在这本光辉著作中，还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保守倒退的反动实质，进一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和清算。至此，蒲鲁东主义就彻底破灭了。

从一八四七年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到一八七二年恩格斯著《论住宅问题》，经过了二十五年长期的反复斗争，马克思主义终于彻底战胜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机会主义派别——蒲鲁东主义。一八八七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中讲到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战斗历程时指出：多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0—461页）；“现在呢？在

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有一些信徒，……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象在意大利一样，七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汹涌来潮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1—462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但是，恩格斯又谆谆地告诫无产阶级，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松懈自己的斗志，要坚持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他寓意深长地指出，虽然蒲鲁东主义在理论上已被驳倒，在实践上已被排斥在一边，可是后来的机会主义者“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3页）。恩格斯的这一英明指示告诉我们，机会主义者利用历史亡灵来为其反革命目的服务，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客观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一规律。

蒲鲁东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张倒退、复旧的祖师爷所叫卖的机会主义路线早已被埋葬了，然而他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反对社会革命、鼓吹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鼓吹和平过渡等等的机会主义观点，却长期以来

一直为妄图拉历史车轮后退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现代修正主义的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继承发展了蒲鲁东等老机会主义者和老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谬论，大肆推行“三和”、“两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复辟资本主义，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造成苏联历史的暂时大倒退。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和叛徒刘少奇、林彪，不仅祭起了孔老二的亡灵，大搞“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活动，而且继承了蒲鲁东等新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衣钵，大肆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拉回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当然，这些后来的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也只能同他们的前辈一样，落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他们的复辟美梦也必定要归于破灭。

二、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巴枯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产生在意大利、瑞士等国而具有极大危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

巴枯宁主义是“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是用极端革命的词句装扮起来的冒牌社会主义。它比蒲鲁东主义更加凶恶。巴枯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分裂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

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鼓吹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路线，疯狂地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分裂和破坏日益高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内部刚刚战胜蒲鲁东主义的时候，巴枯宁就跳了出来，抛出机会主义纲领，组织阴谋集团，大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混入第一国际，力图以巴枯宁主义代替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因此，巴枯宁主义就成了第一国际后期（一八六九——一八七二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给第一国际

和各国工人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巴枯宁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着重同巴枯宁集团的阴谋诡计和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前后大约经过七年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终于战胜了巴枯宁主义，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

（一）巴枯宁主义的形成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

巴枯宁主义的创始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年），出生在俄国提威尔省托留克县耶穆细罗村的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是沙皇政府的外交官，同时拥有七百个农奴，其母是高级军官的女儿。巴枯宁从小就受家庭出身的很深影响，总想出人头地往上爬。他十四岁进彼得堡炮兵学校，十九岁毕业后当了沙皇的军官。三年后，即一八三六年他又到莫斯科继续上学，这时他就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中保守和反动的方面。一八四〇年后巴枯宁先后到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学习，受到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蒲鲁东主义和魏特林依靠少数人进行密谋活动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于一八四四年三十岁时结识了蒲鲁东，对蒲鲁东推崇备至，吹捧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中巴枯宁到处奔走，推行冒险主义，大搞政治投机。他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布拉格（当时属奥地利）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失败后逃到德国；又参加了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頓（当时德国的一个邦国——萨克逊王

国的首都)的起义,于五月十日被捕,被萨克逊法院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他在德国和奥地利被囚禁了两年多,于一八五一年被引渡给俄国沙皇政府。在监狱中,他多次向沙皇哀求赦免。一八五一年七、八月间,他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了长达十万言的《悔过书》,承认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吹捧沙皇是“伟大帝国的伟大皇帝”,是“活生生的伟大人物”(见《巴枯宁著作书信集》,一九三五年莫斯科俄文版)。一八五七年二月,他又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上书,请求减刑。一八五七年四月巴枯宁被减刑,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在流放所他继续给沙皇写信求饶。特别应当指出,巴枯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所期间,曾三次写信给赫尔岑(俄国民权主义者,当时在国外主编《钟声》报,该报发表过一些揭露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尼·穆拉维约夫的专横统治的文章),为当时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沙皇侵华的得力干将、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穆拉维约夫进行辩护和评功摆好。他把这个反动家伙吹捧为“具有第一流将领的全部才能”的“真正天才的行政长官”;把这个反动家伙强占我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大片领土的侵略行为吹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事业”,“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见《巴枯宁给赫尔岑的信》·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七日)。这就充分暴露了巴枯宁是沙皇侵华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和辩护士。一八六一年四月,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往日本,经美国到达英国,后来又回到意大利。

巴枯宁这个无耻的叛徒跑到西欧后,完全隐瞒了自己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居然以一八四八年的“老革命”自居,发表了一篇《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吹嘘什

么“我保持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把我的全部余年贡献给争取俄国的自由、争取波兰的自由、争取全体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90页）。实际上他是打着“自由”、“独立”的旗号为沙皇政府效犬马之劳。六十年代初期，东欧各地的斯拉夫人为反对奥地利、德意志和土耳其的反动统治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巴枯宁却极力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即大斯拉夫主义，号召各地的斯拉夫人在俄国沙皇领导之下组成联邦，极力掩盖、美化沙皇扩张领土的野心。

早在一八四三年，巴枯宁在巴黎曾经和马克思见面认识。马克思耐心帮助和教育他，但是他丝毫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巴枯宁在伦敦又见到了马克思。他虚伪地表示愿意努力为国际工人协会工作，可是他混入第一国际后却没干过好事。他跑到意大利、瑞士鬼混了几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他的反革命路线。巴枯宁主义就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最终形成的。到一八六八年九月，他抛出了“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

巴枯宁主义的主要反动谬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宣扬个人绝对自由，鼓吹“各阶级的平等”。巴枯宁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只有在获得自由时才能出现，而自由就是个人的个性不受任何限制”（见《上帝与国家》），他胡说“人的全部不道德行为的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政

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因而“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和平等使社会人道化”（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8页）。所以他把“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见《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作为其秘密组织首先的奋斗目标。他在一八六八年九月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不能想象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还会有任何属于人类的东西”；“我希望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都得到平等”（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一八六八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又要实现各阶级平等，这是自相矛盾的极其浅薄的谬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不可容忍的荒唐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各阶级的平等’，如果照字面上理解，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九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6页）。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只能是阶级的消灭，而决不是阶级的平等。

第二，反对一切国家，否认任何权威。巴枯宁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人性论出发，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他胡说国家是由于少数几个人物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而产生的，是“对人性的否定”（见《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他本末颠倒地硬说国家是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根源，“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他还

抹煞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的不同阶级实质，胡说任何国家的统治都表现为剥削和奴役；公开叫嚷：“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0页）。巴枯宁既然认为“国家是主要祸害”（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所以他主张必须首先一下子消灭国家，而代之以理想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在无政府的社会里，将没有任何权威，人人都“具有享有平等、自由和人性的权利”（见巴枯宁：《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巴枯宁这一谬论披着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外衣，其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平等。

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关于废除国家的反动谬论时指出，它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恩格斯致泰·库诺》，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逐步消亡的；但是国家的消亡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恩格斯致菲·范一派顿》，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页）。否则，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胜利成果就会前功尽弃，工人阶级就会人头落地。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之流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诬蔑为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谬论时，明确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深

刻地揭穿了无政府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指出：“（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9页）

第三，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进行任何政治运动。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主要祸害，不应当做任何事情来承认、维持或建立新的国家；因此，他反对无产阶级参加选举、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斗争，更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竭力鼓吹“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的谬论。他胡说：“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1页），“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他提出，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的途径，不是依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依靠象他那样的天才人物的计谋和领导，以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为核心，进行“暴动”，进行“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不需要任

何准备，不需要聚积革命力量，只要少数有魔胆的骨干执行先知筹划的密谋策略，就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一举消灭国家，实行“摧毁一切”（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1、509页）。巴枯宁把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破坏行动美其名曰“社会清算”，并说“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9页）。在巴枯宁的这一套“社会革命”说教中，他以天生的先知和救世主自居，把社会革命看成是先知的唯意志的行动，把群众看作是实现其阴谋野心的垫脚石，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了巴枯宁主义反对一切政治运动的反动滥调。马克思指出：“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385页）。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巴枯宁的所谓放弃任何政治，只不过是反对工人去搞无产阶级政治，是要工人去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愚弄和统治。他曾情不自禁地供认：“放弃政治——这是诈骗者为了愚弄白痴而想出来的蠢事。”（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67页注①）这就自我揭穿了巴枯宁的反革命两面派骗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恩格斯致泰·摩诺》·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1页），充当“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6页）。

第四，鼓吹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

和起点。巴枯宁认为，不是私有制产生了继承权和阶级的不平等，而相反，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主要条件；因此，社会革命应该从“废除继承权”开始，把它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转引自《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他胡说什么“只要遗产还存在，就将存在世袭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即“人为的阶级的不平等”（见《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而要实现各阶级和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就“应当从废除继承权开始”（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

马克思指出：巴枯宁的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5页）马克思还指出：宣布废除继承权还“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所以马克思斩钉截铁地说，废除继承权这一谬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5页）；“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2页）。

第五，主张在无政府社会里实行“集产制”。巴枯宁自供

说：“我是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一八六八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因此，他反对生产资料国有化，主张在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后，实行“集产制”。所谓“集产制”，就是“使土地、劳动工具以及任何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并仅仅由从事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合作社和工业合作社使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这种“集产制”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根本不同的。它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反对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这必然加剧自由竞争和两极分化，促使资本主义到处泛滥。可见，巴枯宁所鼓吹的“集产制”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

巴枯宁主义的这套反动谬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从圣西门、施蒂纳、蒲鲁东等人那里剽窃来的。马克思指出，巴枯宁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他所宣扬的“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贩运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他所鼓吹的“废除国家”、“放弃政治运动”，则是发展了施蒂纳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蒲鲁东说的那种无害的、单纯语源学的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国家政权），如果不是巴枯宁把施蒂纳的‘暴动’的大部分吸收到它里面去，那它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无政府主义学说。”（《恩格斯致麦·希尔德布兰德》，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7页） 巴枯宁抄袭

和拼凑起来的这套无政府主义杂拌，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α）不懂得剥削的根源；（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拿这种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来指导工人运动，只能瓦解无产阶级的组织，涣散无产阶级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效劳。这就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实质。

马克思指出：“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巴枯宁“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进而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光有无政府主义的纲领还不行，还“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他在意大利、瑞士鬼混的几年，就是为实现这一阴谋计划东奔西走，招降纳叛，网罗死党。一八六五——一八六七年间，巴枯宁曾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团体——“国际革命协会”，准备进行“破坏一切”的暴动，但并未取得什么成效。一八六八年十月，巴枯宁一伙终于在日内瓦又建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

秘密团体。在它背后还有名为“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的秘密组织。国际兄弟会由一百名“身有魔胆的人”（见《国际兄弟会章程》，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2页）组成，是“独裁者巴枯宁的禁卫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6页）；民族兄弟会分布在欧洲各国，受国际兄弟会严格控制。总之，这是一个里外三级、派中有派、层层控制、由巴枯宁直接指挥的反革命阴谋组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流亡者文献——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91页）。这个匪帮集团的反革命阴谋计划是：“把打击专门对准国际。最初他们想控制国际，而当这一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便图谋破坏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7页）。可见，巴枯宁集团是一个由一小撮社会败类结成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巴枯宁主义的形成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

巴枯宁主义是破了产的无业游民的心理状态和要求的反映与产物。巴枯宁特别起劲地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的破产小资产阶级分子中进行蛊惑性的煽动，招募自己的党徒。这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等小生产还占绝对优势的后进国家，资本主义也逐步迅速发展起来，造成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批破产，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无业游民阶层。这些人被资本主义弄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心理、盲目破坏的情绪和立刻复仇的思

想。巴枯宁正是在意大利等国的长期活动中，从那些破产的、绝望的无业游民身上看到了他所谓的“社会革命”的力量和希望，因而形成了一套貌似激烈的无政府主义反动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巴枯宁主义兜售的那一套“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这就是非常适合……这些‘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的‘游民’”的胃口的“动听辞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5页）。他们还指出：“在意大利，同盟并不是‘工人联合会’，而是一帮游民。”（《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25页）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毛主席也明确指出：游民是“流氓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09页）。

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巴枯宁主义产生的思想认识根源。由于小生产者一方面力图自保，因而形成了以小我为中心的极端顽固的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所以在认识论上表现为极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一整套反动谬论正是这种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映。马克思指出：巴枯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5—696页）

恩格斯尖锐地揭露说：无政府主义者是“十足的‘唯一者’，他们唯一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两个可以和睦相处的人”（《恩格斯致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7页）。列宁深刻地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是国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和第一国际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发展的产物。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一八六六——一八六八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整个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罢工浪潮汹涌澎湃，第一国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威望日高。这就引起了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和仇视。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在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采取了迫害和破坏第一国际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们一方面发动了对国际的大规模诽谤和迫害运动，诬蔑第一国际是“阴谋团体”，并有计划地在政治、经济和组织上对国际进行疯狂的迫害；另一方面力图寻找代理人，设法打入第一国际，从内部破坏这个无产阶级的堡垒。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正是适应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这一反革命需要而出现的。此外，第一国际经过前期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已经战胜了蒲鲁东主义。这时，再想以赤裸裸的右倾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公开的宗派主义和合法手段打入第一国际，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都已极其困难和不可能了。因此 巴枯宁阴谋集

团使用极端革命的词句把自己的反动实质掩盖起来，以便反对马克思主义；并采取阴谋诡计和分裂主义的手法，来进行其破坏第一国际的罪恶活动。这是第一国际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现象。恩格斯在分析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时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8页）

巴枯宁主义的流毒和巴枯宁集团的阴谋活动，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成为第一国际后期的主要危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亲自领导下，第一国际和各国的先进工人同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斗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八六九年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集团阴谋篡夺国际领导权的斗争；巴黎公社后至一八七二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活动的斗争；海牙代表大会后，马克思、恩格斯为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的影响而斗争。

（二）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集团阴谋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斗争

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为了扮演无产阶级解放者的角色，把国际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实

现其“贪求权势的野心”（《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7页），玩弄了“各种阴谋诡计”（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7页），以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恩格斯指出：“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致菲·范·派·派顿》·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9页）

巴枯宁为了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首先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同第一国际相对抗。一八六七年九月，巴枯宁怀着渴求成名得势的野心，从意大利迁居瑞士日内瓦，并立即钻进一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成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和平和自由同盟”，捞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他原来企图把这个组织变成自己出头露面、左右工人运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工具，以便同第一国际相抗衡。但是他不久就认识到，这时第一国际的力量正日益发展壮大，光靠“和平和自由同盟”这个无足轻重的团体无法实现其政治野心，于是他就设法使“同盟”加入第一国际，以达到篡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目的。一八六八年春夏之交，巴枯宁代表“同盟”向第一国际提出两个团体之间建立攻守同盟的建议，即要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则协助工人争取经济改良。一八六八年九月第一国际召开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断然拒绝了这个鼓吹劳资合作的建议，这使巴枯宁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但是诡计多端的巴枯宁又改变了策略。他在一八六八年九月“同盟”伯尼尔代表大会上“扮演了一个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的角色”（《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

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提出了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纲领（即无政府主义纲领），以便激起资产阶级蠢驴们的恐惧，从而策划新的阴谋。果然，他的提案遭到了到会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表的否决。于是他就伙同其死党（阿尔伯、里沙尔、甘齐布、茹柯夫斯基、布封纳）吵吵嚷嚷地退出“同盟”代表大会，前往日内瓦，并装模作样地在报上大肆宣扬他们已经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借以招摇撞骗。

巴枯宁为了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进而采取的新策略是打入第一国际，同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并玩弄阴险手法使其混进国际，以便他篡夺国际的领导权，改变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巴枯宁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后，公开申请加入了在日内瓦的第一国际罗曼语区分部。马克思揭露说：“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功夫，巴枯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为此，“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他暗中紧张活动，于一八六八年十月拼凑起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一反革命阴谋组织，“打算使自己的团体公开加入国际，指望在一切支部中都扩展这个团体的分支，从而把国际的绝对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376页）。所以他随即于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申请加入国际，并狂妄地声称“同盟”仍然要保留自己的纲领和组织系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已经觉察到巴枯宁集团妄图篡夺国

际领导权的野心和阴谋。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巴枯宁的这一行动是企图“把工人运动置于俄国人的领导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8页）。恩格斯也反对巴枯宁这个俄国人的阴谋，“否则，就会有两个总委员会，甚至两个代表大会；这是国中之国”（《恩格斯致马克思》·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20页）。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决议，拒绝接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决议指出：如果接受“同盟”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这“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3页），只有在“同盟”废除其错误纲领和解散其组织后，其成员才可以加入第一国际。

为了掩护阴谋诡计，实现罪恶野心，巴枯宁在总委员会作出决议的同日还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光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见《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一九二八年莫斯科俄文版）马克思在接到这封极端伪善的信件后当即指出：“巴枯宁还陶醉于愉快的幻想中，以为我们将放心地让他自由行动。……于是后者便借这封信制造了一个温情的序幕！”（《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28页）这就揭穿了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假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卑鄙行径。

总委员会的决议给了野心家巴枯宁以沉重的打击。他看

到既不能使同盟公开打入第一国际，但又急于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实现其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于是便进一步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同意国际的条件，宣布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经解散；暗地里仍然保留“同盟”的组织，继续进行秘密阴谋活动。巴枯宁集团就以这样的阴谋诡计混入了第一国际。从此以后，在巴枯宁集团的策划下，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篡夺国际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便在加紧进行；一场夺权反夺权、分裂反分裂的两条路线大搏斗便在国际内部激烈展开。

巴枯宁阴谋集团混入第一国际后，就积极策划利用即将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这一绝好的机会，来实现他们渴望已久的篡夺国际领导权的罪恶野心。为此，“巴枯宁搞了真正的阴谋”（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6页）。首先，巴枯宁建议把他的反动谬论之一即废除继承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阴谋由此打开缺口，进而把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强加给大会，改变第一国际的基本路线，使国际“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清醒地看出，这是“同盟对国际进行公开不断的战争的信号”（《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页）。国际总委员会接受了巴枯宁的挑战，同意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以便“给巴枯宁来一个迎头痛击”（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6页）。其次，巴枯宁极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并制造借口妄图把总委员会的驻地由伦敦迁到他的党徒集中的日内瓦，从而把第一国际完全控制在巴枯宁集团手中。再次，巴枯宁为了争取在代

表大会上获得多数，施展了各种卑鄙的手段，动员其支持者多派代表到巴塞尔去；他们人数不多，竟派出十名代表，并由巴枯宁亲自出马挂帅。他们甚至弄了不少伪造的代表资格证带去参加大会，妄图乱拉代表，制造多数，但是未能得逞。

一八六九年九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继承权问题和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在讨论继承权问题时，巴枯宁分子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进攻，猖狂地要求代表大会宣布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妄图篡改第一国际的纲领和路线。早有准备的总委员会代表，立即给予巴枯宁集团以迎头痛击。他们宣读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从理论到实践上深刻地批判了“废除继承权”这一谬论的反动性。报告指出：巴枯宁的这一谬论的“重大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把继承权看做法律后果，而把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5页）。继承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上层建筑，它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后果。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继承权才能随之废除。大会进行表决时，巴枯宁的提案没有得到总票数的一半，从而挫败了巴枯宁分子的罪恶企图。

随后，巴枯宁阴谋集团又改变了反革命策略，想以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来篡夺国际的领导权。起先，马克思认为，为了对付巴枯宁之流的宗派阴谋活动，有必要建议赋予总委员会有开除任何违背国际精神的支部的权力。这时，巴枯宁

分子认为，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对他们实现篡夺领导权的阴谋大为有利，所以便积极赞成这个建议。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8页）这样，巴枯宁这个反对“一切权威”，要求“绝对平等”的吹鼓手，现在竟如此迫不及待地又公开同意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了。这就使人看清了巴枯宁一伙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的反革命两面派。巴塞尔大会顺利地通过了一项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规定总委员会有权吸收和拒绝新的支部加入国际，并且有权开除支部。巴塞尔大会改选了总委员会。巴枯宁未能钻入。总委员会的会址仍旧设在伦敦。这样，巴枯宁妄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一切阴谋完全破产了，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集团的斗争首战告捷。

巴枯宁集团在巴塞尔大会上阴谋篡夺领导权的活动失败后，巴枯宁及其死党非常懊丧、愤恨。但是，老奸巨猾的巴枯宁认为，当时与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公开对立和直接斗争的“时间还没有到”，因而应该先实行另一种反革命策略，即把国际总委员会和国际在各国组织加以“拆散”、“分割”、“以便较容易地击溃它”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见《巴枯宁给赫尔岑的信》，转引自《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根据这种策略，他们在各国的国际组织中策划分裂活动，扩大自己的宗派力量，篡夺领导权，用无政府主义纲领“偷换国际的纲领”（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9页），以分裂和破坏基层来破坏第一国际。

为了达到这种反动目的，巴枯宁集团积极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挑动分裂。他们利用他们暂时控制的国际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平等报》和巴枯宁分子主办的《进步报》，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多次发表文章，肆意诽谤总委员会。他们胡说什么总委员会对爱尔兰问题的决定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叫嚷总委员会应当放弃对英国的直接监督，等等。他们这样公开否定第一国际坚决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则立场和总委员会直接领导英国工人运动的正确决定，是为了挑拨和煽动英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对第一国际的不满。

马克思当即于一八七〇年一月代表总委员会写成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并分发给国际各支部；三月间又写了《机密通知》，对巴枯宁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通告信”和“通知”逐条驳斥了巴枯宁一伙对总委员会的恶毒诽谤，击破了他们妄图使英国工人运动脱离总委员会直接领导的罪恶阴谋，阐明了只有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动摇英国大地主所有制，加强英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通知”还提醒国际的各级组织，要特别警惕巴枯宁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6页）。

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也对巴枯宁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他们于一八七〇年一月改组了《平等报》编辑部，迫使六个巴枯宁分子退出该报，从而使《平等报》变为反对巴枯宁分子的阵地。《进步报》也在一八七〇年四月被迫停刊。这样就粉碎了巴枯宁集团炮制反革命舆论、从而制造分裂的

阴谋。

在这一时期，巴枯宁阴谋集团以瑞士的汝拉山区为基地，积极向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地区秘密发展“同盟”的组织，扩张自己的宗派势力。同时，他们还密谋策划夺取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领导权，作为篡夺国际领导权的前哨战。一八七〇年四月四日在瑞士拉绍德封召开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搞突然袭击，重施他们在巴塞尔大会上使用过的阴谋诡计，企图在大会上以两票微弱的多数强迫大会承认“同盟”的日内瓦支部为联合会的一部分，并且要把联合会迁到“同盟”的老巢汝拉地区去，以便由他们左右和控制联合会。由于遭到许多代表的坚决反对，巴枯宁派便强行表决。结果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分裂为两部分，各自继续开会。而巴枯宁派竟无耻地以全联合会的合法代表者自居，同原来的联合会委员会相对抗，这就导致了瑞士第一国际组织的公开分裂。

马克思痛斥了巴枯宁集团的罪恶分裂活动，指出：“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害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7页）

总委员会坚决支持忠于国际事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会议上，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巴枯宁派在拉绍德封召开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拥有的多数“只是表

面上的多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90页）。决议决定：设在日内瓦的联合会委员会应当保留自己的名称；设在拉绍德封的联合会委员会（巴枯宁派）则应改用其它合适的名称。这一决定粉碎了巴枯宁派篡夺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领导权的阴谋，打击了他们进行分裂活动的气焰。巴枯宁派对此大为恼火，他们攻击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总委员会被迫同设在拉绍德封的假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巴枯宁派）断绝了关系。

总委员会原来准备开展一次反击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大规模斗争，但是一八七〇年七月爆发了普法战争，这场斗争便被暂时推迟了。

（三）马克思主义者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第一国际的罪恶活动的斗争

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前后这一历史阶段中，尖锐的阶级斗争无情地检验出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反革命真面目。当革命高涨的时候，他们大肆反对和破坏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当反动派力图置第一国际于死地的时候，他们却猖狂地进行分裂国际的罪恶活动，配合阶级敌人来摧毁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对于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罪恶分裂活动，国际必须给予坚决的揭露和回击。马克思在进行这一斗争时说过：“当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

历史的概述”（《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页）。

一八七〇年七月爆发的普法战争引起了法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九月四日巴黎发生了革命，起义人民推翻了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成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同一天，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也爆发了工人起义，建立了革命政府。善于投机的政治骗子巴枯宁急忙跑到了里昂，大搞冒险行动，妄想冒充拯救法兰西的革命首领。他纠合共同伙于九月二十八日占领了市政厅一个短时间，并立即颁布了愚蠢透顶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但是几个小时之后，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只派了两连军队就把这场废除国家的闹剧粉碎了。“吹牛专家”（《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巴枯宁只得灰溜溜地仓惶逃往日内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最初，一切都顺利。”“但是，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一八七〇年十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3页）里昂起义胜利果实的被断送，充分暴露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反动谬论的荒诞无稽及其对革命的危害性和破坏作用。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英雄的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梯也尔的卖国反动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这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第一国际坚决支持奋不顾身的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及时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勇敢地捍卫了巴黎公社

的正义事业。而巴枯宁主义者却完全站在这次革命的对立面，恶毒地诽谤巴黎公社的伟大事业和公社英雄们的英勇斗争。比如巴枯宁本人就曾公开诬蔑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并无耻地歪曲说，巴黎公社“是对国家的勇敢的、明显的否定”（见《巴黎公社和关于国家学说的概念》）等等。这就彻底撕掉了巴枯宁的“社会革命”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狰狞面目。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更加证实了巴枯宁主义关于在阶级社会中废除一切国家、实现各阶级平等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极其反动的。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了一个诽谤、诬蔑、围攻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的反动狂潮。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场用诽谤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统治阶级中各种色彩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来说，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1页）巴枯宁阴谋集团适应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需要，也迫不及待地参加了这个反对第一国际的“大合唱”，趁机加紧进行分裂和破坏国际的罪恶活动。他们丧心病狂地利用第一国际的困难处境，猖狂攻击总委员会对待巴黎公社革命的正确原则立场，恶毒造谣说什么“总委员会对公社的灭亡应负罪责，因为它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巨大力量去支援巴黎的运动；总委员会的亲德意志的倾向是极其触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20页），等等。

他们把自己操纵的瑞士国际汝拉支部作为反对第一国际的大本营，并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加紧网罗门徒，分裂当地的国际支部，使国际由于内部的分裂处境更加艰难。他们还要求立即召开国际的非常代表大会，阴谋与资产阶级配合，里外夹击，颠覆第一国际。

面对第一国际所处的这种内外艰险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总委员会坚决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分裂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回击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猖狂进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总委员会不顾巴枯宁分子的强烈反对，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于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七——二十三日在伦敦召开了第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谴责了巴枯宁派操纵的汝拉各支部的分裂活动，责成他们加入总委员会承认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并警告他们如果再次发动公开攻击，总委员会今后将“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0页）。

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彻底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关于完全放弃一切政治的反动谬论。恩格斯在发言中深刻地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人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我们“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因为“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而“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页)。会议挫败了巴枯宁分子的阻挠与反对，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明确指出：一切政治活动都应该是经济解放的手段，并且要求国际会员注意把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结合起来；决议还指出，为了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

尤其使巴枯宁惊慌的，是会议作了特别决议，宣布“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涅恰也夫阴谋完全无关，涅恰也夫是用欺骗方法攫取了国际的名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7页）。因为涅恰也夫在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年与巴枯宁联系密切，并且在巴枯宁指使下，在俄国假冒第一国际名义，进行诈骗、谋杀等破坏革命的勾当。涅恰也夫被捕后，反动派趁机煽动反对国际的妖风，胡说涅恰也夫是根据国际的指令进行这些活动的。

伦敦秘密代表会议给予了巴枯宁集团以沉重的打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伦敦代表会议用关于瑞士冲突、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三项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脏。”（《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95页）

此外，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关于取消各组织宗派名称的决定也是对巴枯宁宗派活动的重大打击。因为巴枯宁分子曾经采用实证主义派、互相主义派、社会主义者——无神论者派等等乱七八糟的名目来命名其宗派组织。决议规定：各国的国际支部都应命名为联合委员会并冠以所在国的国名，所有

地方支部和小组都应成为国际的分支组织，并冠以所在地的名称。

巴枯宁集团在伦敦秘密代表会议上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他们把仇恨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身上。所以在伦敦秘密代表会议以后，他们就以反对“权威主义”为名，公开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疯狂进行分裂活动，阴谋使国际瓦解。巴枯宁没有出席伦敦秘密代表会议，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诡计。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巴枯宁指使其党徒，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了巴枯宁派的汝拉各支部代表大会。汝拉地区的“同盟”组织是巴枯宁的总部，包括二十二个支部，但是实际上只有九个支部的十六名代表参加“大会”。这个分裂小会发表了所谓《桑维尔耶通告》，公开发出反对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叫嚣，给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恩格斯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什么“专制”、“独裁者”等等。过去巴枯宁自称是国际的“拥护者”，是马克思的“学生”，现在却大肆攻击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其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昭然若揭。他们还要求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实行“支部自治”。这是巴枯宁集团公开分裂第一国际的信号和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指出：“关于自治和自由联合的响亮的词句，一句话，他们对总委员会宣战的号召，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法罢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从而使国际屈从于同盟的秘密的、教阶制的和独裁的统治。”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4—485页）恩格斯还揭露说：巴枯宁集团“从此以后策略就改变

了。命令下达了。在联盟有分支的地方，在意大利，特别是在西班牙，巴塞尔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权威主义的决议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一样，到处都遭到了疯狂的攻击。”（《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0页）

巴枯宁阴谋集团对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恶毒攻击，是公开分裂第一国际的罪恶活动，它完全迎合了各国反动派的需要，“是在最好地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恩格斯：《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33页），因为，“对欧洲警察当局来说，只要国际退出舞台，别的什么都是不需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00页）。所以，《桑维耳耶通告》一出笼，立即受到欧洲各国反动分子的热烈的欢迎。法国资产阶级的政客甘必大极力称赞巴枯宁派的所谓“通告”；英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白衫党也为这个“通告”拍手叫好。巴枯宁充当资产阶级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理人的反革命面目已经原形毕露。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各国革命工人的强烈反对。日内瓦国际各支部于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二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反对所谓桑维耳耶大会的决议，严厉谴责其罪恶的分裂活动。甚至巴枯宁派的支柱——“同盟”西班牙支部的盟员们也起来反对巴枯宁。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总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回击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猖狂分裂活动，于一八七二年一月至三月间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了一篇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

裂》。这篇杰出的通告向国际无产阶级全面揭露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分裂活动和罪恶目的，逐条驳斥了《桑维耳耶通告》对总委员会的诬蔑和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报刊的诬捏和国际上的警察的怨恨，甚至在我们协会内部得到了同情的反应。表面上反对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反对整个协会的阴谋，在协会内部制造出来了。在背后制造这些阴谋的总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11页）。

总委员会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决定于一八七二年九月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第一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到苏黎世调查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活动情况。巴枯宁对这次调查非常害怕，竟然指使其死党企图暗杀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国际俄国支部负责人之一吴亭。调查人虽然受了重伤，然而还是完成了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地指出：“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

巴枯宁得到召开海牙代表大会的消息后，也加紧策划，作垂死的挣扎。巴枯宁分子觉得即使采取在巴塞尔大会和拉绍德封大会上所使用过的手法，在海牙大会上也不能获得虚假的多数票，更无力控制大会的领导权，达不到篡夺领导权的目的。所以他们孤注一掷，“企图发动 coup d'état [政变]”（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3页），以挽回败局。其办法是利用反动的意大利联合会于八月五日在里米尼召开代表会议，

这个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公开宣布同伦敦的总委员会分裂，并号召所属各支部于一八七二年九月二日派自己的代表到瑞士纽沙特尔去，而不是到海牙去，以便在这一天召开“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同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分庭抗礼。可是，他们企图搞政变的计划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巴枯宁不得不“纠正自己的失策”（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24页），又厚颜无耻地派出由吉约姆率领的十四名代表去参加海牙大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牙大会是关系到国际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所以亲自出席并且领导了这次大会。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专案审查报告。

海牙代表大会围绕着加强还是取消总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巴枯宁分子吉约姆发言主张取消以总委员会为中心的一切职权。他说总委员会“不应是一个领导的中心”，而应该是一个“联络统计局”。实际上他是以反对权威主义为名而鼓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在发言中强调了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重要性，严厉批判了巴枯宁分子的反动谬论，并且戳穿了他们推行无政府主义的阴谋。最后，大会以四十票赞成、四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授予总委员会更广泛权力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总委员会在大会休会期间有权暂时开除一个支部直到一个联合会。

大会决定把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政党从事政治斗争的决议载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一决议标志着主张放弃政治斗争、拒绝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巴

枯宁宗派集团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失败。

大会根据恩格斯的报告，审查了巴枯宁集团的分裂活动，决定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阴谋组织的首要分子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第一国际，并公布“同盟”策划阴谋诡计、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文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是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最后判决。恩格斯说：“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象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这一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页）。海牙大会证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落得可耻的下场。

（四）巴枯宁集团的垂死挣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的影响而斗争

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分子仍然负隅顽抗，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五日，巴枯宁集团余党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了所谓“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宣布自己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真正代表”，建立了由分裂出去的联合会组成的“反权威主义国际”。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对海牙大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且“否决”了海牙代表大会所有的决议，拒不承认新的总委员会。巴枯宁本人还在一八七三年初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极力为他在第一国际内部的阴谋分裂活动进行诡辩，大做翻案文章，并且疯狂攻击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此书被巴枯宁分子吹捧为纲领性的著作。

巴枯宁集团的垂死挣扎，只得到一小撮信徒和英国工联机会主义首领黑尔斯之流的附和，但却遭到国际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波兰、葡萄牙和北美的第一国际各支部，都坚决支持海牙大会的决议，就连在海牙大会上曾经支持过巴枯宁分子的荷兰联合会也转向总委员会一边。根据各地支部的要求，总委员会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通过了《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的决议，声明，“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37页）同年五月三十日，总委员会又重申了这个声明，并且决定将参加了巴枯宁派召开的所谓“反权威主义”大会或承认它的各项决议的一切组织和个人统统开除出第一国际。这就从组织上彻底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清除了巴枯宁分子。

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巴枯宁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先后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全面、系统、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和阴谋诡计，论证和发挥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巴枯宁集团鼓吹无政府主义、反

对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马克思说：“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

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地阐明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绝不能废除国家，实行所谓无政府状态，而是必须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否则，“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恩格斯致非·范·派顿》，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439页）。恩格斯还痛斥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权威和集中，鼓吹无条件自治的反动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和集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恩格斯在《论权威》

这篇战斗的论文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极其精辟地指出，工厂组织生产，火车正常奔驰，轮船安全航行，都要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服从，即需要权威。他写道：“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一八七二年一月十四—十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9页）由此可见，“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恩格斯指出，那些诅咒权威和集中的人，若不是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而胡言乱语的糊涂虫，就是别有用心之徒的口头革命派，故意制造混乱，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尖锐地揭穿了巴枯宁集团口头上高喊团结，实际上大搞分裂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论证了无产阶级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说：“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18卷第180页) 而“团结”不离口的巴枯宁阴谋集团却是最大的宗派主义者、最凶恶的分裂主义者、破坏革命团结的罪魁祸首。针对巴枯宁分子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恩格斯谆谆教导无产阶级:“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就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发动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

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只有经过斗争,而不是调和折中,才能达到真正的革命团结。他说:“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页)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集团大搞阴谋活动的斗争经验,明确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

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马克思、恩格斯从伦敦代表会议起所采取的一系列决定性的措施，都是为了彻底公开揭穿巴枯宁集团的阴谋诡计，给予毁灭性的打击。《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出版和连续再版，也是为了彻底清算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页）。这就使巴枯宁及其死党在工人运动中声名狼藉，遗臭万年。

巴枯宁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被马克思、恩格斯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在一八七三年西班牙革命的实践中遭到了最后的破产。一八七三年二——九月，西班牙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广大工人积极投身到革命中去。在这种形势下，控制国际西班牙支部的巴枯宁分子被迫不得不允许工人参加各个城市的起义和议会选举。巴枯宁分子也纷纷参加到各起义城市的政府委员会中去，但是他们又要各城市到处实行“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原则，致使各地的革命力量陷于分散、孤立的状态。结果反动派只用了极少部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了。恩格斯在总结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理论和策略的荒谬性与反动性。他指出：“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78页）而且，他们的“极端革命的叫喊”，就会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总之，“巴枯宁主义者

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79页）

在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巴枯宁被迫于一八七三年九月在《日内瓦报》上登出一个声明，哀叹自己已六十多岁了，宣布“退出斗争舞台”。实际上他是装死躺下，以退为进。他在给他老婆的信中供认：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秘密工作”。事实上，他公开发表声明之后仍然在幕后指挥共党徒策划反国际的阴谋。巴枯宁派的所谓反权威主义国际，在一八七三、一八七四、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还开过四次大会，妄图对国际进行反扑。但是这种垂死挣扎，只能表明他们心劳日拙，奄奄待毙。不久后，巴枯宁派发生内哄，党徒们也作鸟兽散。巴枯宁本人于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病死在日内瓦，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虽然巴枯宁死了，巴枯宁阴谋集团彻底覆灭了，但是巴枯宁主义的余毒并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肃清。无政府主义的余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还混进了第二国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鼓吹毫无准备的总罢工，进行个人恐怖活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最后被开除出第二国际。以后，无政府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虽日渐衰微；然而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还伺机兴风作浪，不时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了巴枯宁的反动衣钵，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复辟了资本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

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上台后就为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叛徒、反革命分子翻案，替巴枯宁翻案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我们只要把一九五〇年斯大林在世时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以下简称“二版”）同苏修叛徒集团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以下简称“三版”）中关于巴枯宁的条文和皮鲁莫娃写的《巴枯宁传》（这个《巴枯宁传》也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了《名人传丛书》）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看清他们替巴枯宁翻案的罪恶行径了。

首先，巴枯宁是什么人，历史早有定论。“二版”曾写道，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巴枯宁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政治观点是敌视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三版”则胡说什么他是“俄国革命者”；“巴枯宁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留下了显著的痕迹”；“为争取革命胜利而忘我地和始终不渝地进行了斗争”，“是一个具有无穷的革命精力，渴望在各个地方用自己的手创造革命的人”。他们就这样把巴枯宁这个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变成了“革命”的“英雄”。

其次，谁都知道，巴枯宁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叛徒，沙皇专制制度的奴才。“二版”曾写道：“巴枯宁表现出来的畏缩和怯懦，充分说明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分子不能表现出坚韧、纪律和坚定性的特点。……小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使巴枯宁背叛了革命的根本利益”；“巴枯宁尽管发表‘革命’的空谈，但实际上在对待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态度上扮演了叛徒角色”。但《巴枯宁传》却胡说巴枯宁是“革命者，专制制度不

可调和的敌人”；“是空想社会主义英雄时期的革命领袖和典型”。“三版”还说，“他在《忏悔书》里没有败坏任何人的名誉，叙述了欧洲革命（指一八四八年革命）事件和自己的情况。这个文件的形式有时带有悔过的性质，这可解释为巴枯宁力图不计代价地获得释放的策略。”《巴枯宁传》还荒诞而赤裸裸地说：“他在内心深处没有叛变。他的《忏悔书》不是叛变。”

最后，巴枯宁是沙皇侵略扩张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和吹捧者。“二版”曾指出：“在解决斯拉夫问题方面，巴枯宁采取的是反民主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建立一个以沙皇为首的全斯拉夫国家是可能的。巴枯宁的反动观点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巴枯宁传》却胡说他是“争取斯拉夫人民解放的积极战士”。

苏修叛徒集团所以要替巴枯宁这具僵尸翻案，所以要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替巴枯宁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都是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都是叛徒。他们在对外的关系上，都是侵略扩张主义者；所不同的，只是新沙皇比老沙皇及其奴才的野心更大、更疯狂。叛徒惜叛徒。苏修叛徒集团为巴枯宁翻案，就是为他们今天的反革命行径辩护。但是，他们的丑恶表演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苏修叛徒集团的这一翻案罪行，又一次暴露了他们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死敌的真面目，又一次为革命人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

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论）这三项基本原则是对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巴枯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搞机会主义、搞分裂主义、搞阴谋诡计的老手，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典型。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实际上全盘继承了巴枯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反革命手法。林彪为推行其“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韬晦”策略隐蔽其反革命真相，“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结党营私，组织反革命别动队，搞突然袭击，策划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不论巴枯宁还是林彪，他们的反革命活动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都是违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所以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很虚弱的，注定是短命的，终究都逃不脱彻底失败的命运，也阻挡不住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

产大约翻了两番，大机器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起来。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也随之增长。一八四八年以前，产业工人不到六十万，到六十年代初，产业工人已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德国无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完全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集会结社被禁止，革命人士受迫害，革命组织遭破坏，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德国的许多革命者被迫长期流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活动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学者，以及天主教教士影响下的教育协会和互助会等组织。它们力图引诱工人脱离政治斗争，阻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传播，阻挠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和组织。

六十年代初，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经过十多年的低潮后重新走向高涨，这是由于德国无产阶级深受地主、资产阶级双重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工人队伍的壮大和力量的加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际工人运动在六十年代初重新走向高涨的影响。一八六一年，不少工人已经提出参加政治生活并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等要求。一八六二年，莱比锡、柏林等地的工人已经开始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以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组织。

德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重新兴起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们在加强武力镇压的同时，也乞灵于政治欺骗。地主、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想在工人运动方兴未艾时，就把这一运动控制在自己手里，引入改良主义的歧途。尤其是当

时德国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俾斯麦，更处心积虑地想把德国的工人组织控制在他的手中，实现他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阻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便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利用工人组织来吓唬资产阶级，使其不敢与地主阶级争夺政权。拉萨尔主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适应德国地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

拉萨尔主义的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年），出身于德国布勒斯劳的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富商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绸缎商。一八四〇年春，拉萨尔到来比锡一个商业学校学习。一八四一年秋，他开始上大学，先后在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还在上大学以前，拉萨尔就沾染了投机取巧、欺诈拐骗等资产阶级恶习，形成了他的爱好虚荣和“伸手去取王冠”（拉萨尔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九日日记——见伯恩斯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的政治野心。拉萨尔极力想挤入贵族和上层社会，他拚命追求金钱和声望。为此，拉萨尔从一八四六年起便包揽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件。他虚张声势，无耻地把这种贵族家庭的内部纠纷渲染为处于“无产者”地位的伯爵夫人反抗权贵的斗争。拉萨尔曾抱着政治投机的目的参加过一八四八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失败后，拉萨尔留在国内，但他对革命灰心丧气，便把全部精力用来为哈茨费尔特夫人打官司，前后化了七、八年的时间。因此他捞到了很大一笔金钱，并同这个伯爵夫人鬼混，过着它梦寐以求的上层贵族的糜烂生活。对此，恩格斯后来曾痛斥他是一个“从头到脚污秽不堪的人”（《恩格斯致保·拉法格》·一八八〇年五月四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

拉萨尔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一贯采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他当面或在给马克思的信件中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背后却极力阻挠和破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德国的传播，在工人中间从来不提马克思、恩格斯的姓名。拉萨尔为了沽名钓誉和捞取政治资本，在五十年代后期东割西窃地写了一些东西，例如《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八五八年）、《弗朗茨·冯·济金根》（一八五九年四月）、《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一八五九年六月）。这些书所宣扬的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在思想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对普鲁士王朝和德国资产阶级两面讨好的态度。

用戏剧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是拉萨尔的一大发明。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剧本美化德国中世纪小封建领主（骑士）的代表人物济金根（一四八一——一五二三年），把他吹捧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强力的现实的政治家”、“革命家”。实际上，济金根不过是一个梦想在农奴制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君主国的小丑。拉萨尔把济金根的失败归之于他“外交的错误”，即没有能和德意志皇帝建立起同盟。拉萨尔在剧本中还把皇帝恭维一番，并要求他来领导运动，这是为了讨好当时德国的封建统治者。反之，拉萨尔在剧中对农民群众则大加污蔑，否认农民革命战争的伟大作用。历史事实是，在济金根死后两年，一五二五年，德意志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当马克思、

恩格斯看到该剧本后，都写信批判了拉萨尔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他“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5页）。马克思还指出，济金根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马克思致斐·拉萨尔》，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9页）。这些批评完全击中了拉萨尔的要害，但是拉萨尔却拒不接受。这说明后来拉萨尔投靠德国地主阶级，鼓吹无产阶级与普鲁士国王结成同盟，恶毒诬蔑农民革命运动是“反动的运动”（见拉萨尔：《工人纲领》，绝不是偶然的。

六十年代初，当德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涨的时候，政治投机家的拉萨尔看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怯弱，普鲁士王朝的强权在握，感到如果象他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那样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与王朝作对，一定对己不利；而站在普鲁士国王的旗帜下，篡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适应俾斯麦控制工人运动的需要，倒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狂妄野心。因此，他就从五十年代的对普鲁士王朝和资产阶级两面讨好的立场一下子转到完全拥护普鲁士国王的立场。为了打入工人运动，骗取工人群众对他的信任，借攻击资产阶级保护地主阶级，拉萨尔表面上用尖刻的语调攻击资产阶级，借以捞取政治资本。但拉萨尔仅仅是在表面上攻击资产阶级，实际上他却千方百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从不要求消灭资产阶级。

恩格斯在揭露拉萨尔的政治投机生涯时指出：“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

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一八六二年春拉萨尔抛出了《工人纲领》，一八六三年春又抛出了《公开答复》，突然以“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工人阶级领袖”的架势向工人说话。“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拉萨尔就是采取这种鱼目混珠的卑劣手法来向工人贩卖他的机会主义私货。

拉萨尔主义的主要谬论有：

第一，胡说无产阶级的贫困是由什么“铁的工资规律”决定的。“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从反动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出发臆造出来的。拉萨尔说：“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见《公开答复》）。这就是说，拉萨尔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不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决定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是永远不可能根本改善的。拉萨尔想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对工人的剥削，对抗马克思所创立的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石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从理论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

为了同样的目的，拉萨尔主义者还鼓吹“劳动是一切财

富的源泉”（转引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他们用这种谬论来诱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产生错觉，似乎劳动者不具备生产资料就能够凭空创造出财富；似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现象，是由劳动的好坏造成的，而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无关；似乎地主、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财富不是依靠剥削，而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以便他们把工人运动引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轨道，领上合法的、和平过渡的、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邪路。

第二，拉萨尔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出发，胡说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见《告柏林工人书》），“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见《工人纲领》）。拉萨尔以此否认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散布对普鲁士王朝的幻想，企图要德国无产阶级支持普鲁士王朝的内外政策，以此换取普鲁士王朝恩赐普选权的决心。

第三，胡说取得普选权，依靠“国家帮助”，就能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拉萨尔说，实施直接的普选权“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见《公开答复》），因为有了普选权，工人代表就能在议会中占多数，就能建立“自由国家”，然后依靠“国家帮助”，拨款建立生产合作社，拉萨尔甚至胡说，只要有一亿塔勒（当时的德国货币名称）“就足以使整个德国获得解放”（见《工人读本》）。拉萨尔还胡说，在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实行“公平的分配”，使一切社会成员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样，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就实现了。这就是拉萨尔鼓吹的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最和平、最合法、最简单的方法。拉萨尔的这一套超阶级国家观

及其议会道路和假社会主义胡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完全对立的，是同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是为了诱骗无产阶级永远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

第四，鼓吹建立一个所谓工人阶级的，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机会主义政党。拉萨尔说，“这个党以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原则口号，作为党的旗帜”，这个党的任务是开展“和平的、合法的”宣传运动（见《公开答复》），争取选举权，争取把象他这样的“英雄”、“工人领袖”选进议会里去。很明显，拉萨尔所要建立的党，不过是普鲁士王朝破坏工人运动的工具，不过是象他这样的野心家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而绝不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先锋队。对于这个党来说，工人阶级不过是一些摇旗呐喊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创造者。

第五，百般美化和包庇德国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竭力鼓吹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结成同盟，而把无产阶级真正的同盟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诬蔑为“反动的一帮”（转引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拉萨尔及其追随者这样做，是为了破坏工农联盟，孤立无产阶级；是为了从普鲁士王朝手中讨取普选权。为了这种目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还积极支持德国地主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扩张，推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替本国反动统治者效劳。

一八六三年五月，当德国各地的工人联合起来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时，拉萨尔挂着“老革命”的招牌，利用他蛊惑

宣传中的欺骗作用，骗取了工人群众的信任，趁机窃取了“联合会”主席的职务，并且把他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策略作为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例如在“联合会”章程的第一条就规定：“联合会的宗旨是通过和平和合法的道路，特别是通过争取公众的信念，为取得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而进行活动。”（见《拉萨尔演讲论文集》德文版第4卷）这样，拉萨尔便把“联合会”完全变成了他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工具。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33页）。

拉萨尔在刚成立的“联合会”中不但贯彻了一条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也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他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例如后来在“联合会”当过主席、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施韦泽，就是出身于法兰克福的一个非常腐化堕落的贵族家庭，一八六二年本人曾因贪污公款和在光天化日之下向少年儿童耍流氓而被判处过监禁的坏分子。他在名声扫地、走投无路时，结识了拉萨尔。拉萨尔不顾法兰克福工人组织的强烈反对，竟接受施韦泽参加“联合会”，并且无耻地把施韦泽的那些卑劣行为说成是生活小节，反诬工人们“胸襟狭窄”。又如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本人就是一个贵族夫人，又同普鲁士王朝有直接的密切联系，也被拉萨尔尊敬地放在“联合会”的领导核心中。拉萨尔在“联合会”中极力鼓吹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和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凡人

会者，都要宣誓效忠拉萨尔。

拉萨尔在加紧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控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同时，为了推行他的极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便积极设法投靠德国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普鲁士王朝的首相俾斯麦。为此，拉萨尔几次在群众大会上无耻吹捧、美化俾斯麦，说“俾斯麦是一个大丈夫”，“明智的政治家”。拉萨尔对俾斯麦表示，如果俾斯麦同意施行普选，他便“代表”德国工人宣布完全支持俾斯麦的内外政策，支持普鲁士王朝用战争统一德意志，支持俾斯麦去兼并当时属于丹麦的领土：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拉萨尔的卖身投靠正合俾斯麦的心意。俾斯麦早就企图收买一些有名望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领袖”，把这些人网罗到自己手里，作为控制德国工人运动的工具。这样，拉萨尔和俾斯麦便加紧秘密勾结起来。一八六三年，正当德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涨之时，拉萨尔同俾斯麦多次进行密谈，常常连续深谈数小时之久，打得十分火热。有一次，俾斯麦竟因拉萨尔在座而拒绝接见巴伐利亚的公使，足见俾斯麦对拉萨尔这个地主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重视。从一八六三年五月到一八六四年夏，拉萨尔直接拜访俾斯麦达十多次，还写了不少密信。例如，一八六四年一月十三日到十六日四天之内，拉萨尔就连写两封密信，急切地向俾斯麦呈献欺骗群众、加强统治的“仙方”。拉萨尔在和俾斯麦多次密谈和通信中，不仅向俾斯麦宣誓他是普鲁士国家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和卫士，胡说什么“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独裁政治……他们都很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见一八六三年七月八日给俾斯麦的信），而且还把联合会

的组织状况，工人运动的状况，当时工人阶级的行动计划以及今后的打算统统出卖给俾斯麦。拉萨尔还向俾斯麦出谋献策，要俾斯麦实施普选权，认为这符合普鲁士王朝的利益，可以使普鲁士王室“转变为革命人民的社会君主专制”（见一八六三年七月八日给俾斯麦的信）。上述事实说明，拉萨尔完全充当了俾斯麦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内奸和工贼。尽管拉萨尔同俾斯麦秘密勾结的内幕直到一九二八年才从普鲁士内阁的旧档案中发现，但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从拉萨尔言行的种种迹象中已经有所察觉。恩格斯早在一八六三年就尖锐地指出：“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恩格斯致马克思》·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页）。

一八六四年八月底，拉萨尔为了争夺别人的未婚妻在决斗中中弹而死。但是他的继承人施韦泽、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等更加疯狂地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地支持俾斯麦的政策，甚至在“联合会”的机关报上大肆庆祝普鲁士国王的寿辰。他们把“联合会”完全变成了一个效忠普鲁士王朝和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组织，对于德国工人运动长期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拉萨尔主义后来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拉萨尔则是后来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顶礼膜拜的偶像。

（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路线和德国统一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工人运动内部的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拉

萨耳抛出的无产阶级通过议会道路建立“自由国家”，并依靠普鲁士“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所谓“公平的分配”的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是欺骗工人阶级和出卖工人阶级利益、代表德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身居国外，但是对于德国的工人运动却十分关心。他们从德国的情况出发，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大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地主阶级，争取自下而上地完成德国统一，只有坚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接触，完全看透了拉萨尔本人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因此，他们在为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简称国际）进行大量工作和在国际建立后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以及后来同巴枯宁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也展开了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由于当时受“联合会”影响的工人还没有识破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本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和方式。

首先就是同拉萨尔断绝关系，划清界线。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和同年年底，同拉萨尔先后两次就德国工人运动的路线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马克思已经看到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于是从一八六三年初就同他断绝了关系。马克思在分析决裂的原因时指出：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_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

(3) 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3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2页)。很明显，这种决裂决不是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是在对待德国工人运动问题上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条路线斗争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说、特别是写了大量的信件，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恩格斯在为德国报纸写的文章中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拉萨尔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5—256页）。恩格斯还指出，在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连起码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鼓吹“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普鲁士军国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3页）。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写信给拉萨尔派的头目施韦泽，批判了他所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向政府谄媚的卑劣行径和他继续宣扬拉萨尔关于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的谬论。指出，即使普鲁士王国对合作社帮助，其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

施，完全等于零，但是，它却要通过这种帮助收买一部分工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马克思特别指出：“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大失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1页）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三日，马克思在写给施韦泽的信中进一步揭露了拉萨尔“国家帮助”的反动实质，指出：这“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页）。

第三，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在德国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使他们提高思想觉悟，摆脱拉萨尔的影响。为了冲破拉萨尔派的头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阻碍，使“联合会”的广大群众认清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本质，马克思采用了巧妙的斗争策略，利用拉萨尔分子施韦泽主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论蒲鲁东》等文。《论蒲鲁东》一文是一八六五年一月马克思利用机会主义头子蒲鲁东死去的机会，用给拉萨尔派头目施韦泽写信的方式，在拉萨尔派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该文既是对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的盖棺论定，也是马克思特意为批判拉萨尔而写的。马克思在文中指出：蒲鲁东是一个“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8页）的人物，他的著作中充满了“自矜自夸的、

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5页）。他向反动的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蒲鲁东的假社会主义“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马克思在谈到写作《论蒲鲁东》一文的目的时说：在这一篇文章中，“某些十分无情的打击看来是为蒲鲁东预备的，实际上都击中我们的‘阿基里斯’”（指拉萨尔），“并且是存心这样做的”（《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页）。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德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为一八六九年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四，一八六四年九月第一国际的成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了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脱拉萨尔宗派主义的羁绊，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曾期望“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国际，以便通过国际的活动来影响德国无产阶级，使他们的斗争建立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原则和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但是，拉萨尔的继承人施韦泽和哈茨费尔特夫人等却制造各种借口阻挠“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直接同拉萨尔的继承人进行斗争。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写给施韦泽的信中，集中批判了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信中指出：拉萨尔“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因为他是一个宗派

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信中明确地批判了施韦泽打着阶级运动的幌子进行宗派活动的两面派本质，指出：“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1页）。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尖锐指出：“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六十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国家的统一成了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在对待德意志的统一问题上，在德国工人运动内部，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革命的路线，即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主张的，德国的统一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断加强与民主力量的联合，反对普鲁士封建王朝，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消灭一切封建势力，实行民主改革，最后达到全国的统一。这条路线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利益。另一条是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即为了向普鲁士王朝求得普选权，全力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意志，从而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统治地位，这是一条完全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当时在德国首先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线、反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倍倍尔当时领导着“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成立于一八六三年六月，领导权最初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手里，一八六四年倍倍尔当选为该组织领导成员后，逐渐向左转，成为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一八六七年倍倍尔任该联合会主席），也积极反对拉萨尔的机

会主义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帮助和指导，告诉他们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不要着急”，要“做得机智”（《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51页），同时要注意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划清界限等等，并帮助他们把先进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对拉萨尔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从一八六五年起到一八六九年六月先后退出了“联合会”，他们同倍倍尔一起，于一八六九年八月七日至八日，在德国的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通称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参照第一国际的纲领，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并宣布参加第一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德国工人运动就分成了两派：革命的爱森纳赫派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

一八七〇年七月，普鲁士王朝和法国统治者为了争夺欧洲霸权，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普法战争。法军首先进攻。不几天普军却全面反攻进入法境，直逼首都巴黎。这场战争引起了法国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公社革命。由于普鲁士在战争中获胜，促成了德国的统一。

德国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如何对待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问题上斗争尤为激烈。爱森纳赫派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路线，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初期，坚决谴责普法战争的双方政府都是为了王朝的利益。他们在普鲁士议会表决战时公债时，先以弃权表示反对，后则坚决投反对票，他

们还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了马克思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当他们遭到反动政府迫害时，仍然继续坚持斗争。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他们又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和声援。恩格斯赞扬他们说：“德国工人在最近这次大危机的时期表现得很出色，……倍倍尔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39页）。

与此相反，拉萨尔派奉行狭隘民族主义政策，不支持巴黎公社。对于普法战争，拉萨尔派则奉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政策，支持本国反动统治者的侵略战争。为了替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辩护，拉萨尔派的头目施韦泽竟胡说普法战争中由于法国首先挑起战争，对德国来说，不仅是对德意志人民的战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因而提出每一个德意志人要为祖国而战的荒谬口号。他们还无耻地给爱森纳赫派扣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派出他们的鼓动员，四处奔走，进行恶毒攻击，妄图搞垮爱森纳赫派。但是，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斗争中，爱森纳赫派的威信越来越高，拉萨尔派则众叛亲离，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和群众日益转向爱森纳赫派，组织日趋瓦解。一八七二年，拉萨尔派头子施韦泽与俾斯麦勾结并领取秘密津贴的事件被揭发了出来，更引起该派下层群众的不满，迫使该派的头目们耍了一场“换马”计，把施韦泽开除出去，借以继续欺骗群众。

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王朝虽然自上而下统一了德国，于一八七一年一月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但是，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代表正确路线的仍然是爱森纳赫派。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

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在统一德国和‘自上而下’革新德国问题上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能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3页）

（三）一八七五年围绕党纲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总清算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暂受挫折，英国工人运动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和工联主义的影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德国的工人运动则跃居前列。这是因为，德国由上而下地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以后，资本主义的工业飞快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加上一八七三年爆发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而德国无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在一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有了广泛传播。德国无产阶级根据多年斗争的经验教训，迫切要求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过去爱森纳赫派曾多次向拉萨尔派建议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但都遭到无理拒绝。由于爱森纳赫派路线正确，在德国影响越来越大，而拉萨尔派由于路线错误，越来越不得人心。一八七四年国会选举中，爱森纳赫派有六人当选，拉萨尔派只有三人当选，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德国广大无产阶级日益拥护爱森纳赫派，反映了拉萨尔派的日益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初，拉萨尔派为了保持自己在工人运动中摇

摇欲坠的地位，并妄图篡夺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一反常态，主动要求和爱森纳赫派合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非常重视，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两派的合并，但是他们特别提醒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拉萨尔派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是因为他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页）。是统一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基础上呢，还是倒退到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上呢？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革命者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页）。马克思非常重视纲领问题，认为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如果新的纲领不能“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但是，李卜克内西急于追求形式上的团结，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共同起草了一个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草案）》。一八七五年三月，当马克思、恩格斯从报上看到发表出来的纲领草案时极为愤慨，立即给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写信指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

以批判的《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页），是“道地的拉萨尔主义”（《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三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2页）。

纲领草案承袭了拉萨尔关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铁的工资规律、自由国家、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普选权、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等等一整套机会主义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这完全是鼓吹投降主义、社会改良和阶级合作，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维护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恩格斯后来尖锐地指出，由于接受了拉萨尔派的全部谬论，“爱森纳赫派事实上已成了拉萨尔派，至少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是如此”（《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九一年五月一——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7页）。

总之，这个纲领草案在理论上是对《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背叛，甚至同一八六九年通过的爱森纳赫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相比，也是一个倒退。在实践上，纲领草案是对巴黎公社革命和奔腾向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反动。它是处于绝境的拉萨尔派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大反扑，是爱森纳赫派的某些主要负责人“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马克思在四、五月间，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这个纲领性文献，对纲领草案进

行了逐条逐句甚至是逐字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对拉萨尔派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总清算，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投降主义的光辉范例。

《哥达纲领批判》是继《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最重要著作。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假社会主义谬论，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

拉萨尔鼓吹的“公平的分配”，不过是庸俗社会主义者的老调重弹。这一谬论否认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颠倒了法权观念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消灭私有制，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以便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拉萨尔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完全违背社会再生产原理的，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不过是一种反动的空想。马克思在对上述谬论的批判中，深刻阐明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他指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实行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这种痕迹的重要表现。

“按劳分配”虽然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它所体现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

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因为有的人劳动力强些，有的弱些；有的家庭人口多些，有的少些，每个人的富裕程度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差别，因而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

马克思在肯定“按劳分配”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它是一种“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不断革命，从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自由国家”的反动谬论时，极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拉萨尔的“自由国家”，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可以自由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它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

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和历史任务，根据历史经验尤其是巴黎公社的经验，预见到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目标，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的拼死反抗。因此，马克思在驳斥拉萨尔“自由国家”的反动谬论时，第一次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其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光辉思想是我们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一系列反动谬论。如揭露了拉萨尔只攻击资本家不攻击地主的反动实质，阐明了地主、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分配决定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反动的一帮”的谬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学说；批判了拉萨尔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批判了拉萨尔炮制的“铁的工资规律”，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获得解放；批判了拉萨尔唯心主义

国家观，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直接普选权”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的谬论，维护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的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只能“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页）产生。拉萨尔的谬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充分暴露了拉萨尔主义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极右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两派合并大会召开之前，就把批评意见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希望他们增强识别能力，坚持革命原则，修正错误。但是李卜克内西等人拒不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他们对纲领草案只作了细小的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就在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在哥达城召开的两派合并大会上匆忙通过。在这个合并的大会上，爱森纳赫派不但在纲领上表现了向拉萨尔派的投降，甚至在组织上也让拉萨尔派占据了多数和重要位置。合并后党的领导机构由五人组成，拉萨尔派占三名：第一主席（哈森克莱维尔）、第二主席（哈特曼）和一名书记（德罗西）；爱森纳赫派只占两名：一名书记（奥艾尔）、一名司库（盖布）（注：倍倍尔当时是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李卜克内西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负责人）。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页）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是作为党内文件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看的，主要是帮助他

们认识和改正错误，没有打算发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打算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公开表明他们对《哥达纲领》的原则立场，即“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这样做，既能回答巴枯宁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的诬蔑，表明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又能对德国党的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但后来的事态发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暂不发表公开声明，而是对《哥达纲领》保持沉默。主要是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蠢驴们把这个纲领当作共产主义的纲领加以攻击；德国广大工人对两派的合并表示欢迎，他们从革命的本能出发，对这个纲领也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另外，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有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也有利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才没有公开发表反对的声明。

（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拉萨尔主义的变 种和流毒的斗争

两派合并后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多年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们在实际活动中抵制了《哥达纲领》中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因而使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继续壮大。恩格斯曾说过：“个别领导人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害，已由群众的健全嗅觉弥补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16页）但是，由于两派合并是在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下进行的，必然带来

严重的恶果：一方面是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进党内，另一方面也使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大大下降。这便是后来德国党内不断出现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重要原因。

两派合并前后，德国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柏林大学的讲师杜林，也适应德国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竭力鼓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传播。杜林趁德国党内思想混乱之际，出版了一系列反动著作，与拉萨尔主义遥相呼应，向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疯狂进攻。

杜林的机会主义谬论虽然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主张有所不同，但他们鼓吹的都是极右的机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杜林和拉萨尔一样，以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作为其理论基础。拉萨尔把自己炮制的“国家帮助”、“自由国家”等黑货作为“救世仙方”，杜林则虚构一个“世界模式论”作为世界的模型，这就是杜林吹嘘的只有象他这样的哲学家才可以从自己的头脑中制造出来的各种完善的“公理”和“原则”，而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都必须和可以按照他制定的这些原则来解决；拉萨尔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的“救世主”，杜林也自我吹嘘他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

杜林主义和拉萨尔主义一样，要害都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拉萨尔鼓吹“议会道路”、“自由国家”，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杜林则妄图通过改良的道路来实现他的假社会主义，他把任何暴力都看成绝对的坏事，

反对暴力革命和革命暴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拉萨尔鼓吹建立一个“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假社会主义，杜林也声称，他的社会主义是以“普遍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的自然体系”，“以等量的劳动交换等量的劳动”，使生产者得到“自身劳动的全部产品”。

（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

在组织上，杜林这个野心家和混入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坦、莫斯特等相勾结，建立新的宗派，妄图分裂刚刚统一的德国党，破坏德国的工人运动。

一八七五年以后，杜林主义在德国党内迅速蔓延，这是两派按照机会主义路线合并的一种严重后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31页）。为了粉碎杜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进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于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写了名著《反杜林论》。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及其内在联系，全面地彻底批判了杜林的反动“学说”。《反杜林论》的发表，不仅是对杜林主义的毁灭性打击，而且也是对拉萨尔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公开清算。《反杜林论》的发表，有助于德国党的领导人和广大群众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界限，并将德国工人运动推向前进。

一八七八年十月，德国反动政府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法”、“非常法”），大搞白色恐怖。这时，党内又出现了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斯坦组成的臭名昭著的“苏黎世三人团”。这三人在瑞士的苏黎世出版机会主义刊物《社会科学年鉴》和《政治经济文丛》。他们继承了拉萨尔的衣钵，抛出了一个名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极右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纲领。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无条件地服从“非常法”，只搞合法的议会活动，“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他们抛出的机会主义路线给德国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当即挺身而出，于一八七九年九月联名写了给德国党领导机关内部传阅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对三人团的极右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苏黎世三人团”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斗争的继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党清算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结果，“非常法”时期反而成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胜利进军的时期。

一八九〇年十月，德国统治阶级眼见“非常法”已经破

产，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统治阶级在策略上的改变，使党内的机会主义又猖狂起来。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被统治阶级“自由主义”政策所迷惑，被德国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又把拉萨尔鼓吹的“议会道路”重新搬了出来。福尔马尔鼓吹统治阶级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转引自《恩格斯对福尔马尔等人的批判》一文，《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因此，社会民主党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员，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

福尔马尔的这一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得到了德国党内某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奥艾尔、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的支持，形成一股右倾机会主义逆流，在新的形势下威胁着德国党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非常法”一废除，“修改纲领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3页），德国党的领导机关已决定于一八九〇年十月在哈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起草一个新的纲领以代替《哥达纲领》。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认为，由于德国党是在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年七月在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建立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组织）内起着先导作用的党，它的一切都直接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兄弟党，也直接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所以有必要教育广大党员和党的领导进一步认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并使党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新的纲领，这样，公开发表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

批判》，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为了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阻挠发表这部著作的，一是德国党的领导人，如李卜克内西，因为“这个批判对他一直是如鲠在喉”（《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九一年五月一—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2页）。而倍倍尔由于担心公开发表会给敌人提供武器，也不赞成发表。二是德国党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党内的一些老拉萨尔分子，这些人一贯坚持机会主义观点和路线，他们公开反对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三是当时窃据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主编职务的考茨基，由于他从未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而也反对发表。一八九一年一月，年迈的恩格斯不顾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阻挠和机会主义者的反对，冲破重重关卡，迫使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当时斩钉截铁地对考茨基说，如果《新时代》拒不发表，我就要在维也纳发表，“无论如何总是会刊印出来的……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一月七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页）。恩格斯指出：“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为了批判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恩格斯在同年三月趁纪念巴黎公社革命二十周年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机会，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导言。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

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接着，六月底，恩格斯又写了著名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批判》。恩格斯这三个坚决行动，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教育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一八九五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后不久，老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就跳了出来。伯恩施坦竭力为拉萨尔翻案，并完全继承了拉萨尔主义的反动衣钵，炮制了他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以后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就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拉萨尔到林彪这类政治骗子，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所鼓吹和推行的路线以及他们所玩弄的两面派手法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和工人运动内的代理人，他们都千方百计地维护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机会主义纲领和路线的特点是开历史的倒车，搞投降主义，反对革命，反对前进。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企图把社会车轮“向后拉，开倒车”是“一切顽固党的思想”的共同特征（《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71页）。拉萨尔要把工人运动引向为封建的普鲁士王朝效忠的道路，向封建主投降；林彪则在“克己复礼”的黑旗下，向

地主资产阶级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投降，要在中国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从拉萨尔到林彪一类政治骗子，为了反对革命，搞反革命复辟，都要从历史的反动破烂中寻找思想武器。拉萨尔曾搬出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毕舍的“国家帮助”等等，作为旗帜挥舞；林彪则祭起孔老二的亡灵，大肆宣扬孔孟之道。

他们都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拉萨尔当着马克思的面，一再声称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而在背后却从不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无耻地抄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词句，当作自己的发明，用以装璜门面，用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林彪则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都狂热地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鼓吹天才论和唯心史观。拉萨尔鼓吹“没有最高权力什么也做不成”（见伯恩斯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他为了“伸手去取王冠”，无耻地把自己吹嘘为“科学的，发光的，纯钢武装起来”的“英雄”，群众的“救世主”；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大肆贩卖“天才”论、“超天才”论，甚至自比“天马”，在他们的那个反革命法西斯组织“联合舰队”中，规定队员要向林家父子王朝宣誓效忠。

然而，拉萨尔和林彪这一类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跳梁小丑都不会有好下场。拉萨尔早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林彪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也落得了一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

场。但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我们要从德国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吸取经验，进一步加深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长期性的认识，加深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始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的认识，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正是由于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从德国党的历史经验中，进一步加深对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的理解。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

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的头子，是第一个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是修正主义的祖师爷。

马克思主义在它诞生后的头半个世纪中，先后战胜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等等公开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趋向便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页）这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在第二国际内部出现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修正主义的集中代表。伯恩施坦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以“批评自由”和“发展”、“完成”、“改进”马克思主义为名，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否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鼓吹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否定唯物史观，鼓吹“唯生产力”论，否

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将永世长存；否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合作、通过议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的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变种，一个带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特点的机会主义派别。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其目的是要诱骗无产阶级屈从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工人运动走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道路，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完全是反科学的反革命理论。

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同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

（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笼和泛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页）伯恩斯坦主义在这个时候作为一种修正主义的国际思潮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

“和平”发展时期。这时，欧美许多国家先后产生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一八八九年建立了第二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长期的“和平”环境给第二国际各国党打上了合法主义的烙印。尤其是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机会主义分子就迷信合法斗争，宣扬阶级合作与议会和平过渡，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和平”发展环境就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滋长的温床。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逼近，垄断资产阶级在加强暴力镇压的同时，还侧重采取欺骗和改良的办法来麻痹无产阶级的斗志。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这种转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

垄断资产阶级还从他们掠夺得来的大量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政党的议会议员、工会官僚和熟练工人等，在工人队伍中培植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些人从世界观到生活方式都资产阶级化了，“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8页）。工人贵族阶层就是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支柱。

由于帝国主义的压榨而不断被抛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小生产者，也不断把资产阶级世界观带到工人政党中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总之，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直接产物，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直接产物。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有一个形成和暴露的过程。

爱德华·伯恩施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年），出生在德国柏林，其父起初是白铁匠，后来当火车司机。一八六六年，伯恩施坦中学尚未毕业，就到银行当学徒；一八七一——一八七八年，他一直在柏林当银行职员。他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八七二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后，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的问题上，他鼓吹与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妥协；随后又成为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的信徒。一八七八年十月，俾斯麦政府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德国党被迫转入地下。不久，伯恩施坦到瑞士的苏黎世，给德国党的机会主义者赫希柏格当秘书，协助其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和《政治经济文丛》。一八七九年他和赫希柏格、施拉姆联名在“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抛出了一个向资产阶级全面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他们鼓吹绝对不应反对资产阶级，而应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反对工人政党“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主张放弃所谓“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这个“苏黎世三人团”的投降主义和反党活动当即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揭露了“三人团”的阴谋，无情地谴责了伯恩施坦等人抛弃阶级斗争学说、取消革命的观点，指出“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末“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在伯恩施坦等人那里，“当做社会

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0、373、374页）。

伯恩施坦受到这次打击之后，反党气焰暂时有所收敛。从一八八一年一月起，他担任了德国党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一八八八年，伯恩施坦随该报从苏黎世迁往伦敦，在恩格斯的监督下继续从事该报的编辑工作，但这时他又醉心于英国费边主义（一八八四年，英国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善于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拖延战术著称的古罗马大将费边之名成立了费边社。他们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激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采取温和缓进的办法，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市政机构，逐步把土地和产业资本转为社会所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追随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灭亡规律的学说发生怀疑。

一八九〇年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德国党取得合法地位后，伯恩施坦就开始发表一些文章，偷偷摸摸地散播通过议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他便明目张胆地跳了出来，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修正”马克思主义。在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他在德国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借口时代发生了

变化，妄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一八九九年一月，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黑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简称“前提和任务”），集修正主义谬论之大成，使逐渐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系统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正”：

在哲学方面，伯恩施坦追随资产阶级教授，用康德的唯心主义代替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他声称唯物主义已经被“驳倒”，鼓吹“回到康德那里去”，诬蔑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贩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胡说“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他反对唯物辩证法的目的，正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学说的哲学基础，妄图从根本上推翻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还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历史观。他修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炮制出一个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按照这个“理论”，阶级社会的发展，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剥削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而只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伯恩施坦胡说：“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首先是近代生产的发展”，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伯恩施坦的“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性，就在于把社会变革单纯地解释为生产力的发展，根本抹煞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

用，抹煞了阶级斗争和群众自觉的革命活动在变革生产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伯恩施坦的“唯生产力”论，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直接对立的，也是他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否认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用唯心主义观点把价值说成是“纯粹思维的构想”；进而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假设为根据的公式”。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以必然爆发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个矛盾更加激化，因此，经济危机就更加频繁，更加严重。而伯恩施坦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竭力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否认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否认生产日益过剩，工人日益贫困；他竭力美化各种垄断组织，说它可以起减少危机的作用，大力吹嘘“现代经济的适应能力”，胡说可以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这样，伯恩施坦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趋于缓和而不是趋于尖锐，“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按《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是不可能的。显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抹煞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

在政治学方面，伯恩施坦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专政，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狂热鼓吹阶级调和论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他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胡说“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诬蔑暴力革命是“无谓牺牲”，主张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属于较低的文化”和“政治上返祖现象”，是“恐怖的独裁政治”，叫嚷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为了给自己制造论据，伯恩施坦还竭力歪曲和攻击巴黎公社，否认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起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他把巴黎公社歪曲为蒲鲁东式的联邦和地方自治；恶毒攻击巴黎公社降低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创举是幼稚的原始民主制度的要求。

为了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伯恩施坦还修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胡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已经把阶级斗争的基础消灭了；在先进国家中，阶级斗争已趋向温和，人类已进入一个用不着暴力革命的发展阶段。伯恩施坦就是以这种阶级调和论以及他炮制的“唯生产力”论为依据，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直接同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对抗。在伯恩施坦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从事一系列细小的改良运动，使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那时候，用他另一篇黑文，即《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中的话来说，“统治者的宫殿”“也就自然地崩溃

了”，资本主义也就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了。因此，他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用他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来说，就叫做“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事实上，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放弃政权，放弃剥削，放弃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伯恩斯坦竭力兜售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骗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永远埋头生产，不问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流传万世，使社会主义永远不能实现。

伯恩斯坦从否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他公开叫嚣要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改良的党”、“和平的党”、“民族的党”。他公然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而且要避免“一切突变式的发展及其一切恐怖和破坏”。伯恩斯坦完全背弃党的纲领，放弃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的公式。列宁指出：“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

第7页）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一部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投降书，它标志着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成，标志着修正主义的正式出笼。在当时的德国，两年多时间内此书就重印了多次；一九〇〇年就有法译本在巴黎出版，随后又被译为英国、俄国、荷兰、瑞典、保加利亚、日本等国文字在各国大肆抛售，这种“最平凡的作品，却有特出的政治意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43页）。此书的出版，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他们狂叫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驳倒”了；他们把伯恩施坦称为他们在社会民主党阵营的“最前哨”、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此书的出版，也立即得到隐藏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大声喝采。他们都麇集在伯恩施坦周围，以他为“中心”、“靠山”。从此，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思潮，开始被称为修正主义，叛徒伯恩施坦也就成了修正主义的祖师爷。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一出笼，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头子米勒兰立即把伯恩施坦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6页）。他在一八九九年六月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部部长，协助资产阶级镇压工人罢工，破坏工人运动。米勒兰之流无耻地把这种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说成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伯恩施坦也出面极力为米勒兰辩护，并且垂涎欲滴，跃跃欲试。接着，入阁事件又在英国、意大利陆续出现。

修正主义就这样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各国泛滥。法国的米勒兰、白里安之流，英国的海德门、麦克唐纳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比索拉梯之流，奥地利的鲍威尔、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经济派、孟什维克，保加利亚的宽广派以及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等国的修正主义者，都步伯恩施坦的后尘，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修正主义。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各国的修正主义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4页注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笼和泛滥给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严肃的战斗任务。无产阶级若不无情地揭露并战胜修正主义，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因此，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这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9页）。

（二）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迎头痛击

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后立即遭到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迎头痛击。

首先是德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起来回击。德国党在短短几年中连续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即一八九八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一八九九年的汉诺威大会，一九〇一年的卢卑克大会和一九〇三年的德累斯顿大会，辩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

在斯图加特大会上，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开始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左派卢森堡、蔡特金捍卫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原理，批驳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

斯图加特大会是德国党内反修斗争的开端。会后不久，卢森堡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这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批判伯恩施坦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反修著作，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革命文献。

在汉诺威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同修正主义者展开面对面的激烈论战。倍倍尔作了长达六小时的发言，尖锐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大卫，用了三小时为伯恩施坦作了有气无力的诡辩。由于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卡尔·李卜克内西、梅林等左派坚持斗争，大会经过三天的争论，终于以二百一十六票赞成，二十一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逐条驳斥了伯恩施坦的观点，重申了“党将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夺取政权”。

在卢卑克大会上，伯恩施坦公然叫嚣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大会在决议中指名对伯恩施坦提出公开的警告，要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否则就要他退党。

一九〇三年德国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这一情况使修正主义分子加深了对议会的幻想，在德累斯顿大会上，伯恩施坦之流就更加嚣张地提出当议会副议长的要求，妄想实现议会和平过渡。大会以二百二十八票对十一票通过了严

斥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卢森堡在大会上曾提议应该把投票支持伯恩斯坦提案的人开除出党，然而党的领导人力图保持党的统一而没有支持她的正确主张。

总的说来，德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同伯恩斯坦主义展开了斗争，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对于修正主义的社会阶级根源及其危害认识不足，害怕分裂，因而斗争很不彻底，特别是从一九〇二年起，还选派伯恩斯坦担任党的议会议员，纵容修正主义分子把持好些报刊和出版部门，肆无忌惮地放毒，致使修正主义势力日益滋长。

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起来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法国的拉法格写了好多反对修正主义的论著，批判了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议会主义的谬论。伯恩斯坦的“前提与任务”一书译为保加利亚文出版后，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领袖布拉戈也夫当即在一九〇一年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一文，指出，“伯恩斯坦主义无非是集所有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肤浅而无耻的‘批判’的大成”。当伯恩斯坦主义的病毒传到日本，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家片山潜在一八九九年一月东京社会政策学会举行的辩论会上就挺身而出，开始批判修正主义。

一九〇〇年九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同修正主义交锋的国际会议。大会主要围绕着米勒兰事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米勒兰之流极力为自己的背叛行为狡辩，胡说什么他参加内阁是社会党力量强大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起点。卢森堡针锋相对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性质决定，必

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可以成为执政的党。”左派在会上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实行断然制裁。在左派同右派两军对垒的关键时刻，考茨基以中间派的虚伪面孔出现，用隐蔽的形式为米勒兰开脱罪责。在他起草的决议中，竟把米勒兰入阁说成不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而是各国社会党人的具体策略问题，不必由大会作出决定。在考茨基的包庇下，这个模棱两可的被称为“橡皮性”的决议以二十九票对九票被通过了。这实际上是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投降，它使修正主义分子的叛卖活动合法化，为修正主义的进一步泛滥大开绿灯。会后伯恩施坦又立即发表文章为米勒兰辩护，胡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同资产阶级合作，“这不是例外，而是常规”。这表明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左派的力量一时还不够强大。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坚决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到底，并且在反修斗争中取得最大战果的，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八九九年八月，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所读到了伯恩施坦的“前提与任务”一书，感到极大愤慨。他在致亲属的信中称伯恩施坦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并且预言“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给玛·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1、241—242页）。列宁在给《工人报》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必须直接展开论战”（《列宁全集》第4卷第134页）来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并指出这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列宁选集》第1卷第202页）。一九〇〇年

列宁从流放所出来后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清醒地看到德国党和第二国际在反修斗争方面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主张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修正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在反修斗争中，列宁始终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了伯恩斯坦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三)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 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 ——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的斗争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伯恩斯坦主义作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就是同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作斗争。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后，各地先后形成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八九八年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但是大会的决议和宣言根本忽略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中央委员会也随即被沙皇政府破获，各地方组织缺乏统一领导，缺少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这样，俄国工人运动就面临着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准备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的任务。

但是，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青年人，趁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家被捕的机

会，利用“一大”以后党内分散的状况，结成了宗派，被称为经济派。他们通过《工人思想报》等报刊，大肆贩卖在欧洲“最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黑货。他们鼓吹工人阶级只应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说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他们反对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认为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工人运动应该走“阻力最小的路线”，用“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代替“夺取政权的意图”。他们迷信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赞美组织上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经济派甚至还极力地吹捧伯恩施坦，直接大量翻印伯恩施坦的著作。到一九〇二年时，伯恩施坦的“前提与任务”一书就已经有了三种俄文译本。伯恩施坦也把经济派介绍给德国公众，把一小撮经济派分子胡说成是什么俄国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可见经济主义同伯恩施坦主义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同流合污了。所以，列宁称经济主义是“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3页）。

经济派的行径，就是要使俄国工人运动从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倒退一大步，因此，列宁指出：当经济派扬言希望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甚至永远）停留在预备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立刻起来坚决反对这种倒退倾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50页），“只有进行直接和公开的论战，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思想，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发展”

《论〈PROFESSION DÉ FOI〉》，《列宁全集》第4卷第260页）。

为了从思想上建党，为了批判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一九〇〇年底出版了《火星报》，集中力量批判经济主义思潮，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先进无产者，把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连成一气。尤其是一九〇二年列宁所写的《怎么办？》一书的发表，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经济主义的任务。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首先揭穿了修正主义者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口号的思想实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自由”（《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6、226—227页）。列宁坚定地表示，不管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自由地”走向什么地方，哪怕是走向泥潭去，而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7页）。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伯恩施坦主义者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其次，列宁批判了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

伯恩施坦曾经说过：“一种理论或者原则宣言，如果不是

广泛到足以容许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照顾到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那末总是要被突破的”（见“前提与任务”）。这是明目张胆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的经济派步伯恩施坦的后尘，否认革命理论的作用，认为工人运动本身能产生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给工人群众。列宁指出：“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254页）。否认革命理论的作用，就意味着使工人变成资产阶级政策的俘虏。因此，列宁强调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242页）。

再次，列宁批判了经济派和伯恩施坦派鼓吹只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的改良主义谬论，阐明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

经济派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良经济状况而斗争”，“最适合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等等。这是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的翻版。列宁在批判这一谬论时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页注①）。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

级斗争必须“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77页）。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还批判了经济派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谬论，阐明了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意义。

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的表现，是欣赏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尤其是反对建立集中的秘密的革命政党。当时，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最迫切的首要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列宁深刻地论证了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他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45、337页）。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了三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战胜了经济主义。经济派这一称号在党内变成了一种侮辱性的称号。

在反对经济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一九〇三年七月——八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在布鲁塞尔，后移至伦敦秘密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制定党纲、党章，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在制订党纲时党内爆发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首先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展开。革命派主张党纲中应列入无产阶级专政，机会主义派则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选举等自由当做目标，实际上就是伯恩施坦的通过普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他们还以不能“跟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大相同”为借口，反对写入无产阶级专政。这就表明他们妄图在俄国建立象第二国际那样不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政党。经过斗争，革命派取得了胜利。党纲中载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的所有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中，这是唯一列入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革命纲领，这是列宁所创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施坦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正如列宁所说：“在这个党纲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且正是由于反对伯恩施坦、反对机会主义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5页）

大会在讨论党章时，斗争也非常尖锐。列宁主张党员应当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不让投机分子混入党内；马尔托夫则认为党员不必参加党的组织，只要“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工作就可以了，也就是要建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类型的组织松散的政党。显然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建党路线。由于马尔托夫这种错误观点得到了当时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支持，大会最后通过了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有七个机会主义者退出了大会，列宁派居于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俄文音译，即多数派之意）；马尔托夫派退居少数，称为孟什维克（俄文音译，即少数派之意）。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诞生。

大会之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

更加尖锐了。孟什维克进行宗派活动，篡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机关报，鼓吹党不应当是有组织的整体，可以听任每个同情党的人自行宣布为党员，诬蔑党的纪律是农奴制，主张倒退到“二大”以前的小组涣散状态上去。列宁于一九〇四年五月出版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系统批判了孟什维克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经过“二大”，党本来已经克服了小组习气，前进了一步，而孟什维克要开倒车，要使党倒退两步。列宁痛斥孟什维克的倒退行径，他深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509页）。

列宁论证了党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与广大群众联系的体现，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必须有严格的纪律。

孟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是从伯恩斯坦那里抄袭来的，因此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的支持。当时德、法、意等国党内流行着反对集中制，削弱党的纪律的修正主义倾向。考茨基就公开叫嚣他“坚决赞成马尔托夫”（转引自艾津：《20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他们并且扬言俄国党的任务就是和集中制的极端作斗争。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和德国党曾多次干涉俄国党的内部事务，妄图消灭布尔什维克，扶植孟什维克上台。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革命原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并使俄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一九〇五年一月在俄国爆发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大革命。怎样对待这场革命成为党面临的头等大事。不顾孟什维克的阻挠和破坏，一九〇五年四月，布尔什维克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孤立资产阶级；必须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

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分裂的代表会议，制定了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他们认为俄国革命不过是过去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演，因而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要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不应以自己的革命行动吓退资产阶级，以免缩小革命的规模；必须通过召开国家杜马（杜马是俄文音译，意即议会），用和平方式改革沙皇专制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应该使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不当也不可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过是伯恩斯坦之流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和劳资合作、议会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变种。

伯恩斯坦之流非常害怕俄国革命的烈火烧到西欧来。一九〇五年五月，伯恩斯坦发表了一篇反对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演说，直接反对正在兴起的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认为“罢工拖延得越久”，就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的贫困，它不会创造出什么”，诬蔑工人阶级的罢工是拿自己的“切身的利益进行赌博”，断言议会制不会麻痹群众，等等（见《政治性的群众罢

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这充分暴露了伯恩施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主义面目。伯恩施坦之流还极力袒护孟什维克。他们以“调解”为名，力图干涉俄国党内事务，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甚至想用国际仲裁法庭压服布尔什维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持原则立场，坚决地顶住了国际机会主义者对俄国党内事务的干预，维护了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时期列宁还写了许多著作，特别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系统地批判了修正主义策略路线，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路线。

一九〇五年十月俄国爆发全国政治总罢工，十二月爆发了莫斯科武装起义，革命达到高潮。沙皇政府残酷地把革命镇压下去之后继续对革命力量猖狂进攻，全国布满绞架。

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孟什维克惊慌失措，悲观失望，堕落为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取消派。他们美化沙皇的反动统治，幻想沙皇会对人民开恩，胡说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提出建立“公开的工人党”的投降主义的口号，迷恋于参加“俄国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实际上就是要使党变成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类型的“合法党”，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合法斗争当做唯一斗争的形式，妄想实现议会和平过渡。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这时则否认党必须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来改变斗争策略，反对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进行斗争，特别是主张把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来，故被称为“召回派”。与此同时，取消派、召回派等机会主义分子，为了给其机会主义的

政治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在哲学上组成了联合阵线，猖狂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动进攻。他们和伯恩施坦之流“回到康德去”的叫嚣相配合，大肆鼓吹唯心主义，妄图用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经验批判主义（又称马赫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面临着社会反动势力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联合进攻，党处于严重危机时期。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仍然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发展新的革命运动，保卫党的秘密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列宁彻底地批判了取消派的投降主义方针，指出取消主义是“走到了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59页）。它们“不仅是要取消（即解散，毁坏）工人阶级的旧有政党，而且是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64页）。列宁还严厉批判了取消派的议会主义、合法主义，指出它们是希望在沙皇专制的统治下，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公开的范围内。列宁同时彻底地批判了召回派的机会主义实质，指出它们拒绝利用合法机会进行斗争，就是要使党脱离工人阶级，放弃党的领导权，使秘密党组织失去掩护，闭关自守，因此，召回派是“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列宁全集》第15卷第330页）。列宁认为，取消派和召回派都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他们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

个斗争联系起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第413页）。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完全对立，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定地认为，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并没有解决，深信革命高潮必然还会到来，主张应该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斗争，同时以合法组织、合法斗争为掩护，把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积蓄革命力量，争取广大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为贯彻执行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巧妙地利用了国家杜马、职工会、合作社和一九一二年四月创办的《真理报》，进行革命斗争。

在思想上，列宁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一九〇八年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光辉著作深刻地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俄国马赫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可知论，精辟地阐明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理；粉碎了马赫主义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罪恶目的，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马赫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批判了马赫主义者反动的唯心史观；全面地阐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揭露了马赫主义标榜“无党性”的虚伪性。列宁这部哲学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来武装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

列宁在同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反复阐明了同顽固的机会主义者在组织上公开决裂的必要性。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斥责了取消派的错误立场。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会议，

最后把死不悔改的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并且选举了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从此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上成为独立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长期斗争的伟大胜利。正是这个以列宁为首的党，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大多数党公开叛变的历史转折关头，坚持斗争，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

(四) 以列宁为代表的各国左派在国际舞台上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一九〇三年，列宁在俄国创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后，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有了一支新生的劲旅，从而反修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从一九〇四年布尔什维克党首次出席第二国际的阿姆斯特丹大会开始，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为止，以列宁为代表的各国左派在国际舞台上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十年当中，第二国际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即一九〇四年八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七年八月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一〇年八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几次大会上，针对帝国主义加强扩军备战、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着重讨论了反对军国主

义、民族殖民地、党的策略原则等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当时修正主义势力日益抬头，而左派的力量还较小，他们对于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认识还不够，所以斗争是相当艰苦的。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坚持团结，发展左派，争取教育中间派，孤立、打击右派，会上会下相结合，进行了艰巨、复杂的工作，终于挫败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使这四次大会通过了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决议。

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成立，党内就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一个是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派。一九〇四年，布尔什维克就打破了孟什维克的阻挠，委派列宁、利亚多夫和克拉西科夫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第二国际六大。列宁因要主持同时在瑞士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会议而未能出席大会，他指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要逆流而进，协同各国左派，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并且亲自校阅了送交大会的《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材料》，其中正确反映了俄国党内革命派同修正主义派的斗争过程，指明了孟什维克是制造分裂的罪魁祸首。

这次大会再次就米勒兰事件讨论了社会党人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在大会召开前夕，伯恩斯坦发表《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和社会党的策略》一文，继续为米勒兰辩解，鼓吹同资产阶级激进政党“结成同盟”，“其中包括参加政府”，

明目张胆地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倍倍尔、卢森堡在会上揭露了入阁主义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无情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者以策略为借口而出卖革命原则的伎俩。经过激烈争论，大会终于以二十五票赞成，五票反对，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坚决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反对同资产阶级政党打得火热。

在这次大会上，伯恩斯坦钻进了大会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鼓吹社会民主党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必须实行殖民政策。这种露骨的帝国主义论调居然反映到大会的议案中来，这说明修正主义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第二国际于一九〇七年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来自五大洲二十五个国家的八百八十四名代表参加，盛况空前。列宁第一次亲自出席大会并且同伯恩斯坦之流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大会主要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问题。会上提出了四个草案，其中：有的不区分战争性质，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有的只限于号召用各种合法手段反对军国主义；有的简直充满了沙文主义精神，叫嚷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要保卫祖国；只有倍倍尔的提案，正确指出了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战争；但是它错误地以防御或进攻作为区分战争性质的标准，并且由于害怕党的合法地位受到威胁而不敢提出反军国主义的坚决措施。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提案，同时认为倍倍尔的提案有正确的部分，而且它是整个德国党代表团的名

义提出的，容易为大会通过，所以就决定以倍倍尔的草案为基础加以修改。列宁亲自与倍倍尔交谈多次，并且同卢森堡一起提出了修正案。修正案强调指出：帝国主义策动的战争得到民族主义偏见的支持，因此要努力用关于各族人民团结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阶级的青年，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反对战争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而定”；如果爆发战争，就要“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引自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这一修正案获得了大会的通过，从而就为无产阶级指明了用革命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修正主义的正确路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明确地意识到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坚定不移地决心斗争到底，准备采取最革命的斗争手段——这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的意义”（《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750页）。

大会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伯恩施坦等人又赤膊上阵，宣扬什么“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伯恩施坦在会上公开叫嚷：“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统治的，一种是被统治的。有些民族还是小孩子，他们自己不能发育。”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腔调，居然在大会上得到不少人支持，这说明修正主义已经深入第二国际的肺腑。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在会上两派势均力敌，斗争空前激烈。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替

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745、744页）。由于各国左派团结了没有实行殖民政策和深受殖民政策之害的中小国家的代表，在表决时终于以一百二十七票对一百〇八票否决了修正主义分子的提案，通过了左派的提案，它比过去的决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

会后，列宁仍然把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放在首要地位。一九〇八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发表了一篇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战斗檄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全面揭露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深刻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科学分析了修正主义的产生根源，精辟论述了反修斗争的伟大意义。

一九一〇年召开了第二国际八大。列宁第二次亲自出席了大会，并且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在修正主义者抛出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提案中充满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黑货，鼓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发展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美化“合作社可以帮助工人准备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民主化和社会化”。列宁指出：使用“民主化”、“社会化”这种含糊不清的、模棱两可的词句，是修正主义者的“拿手好戏和特殊嗜好”（《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列宁全集》第16卷第279页）。列宁代表俄国党提出了与修正主义针锋相对的草案，但未能获得通过。为清除提案中的修正主义毒素，列宁和各国左派一起曾作了种种努力。由于左派的坚持，最后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合作社运动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但是它仍然是阶级

斗争的一个有效武器，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即夺取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并实现所有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公有化。”这就针锋相对地批判了修正主义。

这次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修正主义分子又一次跳出来，妄图翻斯图加特大会的案。各国左派痛斥了修正主义谬论，使大会通过了基本正确的决议。

由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日益逼近，第二国际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提前召开了九大。大会通过了号召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巴塞尔宣言》。“宣言”揭露了英、俄、德、奥等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指明了正在酝酿的战争完全是帝国主义性质，重申了“七大”、“八大”制定的反战原则，呼吁世界人民用“一切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警告资产阶级政府不要忘记普法战争曾引起巴黎公社，日俄战争曾引起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历史先例，表明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战争，欧洲无产阶级就要“采取极端行动”，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修正主义者尽管在会上还在喋喋不休地鼓噪，但是迫于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反战斗争的压力，他们便在大会上采取两面派手法，虚伪地举手赞同这个“宣言”。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绝大多数党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就撕去了假面目，践踏了《巴塞尔宣言》，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投入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怀抱，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帝国主义的军事拨款，甚至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号召无产阶级为了“保卫祖国”而互相残杀，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叛

卖。曾在第二国际中起先导作用、同时也是伯恩斯坦主义发源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场大叛卖中充当了反革命的急先锋。伯恩斯坦等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议会议员，在议会中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一起，投票赞成战争预算，号召工人“在战争中支持政府”，甚至派人到前线“激励士气”，公开暴露了他们的投降派的可憎面目。伯恩斯坦还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的叛卖行径涂脂抹粉，说什么“德国人民的代表就这样向敌国显示了一条统一战线”。什么“统一战线”？实际上完全充当资产阶级的走狗，为帝国主义的对外掠夺效犬马之劳。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带头之下，二十几个党都纷纷公开叛变了。这标志着第二国际的破产，亦即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破产。

当时，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左派，逆流而进，以《巴塞尔宣言》为武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坚决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开除，不顾帝国主义政府和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种种迫害，毅然决然投票反对战争预算，揭露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罪行，声讨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行为。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1、683页）的行动纲领，提出了在政治思想上清算修正主义、在组织上与修正主义决裂、建立左派组织和第三国际的战斗任务，为无产阶级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革命路线。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马列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

大胜利。

但是，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对于他们的失败是不甘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人民欢欣鼓舞，而伯恩施坦则极端仇视。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是“奴役无产阶级”（见《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是“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东方的暴君专制并列”，是“军国主义”（见《拉萨尔和布尔什维主义》）、“恐怖主义”（见《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九二〇年版跋），等等。伯恩施坦还积极参与破坏和镇压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但是，革命的领导权却被党内右派篡夺了。他们组成了临时政府。伯恩施坦担任了这个政府的财政部“助理”，为这个政府出谋划策，竭力美化这个反革命政府，并无耻地吹嘘右派领导的“革命”“几乎没有使任何人伤了一根头发”（见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是的，地主、资本家的确没有“伤了一根头发”，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却人头落地。正是在伯恩施坦参加政府期间，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社会民主党的右派杀害了。

修正主义头子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九二〇年伯恩施坦在修订重印他的“前提与任务”黑书时，公然厚颜无耻地说：“列宁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代表，曾经因为本书而给予它的作者以叛徒称号的光荣。”把耻辱当光荣，这说明他已经死心踏地甘当帝国主义的奴才。一九二四年，伯恩施坦在其“自传”中声明：“我所提倡的是修正”，“我不能收回任

何有重要意义的论点”（见《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一九三二年底，伯恩斯坦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死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地袭用。”列宁在其反修名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列宁选集》第2卷第9页）。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老的修正主义破产了，新的修正主义又冒出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存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出现、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叛徒，还是刘少奇、林彪这样的政治骗子，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是伯恩斯坦之流老修正主义的翻版。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2页）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批判资产阶级，自觉地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五、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是一个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考茨基主义是继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之后出现的一种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过极为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考茨基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马列主义路线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斗争主要围绕着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斗争的焦点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

马列主义在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自己，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前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各国共产党的诞生，第三国际的成立，宣告了考茨基主义的可耻失败和彻底破产。

(一) 考茨基主义的出现和危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笼和

泛滥，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逐渐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列宁为代表，右派的头子是伯恩斯坦，“中派”即隐蔽的机会主义派的头目就是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年），生于布拉格（当时属奥匈帝国）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画家，其母是作家和演员。他在九岁时随家迁居维也纳。巴黎公社革命以后，考茨基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一八七四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开始大量阅读社会主义问题的有关著作。但是，他信奉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醉心于新马尔萨斯主义、杜林主义、拉萨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说和机会主义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则抱着淡漠和不信任的态度。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热衷于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出人头地。

一八七五年，考茨基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奥地利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一八八一年，考茨基通过倍倍尔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个浑身沾满了德国小市民庸俗习气的学究式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当时就指出他“平庸而目光短浅”，“是个天生的俗种”（《马克思致燕妮·龙格》·一八八一年四月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1页）。恩格斯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一八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11页）。在革命导师的教育和指导下，考茨基写了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一七年，考茨基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

机关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主编。一八九一年考茨基到德国以后又以这一身份参加党的领导机关的活动，并屡次代表德国党参加第二国际的大会。因此，他虽然没有在第二国际担任具体职务，也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却成了第二国际和德国党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

但是，由于他没有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根本不接触工农大众，因此，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来没有得到改造。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列宁指出的，考茨基“从来不是一个在严重危机时期能立刻站到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的人”（《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78页）。在同伯恩施坦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他采用折中主义手法，装出一副公允、调和的面孔，实际上总是公开地或隐蔽地站在机会主义者一边。

考茨基一八八〇年认识了伯恩施坦，很快就同他“情投意合”，把伯恩施坦看成自己的“一位强有力的引路人”。当伯恩施坦跳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时，他“深有同感”（见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在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考茨基总是采取庇护、姑息的态度，力图缓和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斗争，抹杀两者的原则分歧。

一八九八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当革命派起来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时，考茨基却百般为他辩护，胡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八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一八九八年德文版）

一八九九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革命

派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要求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考茨基又作了调和主义的发言：“我们大家还承认伯恩斯坦是同志，他几十年来都是和我们站在一起战斗的。当他发表了一些会把党引向错误的观点时，必须反对他，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使他痛苦。”（见《汉诺威代表大会记录》，德文版）

一九〇〇年，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在激烈辩论米勒兰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时，考茨基又一次表现了动摇和变节，他站在为米勒兰的叛变行为辩护的立场上，提出了“关于夺取政权和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决议，声称是否参加反动内阁问题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个策略问题，不应当由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而应该由各国党自己去解决。这一决议毫无原则，模棱两可，被称为“橡皮性决议”。也是从这次大会开始，形成了以考茨基为首的暗藏的机会主义——“中派”。

考茨基虽然迫于广大党员和群众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形势，也曾经同伯恩斯坦进行“论战”；但是正象他后来所招认的，他起来反对伯恩斯坦是“极勉强”和“被迫的”。而且在“论战”中，考茨基总是竭力回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要害问题，声称对此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见《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列宁尖锐地指出：“这不是反驳伯恩斯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3页）。

考茨基为什么对伯恩斯坦脉脉深情？他自己供认说，这是因为把他和伯恩斯坦连在一起的不仅是个人的友谊和政治

上的一致，而且还有理论上的血统关系。

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尖锐化，考茨基便一步步滑进修正主义的泥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便投向资产阶级一边，成为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彻底地暴露出了反革命真面目，他疯狂地攻击、恶毒地诽谤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和凶险的敌人。此后，他变本加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写了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猖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三八年，考茨基死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考茨基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即考茨基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已经形成，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他的修正主义理论，集中表现在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考茨基竭力宣扬“议会道路”，鼓吹“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来“夺取国家政权”（见《新策略》），而“不必使用暴力手段”（见《库诺夫对马克思国家理论所作的阐述》）；胡说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见《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用所谓的“纯粹民主”和“一般民主”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考茨基为了替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制造理论，还捏造了“超帝国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胡说资本主义的矛盾可能缓和下来，各国金融资本会用对世界的联合剥削来代替相互的斗

争，世界会进入“超帝国主义”的“新希望和新期待的时代”

（见《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考茨基还大肆兜售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宣扬什么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工人阶级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工业还不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提高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为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卖命，才有可能通向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形式。十分清楚，“超帝国主义”论也好，“唯生产力”论也好，要害就是不许革命，不许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是考茨基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革命运动。这个时期，西方工人运动面临着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合法的、公开的斗争，组织和训练队伍，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未来的战斗。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参加了合法斗争。这种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合法斗争，使合法主义、议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各党中滋长起来。无产阶级在合法斗争中取得的成绩，使考茨基这样一些工人运动“领袖”迷住了心窍。他们把合法斗争当成唯一的斗争形式，把利用议会变成盲目崇拜议会，变成了合法主义者、“议会迷”，成为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的俘虏。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了，无产阶级革命更逼近了，这时，资产阶级在加强暴力镇压的

同时，还加强政治欺骗、经济收买和思想腐蚀，在无产阶级内部寻找代理人。他们用掠夺来的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政党中的议会议员、工会官僚、熟练工人等，培植工人贵族阶层。这些人从资产阶级吃人的筵席上得到一点残羹剩菜，摆脱了贫困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也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成为工人运动中的投降派、资产阶级的看门狗。

列宁指出，“中派”即考茨基派“是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吏”（《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4页）。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批小生产者破了产而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传统习惯带到工人队伍中来。小资产阶级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有某种反帝要求；但是，这个阶级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他们总是幻想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修补帝国主义的基础。考茨基主义正是代表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28—829页）

考茨基主义作为中派主义，不仅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笼以后，再次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一方面是修正主义思潮十分猖獗，右派非常嚣张，另一方面是一些左派领袖反修斗争还不坚决、不彻底。这样，那些混杂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动摇分子，象考茨基这样的“脚踏两只船”（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9页）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对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他们打起“中派”的旗号，装出不偏不倚的面孔，采取调和折中的手法，极力维持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左派同右派的团结、统一，实际上起了掩护修正主义的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30页）。

综上所述，考茨基主义“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解体、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考茨基主义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成了“为害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列宁：《给亚·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七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6页）。一九一四年十月，列宁写道：“我现在最憎恨最鄙视的是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独立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给亚·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1、152页）。

考茨基主义之所以成为主要危险，这与其特点有密切关

系。考茨基主义是一种隐蔽的机会主义，它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它搞折中主义，行“中庸之道”。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已经原形毕露，完全投降资产阶级，群众已经觉悟过来并且唾弃这些叛徒。这时，考茨基之流用“超帝国主义”等伪装得更为精巧的理论，替机会主义的投降行径辩护，大搞诡辩，“证明”革命不合时宜，力图维护机会主义对群众的影响，使无产阶级服从机会主义路线。所以，这种隐蔽的机会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列宁说得好：“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列宁还指出，“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考茨基主义之所以成为主要危险，还因为它不是一国的现象，而是一种嚣张一时的国际思潮。它在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的哈阿兹，奥地利的阿德勒，意大利的屠拉梯，法国的龙格，英国的麦克唐纳，俄国的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等这样一些国际上典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都窃据着各国党的重要职务。而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考茨基，这个“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则号称第二国际著名的“理论权威”，他利用自己的声望，耍弄两面派手法，蒙蔽了不少人，包括许多左派人物。所以，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成为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性问题。

列宁认为，工人阶级若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考茨基主义，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列宁发扬了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同这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考茨基及其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考茨基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和“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即以德、奥等国为一方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等国为一方的协约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

战争撕去了隐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叛徒的假面具。各交战国家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在战争一开始就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头扎进资产阶级的怀抱，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狂热地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掠夺战争。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成为公开的投降派。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8页）。他们不仅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而且派人到前线给士兵打气，到国外游说，散布沙文主义。

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彻底地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无情地谴责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叛徒行为，响亮

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1、683页）的革命口号，为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规定了唯一正确的行动路线。

为了击败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列宁用了很大力量来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是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暗藏的投降派。他对帝国主义战争采取了狡猾的态度。这时，他“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战争一开始，他就无耻地背叛了他签过字的《巴塞尔宣言》，要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表决战争拨款案时弃权，或者只在“政府保证不使战争失去防御性质”的条件下才投赞成票。这表面上似乎同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有所不同，实际上只是更虚伪罢了。“弃权”实际上是默认；另外，帝国主义战争本来就不是什么“防御性质”，本来就是掠夺性的战争。他还在《新时代》杂志连续发表了《战争》、《战争的影响》、《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和战争》等文章，千方百计地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为第二国际的叛卖行为辩护。他瞎说帝国主义列强“没有一个真正要战争”，“每一个国家都仅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而战”（见《战争》）。他竟要求党员和工人群众放下“批评的武器”，同反动政府“和平合作”，“一致对外”，并荒谬地声称，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同等的义务”“保卫祖国”（见《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叫嚷现在的实际问题只有一个：“是本

国胜利还是本国失败”（见《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无耻地歪曲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辩护。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等文章中，对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战争的阶级性，这是摆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基本问题。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地分析战争，指出任何战争都是和产生它的阶级政策相联系的。列宁引述了“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指出只有分析战争是由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才能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英、法、俄、德、意、奥等国的统治阶级，在战前几十年来实行了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考茨基所谓的“国际主义”，说穿了无非是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国家而让各国无产阶级自相残杀，这表明考茨基已堕落到比叛徒还可耻的地步。

列宁还批判了考茨基为社会帝国主义制造理论根据而玩弄的诡辩手法。

考茨基诡辩手法之一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时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他胡乱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每次战争一爆发，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那方。列宁严正地揭穿了考茨基这种偷天换日的把戏，指出拿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来同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反动的战争对比，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牛头不对马嘴。

考茨基诡辩的另一个手法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孤立的、片面的、歪曲的考察，说什么这次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它还带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虽然有帝国主义的趋势，而人民群众却有“民族的”要求。列宁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具有民族因素的只有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但这只有从属的意义，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当帝国主义者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目的、欺骗群众的时候，“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人，那就是愚蠢透顶的学究或滑头的骗子”（《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43页）。

考茨基诡辩的又一手法是歪曲事实真相，硬把一些显然荒谬的话硬加到左派身上。当时左派就对待战争的态度提出的抉择是：或者使无产阶级政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或者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考茨基却硬说左派好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就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造成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没有气节和叛变”。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考茨基的罪恶目的，是妄图用这种欺骗和捏造的伎俩来“击败”左派，蒙蔽群众，掩护一小撮机会主义首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耻贩卖。但是，不管考茨基如何耍弄诡辩的把戏，也掩盖不住其叛徒嘴脸。当时，在德国党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无不愤懑地唾弃这个为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所热烈拥护的“权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既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又兜售社会和平主义。他一忽儿高喊“保卫祖国”，为帝国主

义战争辩护，一忽儿鼓吹“和平”，为资产阶级麻痹革命人民效劳。

在战前几年中，考茨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战争的根源说成是由于各国的军备竞赛和所谓的“互不信任”造成的，鼓吹通过德、英两个帝国主义大国来带动其他国家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关于裁减军备的国际协定来“保障”和平，使“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永远告终”（见《五一节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并且散布裁军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一九一五年上半年，这个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又伙同伯恩施坦等人抛出了《当务之急》的呼吁书，虚伪地谴责战争所造成的“牺牲”和“破坏”，诡称支持人民的“和平热望”，鼓吹交战国双方“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从一九一六年下半年起，世界政治形势中开始出现由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转变的迹象。交战国双方都已疲惫不堪，资源耗尽，人民不满和愤恨，革命情绪日益强烈。资产阶级害怕继续进行战争会引起革命，因此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开始酝酿签订和约，打算“和平”分赃。这时，考茨基又进一步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竭力宣扬帝国主义能“带来和平”，“甚至能保障世界和平”（见《帝国主义战争》），妄图利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要求和平的情绪，掩盖帝国主义的本质，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

列宁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说教。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争取和平的斗争应该同反

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否则就是空话和谎言。“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0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和平口号必须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如果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他们所渴望的和平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0—271页）。考茨基大念和平经，企图用歌颂和平的靡靡之音来安慰怨气冲天的群众，实际上起着牧师和资产阶级辩护士的作用。列宁指出：社会和平主义者与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帝国主义都需要的“两种色彩的奴才”（《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3页）。

列宁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论‘废除武装’的口号》等著作中批判有些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废除武装”口号的错误时，也直接打击了考茨基所散布的社会和平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因为除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外，还有革命战争。而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4、875页）当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就等于放弃一切革命。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不管考茨基煽动社会沙文主义也好，鼓吹社会和平主义也好，实质只有一个，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斗争制止战争，利用战争造成的政治、经

济危机进行革命，妄图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以便扑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考茨基为了给自己投降帝国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耻行径制造理论根据，他在大战期间，精心地捏造出“超帝国主义”的谬论，并在他所写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等黑文中大肆宣扬。

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见《帝国主义》）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经的特殊的最后阶段，而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即兼并政策。这种“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远远不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还是“最费钱和最危险的”（见《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基于以上谬论，考茨基得出结论说：“从纯粹的经济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见《帝国主义》），那时，“各国金融资本间的相互斗争”将为“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见《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这样，就可能带来资本主义的“新希望”，就将出现一个裁减军备和持久和平的“新时代”。从这个虚伪的理论出发，考茨基高傲地教训无产阶级说：“谈论资本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破产”还“为时过早”（见《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帝国主义结成“国家联盟”才能“夺得权力”（见《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

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固有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战争的进行又促使这些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加深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促进了阶级斗争的急剧发展和各国革命形势的日益成熟。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分析时代的主要特征和世界的基本矛盾，怎样认识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及其历史地位，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战争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才能制定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掩盖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成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具有重大的意义。革命导师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进行系统的、周密的、全面的研究，于一九一六年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划时代的著作，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特征、帝国主义的本质、矛盾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批判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种种反动谬论，阐明了反帝必反修的光辉思想。

首先，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批驳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

列宁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

义在经济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指出帝国主义根本的经济特征就是垄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对内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从而更加激化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外加紧侵略扩张，掠夺别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民，这就必然加深了帝国主义同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这就说明，经济上的垄断，必然引起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列宁严厉地批驳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指出它的错误在于：把帝国主义仅仅归结为力图兼并，并片面地强调这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没有说明“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混合生长起来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帝国主义不仅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

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定义之所以背离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它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他把帝国主义说成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好象在垄断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可以采取另一种政策，即和平的、民主的政策；好象经济上的垄断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政策相容了，金融资本对世界领土的分割也可

以不采取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了。这完全是散布帝国主义的本性可以改变的谬论，是企图掩饰与缓和帝国主义固有的深刻矛盾，为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制造根据。所以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定义“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1页）。

其次，列宁阐明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揭露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在否认帝国主义争霸世界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帝国主义之间争霸并发生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必然要在世界上争夺原料、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争夺世界霸权。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而帝国主义霸权是以其实力为根据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实力总是不断变化的。这就必然引起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从而造成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帝国主义之间也有勾结、结盟，但是，勾结是为了争夺；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结盟是相对的、暂时的，其争夺则是绝对的、长期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割裂了帝国主义联盟和战争的内在联系，否定了帝国主义联盟的相对性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列宁指出，同考茨基的市俗幻想相反，现实中的帝国主义联盟，不管形式如何，“都不可避免

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38页）。

第三，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指出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理论。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垄断的统治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全面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基本矛盾的激化又大大地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列宁根据他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分析，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即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进了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4页）。

但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则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深刻性。他胡说今天的资本主义“远比半个世纪以前更有生命力”（见《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五分册），无产阶级只有坐待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结成“国家联盟”以后，才能“夺得权力”（见《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正如列宁指出的，这就是要转移群众的视线，使人们不去注意时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和平的希望，来对群众进行安慰和欺骗，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列宁深刻地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

工人贵族和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阐明了反帝必反修的光辉思想，揭露了考茨基竭力维护同机会主义的统一的反动意图。

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日益激化，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只靠自己的力量已难以维持其反动统治，因此更需要在工人队伍中寻找代理人。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广大殖民地而享有高额利润，所以在经济上也有可能去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造成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从生活到世界观都资产阶级化了。这个阶层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支柱，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传播者。

考茨基虽然口头上也表示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但却对资产阶级分裂工人队伍的反动措施闭口不谈，不去说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兼并问题上，他只反对别国的兼并，而不反对本国对外兼并，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德帝国主义和公开的机会主义者的欢迎。所以，列宁指出，考茨基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都贯穿着一种尽力保持欧洲工人运动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机会主义统一的意图”（《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40页）。

列宁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43页）。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伟大理论，彻底粉碎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列宁的这一伟大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矛盾，认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认识现代战争的根源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认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我们批判苏修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的修正主义理论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列宁在科学分析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原理。他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列宁这一光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是对考茨基之流所鼓吹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有力批判。叛徒考茨基歪曲马克思主义，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胜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不占人口的多数，便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来进行革命，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到遥远的未来。正是根据这一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考茨基根本否认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伟大的列宁驳斥了考茨基的谬论。列宁关于一国数国无

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胜利的理论，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引着各国无产阶级为在本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信心百倍地进行斗争。

(三) 十月革命前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列宁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列宁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帝国主义战争引起革命危机。革命首先在俄国爆发。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革命路线指引下，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可耻叛卖，也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够和组织不够，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在国外或国内流放所，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利用布尔什维克在街头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机会，趁机在大多数苏维埃组织中窃取了多数，他们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使苏维埃变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终于使政权完全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于七月运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人民，使布尔什维克处于地下状态。但这反过来促使俄国人民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

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迫切任务。

同时，在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的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德、法、英、意等国无产阶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罢工运动，有的甚至发展成武装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国家，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成为理论和实践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列宁主义同考茨基主义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叛徒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2页）。他坚持“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观，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议会迷考茨基早在一八九三年就鼓吹资产阶级的议会是“为各个极不相同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见《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他进一步鼓吹“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胡说什么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只能是“通过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但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见《新策略》）。

考茨基在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竭力回避和否认由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必然得出的结论，即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非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后来，考茨基更进一步污蔑主张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是什么“无政府主义”。

考茨基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在国际上起着很坏的影响。当时，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多得多。

考茨基的上述机会主义观点成了孟什维克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影响尤为恶劣。二月革命以后，普列汉诺夫等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挥舞着“唯生产力”论的破旗，叫嚷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革命果实让给资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来又和资产阶级勾结一起，窃取革命成果，镇压革命人民，策划立宪改良的骗局。因此，列宁认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2页）。

列宁在侨居瑞士期间，于一九一六年秋和一九一七年初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著作，查阅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书籍。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间，在革命斗争极端紧张，环境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列宁在匿居地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写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不朽名著。

为了恢复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之流所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理论；阐明了从《共产党宣言》以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伟大发展；总结了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以来近七十年国际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丰富经验；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立场。

列宁针对考茨基之流的超阶级国家观指出，国家是阶级

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8页）。列宁驳斥了考茨基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美化，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政治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地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压迫、镇压人民。往后，列宁又指出：“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对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利用它，而只有用暴力革命打碎它、摧毁它，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对考茨基之流否认和攻击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言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

列宁着重揭露了考茨基一伙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企图和手法。考茨基把阶级斗争局限在经济斗争、议会斗争等资产阶级许可的范围内，根本不敢去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反对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批判时指出：“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列宁针对考茨基鼓吹“纯粹民主”、否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进一步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质”（《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性，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阶段的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列宁设想的是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在对生产

资料的关系上，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取消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列宁强调指出：“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社会主义阶段“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是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列宁既指出了按劳分配的历史作用和不可避免性，又指出了它的弊病是会使人们产生“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4页）。因此，他强调绝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要向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继续前进”（《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8页），“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257页）。因此，既要看到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历史作用，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缩小、直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切表现。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经验，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把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直接联系起来，把限制

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任务，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 and 解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为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道路。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历十月）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段，为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沉重地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无情地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谬论。因此，国内外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者对十月革命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们拚命地反对，疯狂地破坏。国际上，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八年春联合对苏维埃发动武装进攻；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也积极配合，发动武装叛乱。他们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把日益高涨的各国革命重新镇压下去。

在这股反苏反共的妖风恶浪中，叛徒考茨基充当了急先锋，彻底撕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成为公开的投降派。一九一八年夏，考茨基写了反动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考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问题上修正主义理论的全而、露骨的表述，“是用市侩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考茨基在这株大毒草中，鼓吹“纯粹民主”，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

“专横”、“毁灭民主”；咒骂苏维埃政权是“早产”的“孩子”，“活不成”等等。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为了粉碎考茨基的疯狂进攻，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月，在被刺养伤期间，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光辉著作，痛斥了考茨基的谬论，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这个叛徒的可憎面目，指出他“在对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斯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是个后生小辈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628—629页）。

列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叛徒考茨基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行径。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偶尔用过的一个“词儿”，并把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统治状态”，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通过“民主选举的方法获得多数”所产生的状态。这就隐瞒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标志——革命暴力。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无耻捏造，指出把马克思著作背得烂熟的考茨基明明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谈论了四十年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也就是说的无产阶级专政。针对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歪曲，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一个科学定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

列宁还彻底批判了考茨基关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有所谓“纯粹民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要“一律平等”的谬

论，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考茨基在其反动的小册子中，大谈所谓的“纯粹民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如何如何“优越”，攻击苏维埃政权是“消灭民主”。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指出：“‘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页）世界上从来没有有什么“纯粹民主”，有了资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选集》第3卷第630页）。而“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选集》第3卷第634—635页）

考茨基还离开阶级内容大谈“多数”同“少数”的关系，说什么剥削者是极少数，劳动者是多数，多数应同少数“平等”。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批驳这一谬论时强调指出，剥削者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的实际力量比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他们有很大的优势，他们绝不会甘心失败，“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反抗”，而“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列宁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他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死亡，他们总要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进行复辟活动；而且小

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会“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一九二〇年列宁更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反动谬论。这部书的发表，给了叛徒考茨基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考茨基在遭到列宁的毁灭性的批判以后，并不死心，于一九一九年又抛出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毒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续篇。在这一反动小册子中，他又一次疯狂地攻击苏维埃政权是实行“恐怖主义”，“是俄国迄今有过的一切暴政中最暴虐的一个”。他还把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老二作为“仁爱”的象征抬出来，说什么因为亚洲“诞生了孔子”，所以苏维埃政权还不配称“亚洲式的社会主义”，而应称之为“鞑靼式的社会主义”，即最野蛮、暴虐的社会主义。考茨基的黑书一出版，立即受到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的电台、报纸纷纷介绍、报导。列宁在《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痛斥了考茨基直接替资产阶级帮腔的反动言论。

叛徒考茨基不仅摇晃笔杆，大造反革命舆论，而且一有机会就把他的叛徒理论付诸实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爆发了革命，但是社会民主党右派窃取了革命果实，他们同考茨基的“中派”联合成立了反革命的临时政府。考茨基在其中担任了短时期的外交部副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右派召开资产阶级式的“国民议会”的主张，竭力反对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把苏维埃和国民议会结合起来。这是他的反动理论破产的表现：考茨基没有胆量正视这样的尖锐问题——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却企图把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这就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5页）。考茨基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竭力阻挠德国与苏维埃俄国恢复外交关系。他担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空谈了一个多月的“社会化”，但是结果没有一个地主，也没有一个资本家的财产被没收。当右派血腥地镇压革命，无耻地杀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时，他竭力为右派辩护、开脱，又一次扮演了可鄙的角色。列宁愤怒地痛斥了社会民主党右派杀害革命左派的卑劣行径和赞美“纯粹民主”、实则“没有廉耻，没有良心”的叛徒考茨基。

考茨基还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自由派勾结起来反对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〇年八月，他应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邀请，到格鲁吉亚访问。孟什维克把他当成“导师”、“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之父”；考茨基则吹捧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

政府是“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东方地区的“榜样”。后来，当这个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政府被推翻时，考茨基连连哀叹“可惜”，哀叹“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未结出果实之前就被活活折断了”（见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考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丑恶表演，充分说明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

（四）列宁为建立第三国际、反对考茨基 复活第二国际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就指出，第二国际已经死亡，不值得在旧的基础上恢复它。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列宁为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建立第三国际，恢复和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同考茨基主义一直进行着剧烈的斗争。

大战期间，各国党内的左派人数很少，列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一九一五年九月，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齐美尔瓦尔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中，考茨基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占了多数，左派居少数地位。列宁出席了会议，组织并领导左派同考茨基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真正的左派占少数，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被接受。但是经过斗争，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贯彻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宣布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保卫祖国”的口号，谴责机会主义违背斯图加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的决议。列宁指出，会议通过

只有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才是社会主义的整个将来”（《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60、57页）。齐美尔瓦尔得派后来虽然被考茨基派破坏而陷于瓦解，但是团结在列宁周围的左派不断成长起来。他们成为各国革命群众的真正领袖、冲击资本主义的先锋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骨干和核心。

十月革命以后，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在许多国家已经显露出来。一九一八年一月，维也纳爆发了总罢工。一九一八年十月，捷克、匈牙利相继宣告独立，奥匈帝国土崩瓦解了。十一月，波兰也宣告独立。同月，柏林工人和士兵举行起义，德皇被迫退位，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组织政府，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法、意等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在革命浪潮中，各国的革命左派领导群众进行英勇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们经验不足，力量薄弱，没有彻底揭露机会主义者并及时与之决裂。因此，机会主义者帮助资产阶级绞杀了群众的革命运动，革命先后遭到失败。

这些情况，使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政党。在革命浪潮的基础上，许多国家里相继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到一九一九年初，就有三十九个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者的组织。

列宁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的成立，为第三国际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亲自领导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三

的宣言“在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方面迈进了一步”（《第一步》，《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3页），但是，它有不彻底和不坚决的缺陷。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了宣言的缺点；同时，为了团结大多数，他们在宣言上签了字。

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成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此后，列宁把反对考茨基派斗争的重心，移到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参加者内部。

一九一六年四月，在瑞士伯尔尼附近另一个村庄——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代表会议，主要讨论了争取结束战争、无产阶级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等问题。会议前夕，列宁就指示国外各左派支部动员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一切力量，选举左派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力量有了新的发展。经过列宁的斗争，会议通过了谴责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决议；但是会议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基本原则。

在大战期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同考茨基派作过某些妥协，一起开过会，发表共同宣言；但是，列宁坚定地认为，同机会主义者和好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或放松反对考茨基派的斗争，并且继续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路线。

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左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

方面来。第二国际的一些旧政党包括“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钻进第三国际，以便继续混在工人运动中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and 帮凶，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间，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政党，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考茨基等“中派”分子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与右派“分离”而成立的）等，都虚伪地声明退出第二国际，要求加入第三国际。这种情况“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险”（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1页）。因为，“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为了克服这个危险，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防止考茨基派等机会主义派别混入第三国际，列宁起草的并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明确规定只有同机会主义派别决裂，才能加入第三国际。

围绕着对列宁制定的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的讨论，各国社会党内的左派同“中派”、右派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和德国共产党合并。法国、瑞士、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也相继和“中派”、右派决裂，组成了共产党。这时，伯尔尼黄色国际在工人群众中已经臭不可闻，考茨基也极端孤立。为了欺骗群众，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各国“中派”政党和集团又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积极筹备成立“中派”国际组织。一九二一年二月，在考茨基的积极鼓动下，“中派”分

十个国家的代表。列宁就大会的主要议题——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了报告，在报告中，进一步批判考茨基之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其投降主义实质。他说：“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3卷第718页）。大会接受了列宁的思想并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行大联合的同一时期，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个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社会和平主义者麇聚在伯尔尼，举行他们的代表会议，企图复活在大战中已经破产了的第二国际。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右派和“中派”的第一次联合会议。会上，协约国和同盟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追究战争的责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中派”分子则竭力在两者之间调和。考茨基在会上大力鼓吹右派和“中派”“密切合作”，以便反对“两种危险”，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民族主义。考茨基还再次恶毒地咒骂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会议通过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所以这次会上成立的伯尔尼国际是一个“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是“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7、459页）。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同伯尔尼国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纷纷离开伯尔尼国际而站到第三国际

子在维也纳组成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维也纳国际。这个“国际”貌似公正，口头上也批评伯尔尼国际，实际上遵循着和伯尔尼国际一样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被称为第二半国际。然而，“中派”和右派只不过脸谱不同，其阶级基础和阶级实质则是共同的。因此，到了一九二三年，维也纳国际又和伯尔尼国际在德国汉堡举行合并大会，成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而在一九二二年，以考茨基为头子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少数派也已重新并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右派完全合流。事实证明，折中、“公允”、调和的考茨基与公开、露骨的修正主义者完全是一丘之貉。

此后，这个无耻的叛徒一直在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活动中度过他的残年。

考茨基虽然死了，但是反修斗争并没有结束。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曾经预言，几十年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定会出现新的考茨基之流（参见《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5页）。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列宁的英明预见。这种考茨基式的人物，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因此，今天学习马列主义同考茨基主义斗争的历史，仍然有重大意义。

考茨基一贯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号，被第二国际公认为“理论权威”，实际上却是一个典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他根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从而在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鼓吹“阶级合作”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其要害都是反对无产阶级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投降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反对打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他们的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苏修叛徒集团鼓吹“议会道路”、“全民国家”、“全民党”等反动谬论，说明他们完全是考茨基的徒子徒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林彪一类骗子，叫嚷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暴政”、“绞肉机”；他们鼓吹“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与考茨基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

考茨基的一生，由向机会主义退让、妥协到堕落成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头子，这说明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毛泽东，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托洛茨基是联共(布)党内和第三国际时期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炮制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的首脑,是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另建托派第四国际的罪魁。

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前后进行了三十多年。从一九〇三年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时候开始,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分两步走还是两步并作一步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一国取得胜利等一系列问题上,列宁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多次坚决的斗争。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以后,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托洛茨基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需要,恶毒地攻击列宁,拚命地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破坏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这时,托洛茨基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斯大林为了捍卫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领导全党同托派反党集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

这场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获得胜利的问题。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理论——“不断革命”论,就是专门用来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的。其特点是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这场斗争,是一场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坚

持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彻底胜利，托洛茨基主义遭到彻底失败而结束。这场斗争的胜利，巩固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为后来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一）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生和影响

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当时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右倾机会主义，即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在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时候，掩盖着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托洛茨基主义。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已经声名狼藉的时候，混进苏联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就改变手法，以极端“革命”的姿态，抛出了他的反动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口头上拚命鼓吹“不断革命”，实际上是不断取消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词句外衣的另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就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头子在不同的情况下改头换面，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出现的规律性现象。但他们的目的是不变的。他们总是妄图把革命群众引上邪路，从内部来瓦解共产主义运动。

列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年），出身于俄国埃利萨弗特格勒（后改名为基洛夫格勒）市郊的一个富农家庭。青年时期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思潮的影响，曾经参加过反对沙皇的活动。一八九八年被捕，流放

于西伯利亚。一九〇二年逃往伦敦，参加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工作。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间，托洛茨基曾标榜自己是《火星报》的拥护者。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九〇三年秋天，他开始暴露了机会主义面目，同年底，成为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506页）。从那时起，他朝三暮四地动摇于自由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抄袭个别字眼和响亮的词句，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反对列宁主义。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他进而堕落为孟什维克取消派。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清洗出党、形成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时，他已不在党内。这时他打着非派别组织的旗号，大搞派别活动，另行建立反党联盟。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胜利后的革命高潮时期，他又进行政治投机，表示悔过，又归附于布尔什维克党，并窃据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十月革命胜利后还窃据了人民外交委员（外交部长）和人民军事委员（国防部长）等要职。从此，他利用自己在党内所窃取的那部分权力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罪恶活动。伟大导师列宁逝世之后，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苏联。在国外，托洛茨基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四〇年八月，托洛茨基被其党徒杀死于墨西哥，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托洛茨基一生所贩卖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货色呢？

托洛茨基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托洛茨基

说：规律“是预先预备的，而且包含在钢似的公式中的”（见《文学与革命》）。他把人的思想看成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的东西。他还说：“一般支配特殊，定律支配事实；理论支配个人经验”，是他的“哲学的人生观的基础”（见《托洛茨基自传》）。他否认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否认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从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他形而上学地规定了自己政治活动的原则。他说：“社会革命的激进主义——是我整个的内部生活之永远的枢纽”（见《托洛茨基自传》）。这是托洛茨基经常披着革命外衣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想根源。

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史观是唯生产力论。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地‘夺取政权’，而是已成为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的政治统治。”“假如没有生产力的增长那就谈不上所谓社会主义的问题。”（见《苏俄之前途》）从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托洛茨基否认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俄国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

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路线是所谓“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声称他的“不断革命”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的”（见《〈不断革命〉论》）。一是所谓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这个“不断性”，实际上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可以直接把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日程”；因为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营垒”，农民是没有革命性的“落后的一帮”，只有“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见《〈不断革命〉论》）。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仅要立即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立即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样民主革命可以与社会

主义革命一起完成,从而成为“不断革命”。可见他所说的“不断革命”,恰恰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否认革命的阶段性。这种“左”倾空谈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单枪匹马地冒险蛮干,实则是破坏革命、取消革命。二是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这个“不断性”,实际上是要一步登天,一下子建成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进行,否认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无产阶级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且“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见《不断革命论》)。可见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就是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民的小私有制同时一起剥夺,而且还要用比对资产阶级更加彻底的办法来剥夺农民。这种谬论的要害仍然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结果必然是破坏工农联盟,从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一种形“左”实右的反动谬论。三是所谓世界革命的“不断性”。这个“不断性”,实际上是否认各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他认为:既然农民是反动的,无产阶级在国内找不到同盟军,那么,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只有把革命推进到其他国家去,得到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直接援助,才是出路。他说:“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前提”(见《不断革命论》)。如果世界革

命不能同时胜利的话，那么，哪一个国家都不要带头去进行革命。显然，这是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号，从根本上破坏世界革命、取消世界革命。

贯穿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的一条黑线，就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否认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力量，这表明他与鼓吹农民反动性的拉萨尔、考茨基之流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极右实质。他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剽窃了“不断革命”的词句，只不过是為了掩人耳目、蛊惑人心。

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路线是分裂主义。前期，托洛茨基“主张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在一个党内共处并组织各种大小集团的理论”（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2页）；后期，他鼓吹极端民主化的理论和“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论”（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6页）。托洛茨基鼓吹这些“理论”，都是为着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团结。

在实际活动和作风上，托洛茨基大搞阴谋诡计，大耍反革命两面派。他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姿态来歪曲列宁、污蔑列宁、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他背着党中央：招降纳叛，组成托派反党集团；他采取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等手法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妄图分裂党；他甚至策划暗杀和暗害活动，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党夺权，在苏联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在许多国家都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追随者和鼓吹者，他们

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为武器，否认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事实，反对工人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反对在一定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要求党内派别活动自由。

托洛茨基主义的披着革命外衣的特点，使它在一部分缺乏革命坚韧性的怀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的群众中和缺乏革命锻炼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各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托派集团和托派思潮严重地破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和国际马列主义者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二）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间。”（《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449页）这是托洛茨基前期机会主义活动的特点。从一九〇三年起，他象变色龙一样，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多次进行反党活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掩盖不了托洛茨基的反动本质。

一九〇三年七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的建立。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而托洛茨基却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列宁，认

为党员可以不必参加党的组织，只要在党的机关监督下工作就可以了。实际上是主张建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类型的组织松散的党。

一九〇五年俄国爆发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洛茨基剽窃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第一次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不断革命”论。他认为在俄国革命中，“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7页）。他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6页）的口号。列宁批判了这种荒唐的“不断革命”论。他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种理论是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混淆起来。列宁认为：当时，俄国虽然已经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是还存在着封建农奴制度的严重残余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广大人民首先迫切要求消灭封建主义、推翻专制制度。因此革命应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由于工人阶级占人口中的少数，它只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孤立资产阶级，才能推翻沙皇政府，取得革命的胜利。“不断革命”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跳过尚未结束的农民运动”，要工人单枪匹马去夺取政权，把夺取政权当作“儿戏”（列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24卷第29页）。这一方面是否定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的历史必然性，其结果必然把农民推到资产阶级一边，而使革命遭到失败。这和孟什维克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是资产阶级的支柱，无产阶级不应和农民接近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质上是同样的。

“不断革命”论实质上是以革命词句伪装起来的孟什维主义。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解决，革命必然还会重新高涨；但在低潮时期党应采取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合法斗争掩护秘密斗争，保存并扩大秘密党，重新争取群众，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时孟什维克堕落为取消派，他们否定革命有重新高涨的可能；反对任何秘密斗争，主张在绝对合法的范围内活动。他们可耻地放弃党的纲领，放弃革命，企图取消秘密的革命党。托洛茨基实际上同取消派唱一个调子，但是他却卖力地标榜所谓“非派别性”，声称他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外。当一九一二年一月孟什维克取消派被清洗出党之后，托洛茨基却在一九一二年八月，把所有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集团和派别纠集起来，结成了以他为首的反党的“八月”联盟。列宁揭露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他指出，托洛茨基自命为超于一切派别之上，但他的行为表明他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486页）；“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活动’，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495页）；“托洛茨基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4页），是“厚颜无耻的犹太什克·托洛茨基”（《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犹太”是《圣经》中记载的出卖耶稣的叛徒，西方人习惯以犹太作为叛徒的同义语。“什克”在俄文里是小称语尾，这里含有轻蔑之意）。列宁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彻底揭露并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反党派

别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把自己装扮成中派主义者。他口头上大谈“国际主义”，实际上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竭力反对列宁提出的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唯一正确路线。他认为：在战争中“俄国失败”只会“瓦解无产阶级的意志”（见《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使无产阶级“组织涣散”（见《军事涣散和政治前途》），而且必然加强德国的力量，给德国革命者“制造了困难”（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暂时胜利了的俄国革命，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流产”（见《战争与国际》）。实质上他还是在鼓吹他的“不断革命”论，即“同时胜利”论。列宁与托洛茨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夸夸其谈，遇到三棵杉树就迷路了。他以为希望俄国失败，就是希望德国胜利。列宁还指出，“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本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页）托洛茨基对战争的观点同沙皇政府、同资产阶级的观点相同。“托洛茨基……原则上对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点也不赞同，但是实际上对他们的一切都赞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2页）。他的言论和德国的考茨基所说的使德国失败就是使俄国胜利同出一辙，结果势必得出“大家都有同等权利保卫祖国”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结论。所以列宁称托洛茨基是“为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给亚·米·柯伦泰》，《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4页）。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托

洛茨基重新混入党内。他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十月武装起义。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联共（布）党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决议，规定了立即发动起义的方针。托洛茨基在会上虽然没有公开举手反对这一方针，但他却采取阴谋手段来破坏武装起义。他提议在决议上加进一个“修正”，即写明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不要开始起义，也就是故意推迟起义日期，以便敌人赢得时间从各地调兵遣将，集中力量来打击革命。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一提议之后，托洛茨基便利用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公开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他说：政权转移“将由全俄代表大会来实现。需要不需要武装发动，这将取决于意图破坏全俄代表大会的那些人们。……到今天，我们还是争取避免冲突的。我们希望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能依靠全体人民已经组织起来的自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转引自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他还预先告诉临时政府，在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布尔什维克不会起义，实际上这就是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使敌人做好扑灭革命的准备。列宁痛斥了这种叛卖行为。他指出：“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领导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第26卷第65页）

托洛茨基破坏十月武装起义的理论根源是“不断革命”

论。早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他就抛出了一本名为《和平纲领》的小册子，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竭力鼓吹俄国革命能否胜利取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同时发生的谬论。他叫嚷，“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九月他又发表文章说：“俄国的命运现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工人的失败将把我们抛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见《国际主义的策略》）。正是由于他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所以他反对十月武装起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时间，巩固红色政权，建设自己的红军。国际帝国主义则企图拖住俄国继续进行战争，阴谋拖垮苏维埃政权。他们还积极策划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曾向一切交战国提出和平谈判，可是遭到英法帝国主义拒绝。于是列宁英明地决定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单独与德国和谈，并准备缔结和约。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他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他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1页），反之，“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

列宁的革命路线，遭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的疯狂反对。他们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主张继续进行战

争。托洛茨基在布哈林的配合下，提出了“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定和约”的口号。他利用自己担任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同德国代表团进行谈判时，拒绝执行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和约的指示。当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时，他竟然发表声明说：苏维埃政府拒绝在德方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同时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政府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员军队。这是地地道道的叛卖行为。托洛茨基的叛卖性政策是建立在“不断革命”论基础上的。他声称“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地拯救”苏维埃政权；签订和约会“失去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的“同情”；如果得不到欧洲的支持，“我们将被击溃”（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的这种反革命罪恶活动，促使德军发动了新的全线军事进攻，占领了很多苏维埃领土，并威胁着首都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处于十分危急之中。在国家存亡的严重关头，列宁领导全党在反击侵略军、保卫祖国的同时，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指出，他们执行的叛卖性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完全适应了俄国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需要，因为正是俄国资产阶级“要把我们拉进对于我们最不利的战争中去”（《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全集》第27卷第69页），因为正是“帝国主义分子很想把我们这个力量暂时还很薄弱的国家拖去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用最便宜的方法来摧毁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问题提纲的补充说明》，《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5页）。列宁指责他们“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4页）。列宁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在谈判中发表的那个

挑拨性叛徒式的声明，事实上是要挑起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德国帝国主义这一行动，正是“受各国资本家委托，要窒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归还沙皇”（《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全集》第27卷第15页）。所以十分明显，托洛茨基这种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断送苏维埃政权”（列宁：《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

列宁还在党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列宁曾一度处于少数地位，但由于列宁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和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终于使中央大多数同志觉悟过来，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击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党中央通过了立即与德国签订和约的决定。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托洛茨基的叛卖，虽然和约的条件比以前苛刻得多，但是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列宁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革命策略的范例，是列宁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由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苏联争得了暂息时机，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苏联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地制定新的方针政策，吸引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领导他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但是阶级敌人却妄图利用经济困难和工农群众的不满情绪，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适应他们的要求，乘机向党进攻。就在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又跳出来兴风作浪，挑起了关于工

会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远远超出了工会问题本身的范围，它涉及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党对待工会，对待群众的方法和态度等政策问题。

托洛茨基提出了所谓“拧紧螺丝”和“整刷工会”的口号，提出立刻实行“工会国家化”（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73页）的要求。他反对向工人群众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主张把军事工作方法搬到工会里来，用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迫使工人群众迅速从事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托洛茨基抛出这一反列宁主义路线的罪恶目的是要破坏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更直接的，是妄图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进而瓦解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得到了“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布哈林的“缓冲派”等反党集团的拥护和配合。列宁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列宁阐明了工会的作用和性质以及在工会中所应采取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工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页）。工会是党与工人阶级和群众联系的纽带，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蓄水池’”（《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04页）。在工会中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列宁，《再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列宁还批判了托洛茨基及其帮凶布哈林散布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谬论。在争论中托洛茨基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认为，二者有同等价值，应该统一起来。他站在折中主义立场上为托洛茨基帮腔。列宁驳斥了托洛茨基把经济凌架于政治之上和布哈林的折中主义观点。他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页）。

经过全党争论，托洛茨基的路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表决通过了列宁关于工会问题的政纲，肯定了工会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应把全部工作建立在说服方法上。鉴于托派等派别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更大的危险，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论党内统一》的决议。决议斥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并责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命令禁止一切派别活动，规定凡是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这对托洛茨基一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进行公开的派别活动有了莫大困难。

直到列宁逝世以前为止，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整整进行了二十年。但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的反革命本性

很难改变。托洛茨基分子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列宁逝世以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狂，因而斗争也更加激烈。

(三) 列宁逝世前后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资产阶级不仅扼杀了德国、保加利亚和波兰的革命，而且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也蠢蠢欲动，时刻图谋复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并且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物价高涨，工农业产品差价过大，工业品滞销，工资发不出去。国内外的形势都要求联共(布)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但是托洛茨基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的机会，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代表国内的反动阶级，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一九二三年底，他把一切反对列宁主义的分子，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纠合在自己周围，发表了四十六名反对派政纲（即四十六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书），反对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机关。他们胡说党中央关于降低日用品价格、打击私人资本等经济措施都是错误的，预言国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叫嚷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并要求党内有派别活动的自由，硬说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托洛茨基于十二月八日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了一封向党进攻的信。在信中，他把党员群众同党的领导机

关对立起来，把青年党员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他打着恢复和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号，要求更换干部。同时却对青年党员和青年学生百般笼络，煽动他们起来反对党。托派一伙竟用非组织手段把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名反对派政纲印发给各区组织和各支部，强迫全党进行争论。

当时，联共（布）虽然忙于更为紧迫的经济恢复工作，但是还是接受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战，在全党展开了大辩论。斗争异常激烈，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工厂和高等学校到处发表演说，攻击党的领导机关，嚣张一时。斯大林领导广大党员迎头痛击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进攻。十二月十五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直接回击了反党集团的挑战。广大的党员坚决站在党一边，给托派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只有极少数的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拥护托洛茨基分子，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一九二四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总结了这次斗争。代表会议指出，托派分子攻击党的经济政策，是妄图要党“放弃新经济政策而回到战时共产主义”，要党“对国际帝国主义作重大的经济上的让步”（《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代表会议严厉谴责了托派分子的反党派别活动。会议还分析了托派分子言论的性质，指出，他们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是直接离开列宁主义”，“其用意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提醒全党“应当看到这种危险，并密切注意保护党的无

产阶级路线”（《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

在会上，斯大林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并批判了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了“十大”关于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斯大林还揭露了他们称天才的诡计：托派分子一面伪善地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一面却狠毒地咒骂列宁同志是“不学无术的人”，是“寡头政治家”。斯大林尖锐地指出：“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后来，在联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批判了托派分子的错误并论证了这场争论的意义。他指出，反对派“向党的机关宣战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坏党。唆使青年反对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瓦解党。为集团自由而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粉碎党，粉碎党的统一。用蜕化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是的，同志们，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场争论”（《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1页）。

托派反党集团虽然遭到迎头痛击，但是并没有停止反党活动。他们阴谋策划，等待时机，准备向党发动更加猖狂的进攻。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逝世了。托洛茨基以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十月的教

训》、《论列宁》等论文。在这些黑文中，他采取伪造和篡改革命历史的卑鄙手法，无耻地进行自我吹嘘，把功劳归于自己；同时肆意地歪曲列宁的形象，恶毒地破坏革命领袖的威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阴谋篡改党的指导思想、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从而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为了捍卫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和列宁主义，斯大林挺身而出，与反革命托派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斯大林作了《论列宁》的演说；四月，作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说；十一月，又作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斯大林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这伙叛徒的无耻吹嘘和捏造，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和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托洛茨基贪天之功为己有，胡说他早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就独自想出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制定的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斯大林批驳说：胡诌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是极其荒唐的，是“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页）。事实上，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刚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就认为必须同托洛茨基划清界限”（《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页）。曾经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当时托洛茨基“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并表示“完全赞成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页），才得以混入党内。

托派分子胡说，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处于地下状态，曾经犯过错误，不是起义的领导者，十月革命的唯一领

导者和组织者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痛斥了这种奇谈怪论。他指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比较后起的人物，决不是什么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和“首要人物”。斯大林说：“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5页）。

托派分子还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而在国内战争时期是使战争获得胜利的唯一或者主要的组织者。斯大林揭露了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叛卖行为，并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列宁的领导下，红军正是抵制了托洛茨基的作战计划，才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反革命叛乱。

托洛茨基还阴险地把列宁描写成为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重要问题的官僚，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斯大林愤怒地驳斥了这种卑劣的诬蔑，并指出：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的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集体领导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决定问题，他是一个无情的革命家，但他是谨慎的，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他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

斯大林还深刻而鲜明地刻划了伟大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他指出，列宁是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革命暂时失利的时候不灰心，在革命胜利的时候不骄傲，他信心百倍、谦虚谨慎地领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革命道路前进。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总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斗争，敢于顶住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的歪风邪气。他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在党内的多数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个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页）。

在保卫列宁的同时，斯大林深刻地指出：“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页）。但是由于列宁主义享有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已不敢公开反对列宁主义，而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页）。因此，托洛茨基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奇怪的定义，他说：“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1页）。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话都很漂亮，很象音乐，还可以说，甚至很雄壮。只是缺少一点‘小东西’：简单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宁主义定义。”（《论我们党内的社会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45页）托洛茨基还散布一种所谓列宁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才产生的谎言。托洛茨基污蔑列宁主义的谬论，得到了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头子季诺维也夫的附和。

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年），一八八三年九

月生于俄国厄利萨佛特格勒。一九〇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善于政治投机，曾先后窃取了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伙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的理论，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把党关于起义的秘密暴露给敌人，列宁愤怒地斥责他们是工贼、革命的叛徒，并要求开除他们出党。列宁逝世以后，他们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季诺维也夫在其《列宁主义》一书中胡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产生的，并且只适用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否认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针对托派分子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攻击和歪曲，为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页）这个定义，首先明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指出了列宁主义是整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批判了托派把列宁主义歪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的谬论。其次，这个定义明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和意义。它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而不是俄国一国特殊的现象，它是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具

有国际意义的革命理论。斯大林批判了托派所谓列宁主义只适用于农民占多数的俄国的反动谬论。第三，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联系、指出了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最后，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策略。因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离开了列宁主义就是不可想像的。托派把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篡改为农民问题是荒诞无稽的。同时，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还总结了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等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列宁主义，粉碎了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的进攻。

(四)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托季反党联盟被粉碎

斯大林领导全党粉碎了托派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列宁主义，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一九二五年苏联国民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苏联经济建设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极大恐惧。国际资产阶级企图用经济上的封锁和政治上的孤立来扼杀苏联。国内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乘机捣乱。面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信心百倍地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宣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并确信只

要能够保卫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得逞，那么这种建设就可能而且也必将取得胜利。”这就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作为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下来。

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总代表托洛茨基却再一次跳出来，重新抛出反动的“不断革命”论来对抗党的革命路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则声言，苏联因技术上经济上落后而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样，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就在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苏联胜利的孟什维克观点上结合起来。十四次代表会议之后，他们把党的决议置之不顾，继续坚持和散布他们的错误观点，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路线。

为了粉碎托派的猖狂进攻，捍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和答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在一国胜利的问题。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到欧洲其他国家发生革命时同时取得胜利。他说：“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发生革命，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见《和平纲领》）。他还狡猾地把这种观点胡诌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斯大林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托洛茨基是“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称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勾当”（《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0页）。在自由

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还不突出，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突破的种种条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取得胜利，这是正确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剧烈，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能够迅速赶上和超过老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霸权，导致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深，并必然引起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又必然使它们互相削弱，从而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处在这个环节上的国家，如果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并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便可能首先在这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

托派为了给自己的理论作辩护，还硬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帝国主义时期更为剧烈。那时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取得胜利尚且不可能，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减弱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当然更是不可能的。因此托洛茨基编造出一个谎言，说什么“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托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前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不了解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意义，把帝国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均衡趋势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对立起

来，因而认为发展水平的均衡趋势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和平相处，不会爆发战争，这就滚到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第二，关于技术、经济落后的苏联能不能依靠本国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托派分子不仅一般地反对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而且顽固地坚持其反动观点，即认为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如果得不到经济发达国家的援助，决不可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6页）；“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见《我们的革命》）。斯大林尖锐地指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8页）斯大林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强大的工农联盟，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做基础，我们就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进一步指出，各国人民援助苏联的形式

是多种多样的，托派分子的错误是，他们只把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看作是援助，“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页）。

第三，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内部条件问题。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顽固地坚持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不可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否认工农联盟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力量和内部条件。他胡说小私有者的农民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因此，在无产阶级占少数的苏联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会由于没有同盟军而陷于失败。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充分论述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由于资本主义道路使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而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的生活普遍不断提高，因此劳动人民乐意跟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无产阶级也能够吸引劳动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部条件。斯大林还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农民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农民，不相信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问题正是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问题。托派分子还荒谬地把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说什么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拯救苏联，否则“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转引自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4页）。他们攻击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针对托派的谬论，斯大林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外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两个方面，即国内任务与国际任务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在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可能的，这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工农联盟，能够依靠国内力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社会主义，进行武装颠覆等反革命活动。因此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说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包围，扫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就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这种矛盾依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互相支援，才能取得。因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相互促进、互相支援的。这也是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斯大林从理论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这是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在这场斗争中，托派分子除了从理论上宣扬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外，还在工业化问题上向党发起进攻。

一九二五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但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产品占三分之二。工业技术陈旧，尤其是重工业很薄弱。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在联共（布）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他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贯彻执行这条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将使苏联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首先结成新反对派，跳出来向党进攻。他们集中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硬说苏联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硬说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单纯的退却，硬说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同盟者等等。他们主张苏联应当是一个农业国，主要出产原料和粮食以输出国外，并从国外输入它自己所不能生产的机器。

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与“新反对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新反对派”分子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线，通过了国家工业化的路线。大会以后，又粉碎了“新反对派”分子煽动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拒不服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阴谋活动，并撤销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领导职务，击败了“新反对派”的进攻。

“新反对派”分子失败之后，围绕工业化问题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又跳出来攻击党的总路线。其实他叫喊的还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老调。不过这次是以所谓“世界分工”论出现的。他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分工，苏联的经济是不能独立的，它“始终处于世界经济控制之下”，所以“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期自力

更生制造出全部机器或重要机器”，就是“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因此，他极力反对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主张把苏联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合起来”（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7页）。斯大林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的谬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输出输入，都需要互通有无。社会主义国家和外国虽然有贸易关系，但并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而托洛茨基“把我国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9页）。这将使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将丧失独立性，而这正是“资本主义豺狼的梦想，这种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9页）。

托派分子还从极左方面抛出了所谓“超工业化”的主张。他们装出一副激进的样子，叫嚷工业发展太慢了，要求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对农民实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以便取得“超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这实质上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子仍然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对农民采取敌对态度。按照这条路线，必然会造成农民破产、农业崩溃，必然会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到绝路上去。斯大林尖锐地指出：“超工业化”计划乃是一个破坏工业化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所以托派分子“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2页）。

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他们的进攻遭到失败之后，便力图联合起来。为此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由互相反对转到互相“赦免”，互相恭维。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曾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所犯的反对武装起义的投降主义错误，把他们称为党内的右派。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却忏悔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9页），并吹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党内的左派即革命派。本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写过一大堆小册子，申斥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发动的对党的进攻，季诺维也夫还说：“谁想现在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1页）。可是，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季诺维也夫却声明，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的反党活动是“正确的”（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8页）。他们还吹捧托洛茨基是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派。这样，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结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即所谓托季联盟。斯大林在论及这个联盟时指出：“反对派联盟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6页）。

托季联盟不顾党中央的屡次警告和广大党员的反对，继续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把锋芒对准了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斯大林，恶毒攻击斯大林是“庸人”、“独裁者”、“亚细亚的暴君”、“无赖”、“虐待狂”等等。他们

反对斯大林是为了反对党的列宁主义路线，是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推翻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在反对托派的斗争中斯大林总结了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他指出，反对派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是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而不是什么‘简单的’反对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他们的队伍基本上以前各色各样反党派别的骨干。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是“竭力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口号炫耀自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反对派的第三个特点是毫无原则性，他们象变色虫一样善变，时而极“左”，时而极右。“由于自己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抱怨别人不了解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实质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

斯大林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党内矛盾的阶级根源。他指出：“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斯大林关于党内路线斗争是党的发展规律的论述，教育了广大党员，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党内斗争的主动权，为彻底粉碎反党集团而斗争。

托季联盟失败以后，被迫退却。他们要求停止党内争论，实现党内和平；要求不要责备他们，而要搞好共同工作。斯大林及时地揭穿了他们的诡计，指出要中央停止揭露和批评托季联盟的原则错误是办不到的，如果他们愿意停止公开论战，就应当公开承认错误，放弃机会主义路线，解散派别组织。反对派为了欺骗群众，便装死躺下，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托季联盟的首脑一面向中央递交假检讨，表示今后一定要对党忠诚；另一面却继续秘密地保持他们的联盟，并在党羽中征收党费，散布政纲，私建印刷所。

一九二七年，托季联盟经过准备以后，又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政纲，即所谓“八十三人政纲”。他们把这个政纲散布到党员中去，并要求中央宣布举行新的全党争论。

同年十月十一日，即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全党的争论。为了使广大党员认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联共（布）中央把他们的一些文章、演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经过全党认真的、民主的公开辩论，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万四千党员。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人，不满百分之一。托季联盟眼看自己即将遭到可耻的失败，就决定孤注一掷。一九二七年庆祝十月革命节时，他们竟纠合了一小撮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示威游行，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托季联盟问题，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

维也夫两党籍的决议，并决定把托季联盟中的其他主要成员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开除出党，从而宣布了托季联盟的破产。

（五）各国马列主义者反对托派集团的斗争

联共（布）党内的路线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托派分子在联共（布）党内遭到失败时，他们又在其他各国托派的策应下，力图把斗争转移到其他共产党内。于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很快就变成国际范围内的路线斗争。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列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问题。托派以其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来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托派否认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事实，反对实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第三，关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问题。托派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反对在一定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联盟，硬要给民族解放运动涂上共产主义色彩。

第四，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托派口头上叫喊“党的统一”，实际上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要求党内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并企图成立第二党。

在这些问题上，托派的主张只能使革命队伍的思想混

乱，组织涣散，事业失败，他们的主张都是为着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各国共产党与托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击溃了他们的进攻。

德国的托派集团是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最有力的支柱，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他们的主要托派观点是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工会，反对党在革命暂时低潮时期，利用工会进行争取教育群众的工作。他们认为群众是被动消极的，是不可能争取的。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共产国际“五大”在《策略问题》的决议里批判这个托派集团时指出：“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工会的运动本身包含着对共产国际的极大的危险，对那种想使共产党人退出工会从而有利于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倾向，如果共产国际不一再给以坚决回击，我们就永远不能建立起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文件汇编》）

经过激烈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德国共产党把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成员开除出德共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进一步决定把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等人开除出德国共产党。

法国共产党内托派的代表人物是鲍里斯·苏瓦林。他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自托洛茨基开始向党进攻时起，就一直站在托派一边，反对联共（布）党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他在法共内部大搞分裂活动，纠集党内右翼分子支持俄国托派和德国布兰德勒右翼集团；赞成并支持英国工党政府。法国共产党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向共产国际

“五大”提出开除苏瓦林的要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把苏瓦林开除出共产国际。

托派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坎农。在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托洛茨基已成为一个反革命罪犯而被流放了。托洛茨基向大会呼吁，要求大会撤销联共（布）和苏联政府对他的处置，大会严正地驳斥了这一无理要求。但是托洛茨基的无理要求却受到了美共代表坎农的支持。坎农回国以后立即纠集一部分人进行托派宣传，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反对联共（布）党，主张退出现有的工会和放弃统一战线，并在党内大搞宗派活动。毕特曼、福斯特等人发觉这种情况之后，就对坎农等托派分子进行揭发，并把他们清除出党。

托洛茨基在其反革命的活动中曾经多次吹嘘他的“不断革命”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妄图把它强加于中国革命。斯大林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托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彻底批判了他们的反动谬论，捍卫了列宁主义，捍卫了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认为：“在中国，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已经没有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已经同资产阶级剥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土地问题所占的比重”是无足轻重的，无需经过民主革命阶段（见《〈不断革命〉论》）。这就是说，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要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批判了这种谬论，他指出：“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

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9页）“反对派糊涂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竟否认中国革命发展有任何阶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页）斯大林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托洛茨基胡说：“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1—262页）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残余是想象出来的，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只配放在引号里，所以中国革命的主要东西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关税革命。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只有微不足道的反帝任务，没有反封建任务。斯大林举了大量的生动的事实驳斥了托洛茨基的无耻谰言。他进一步指出：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4页）

托派分子还反对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托洛茨基说：“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相互敌对，就一般可能讲将要比俄国当时为更不可能调和之状况。”（见《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托派分子断言：在中国，与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容许的。斯大林指出：“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把俄国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中国这个被压迫的、不得不反对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

的革命混为一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2页）反对派不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背弃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

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托派分子和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建立了托陈取消派。他们顽固地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鼓吹取消主义。他们胡说，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得到了胜利”，封建势力已经“变成残余之残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必须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痛斥了托派分子的这种谬论。毛主席指出：“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46页）针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54页）

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批判击中了托洛茨基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的要害，粉碎了他们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中国托派失败之后，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他们的反革命工具。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托派接受托洛茨基匪帮的“不阻遏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本侵略者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完全成为可耻的汉奸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走

狗。

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仍死心塌地坚持反共反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立场。为此，于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苏联，一九三二年被取消苏联公民权。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一伙的反党叛国阴谋被彻底揭露，查明：托洛茨基早就伙同布哈林等勾结社会上阶级敌人阴谋暗害列宁，里通外国，出卖情报，干了大量凶杀、破坏的罪恶勾当；被开除出党后，他和季诺维也夫勾结其他反党力量，组织了所谓“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暗杀集团，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革命夺权。但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终于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法庭通缉拿办。季诺维也夫被判处死刑。

一九三八年九月，托洛茨基纠集了欧美一些国家的托派分子于巴黎拼凑成立了一个与共产国际相对抗的反革命组织——“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并通过了主要是由托洛茨基本人起草的“过渡纲领”。一九四〇年托洛茨基死后，“第四国际”仍然残存到今日。它自称在三十多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支部”，但是实际上这些所谓“支部”只是由一小撮托派分子组成，没有什么群众基础，在本国政治中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各国托派龃龉不和，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他们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是继承托洛茨基的衣钵，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套反革命理论，鼓吹“世界革命”，抽象地“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帝国主义”，仇视各国的马列主义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来，他们利用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运

动，大肆活动，极力为托洛茨基翻案，恶毒诋毁斯大林，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些新老叛徒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这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反动本质，进一步擦亮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眼睛。

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第一次大的路线斗争，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在无阶级专政条件下发生的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充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说明当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之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又企图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和平瓦解。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老资产阶级之外还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篡夺了党和国家部分权力的托洛茨基，正是适应着帝国主义和新老资产阶级的需要，来蓄意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恶毒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其罪恶目的则是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今天学习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历史，深入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学好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史，对于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尤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而更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 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反党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后，接着又投入了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布哈林是隐藏在联共（布）党内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领导核心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投降派。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许多关键时刻，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年中，布哈林散播了大量的修正主义言论，形成了布哈林主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布哈林主义便成为联共（布）和第三国际的主要危险。

布哈林继承考茨基的反动衣钵，采用折中主义手法，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大肆鼓吹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以此反对联共（布）关于消灭富农、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其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妄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布哈林还大肆贩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宣扬帝国主义各国内部已经消灭了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这实际上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翻版，其要害是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布哈林主义代表着帝国主义和苏联国内的新老资产阶级妄图颠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要求，也反映了国际资产阶级妄图瓦解工人运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强烈愿望。布哈林是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曾多次批判了布哈林的修正主义观点和路线，当布哈林主义成为联共（布）和第三国际的主要危险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布哈林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粉碎了布哈林反党集团，清算了布哈林主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反对布哈林主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使苏联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不很长的时间内一跃而成为工农业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后来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基础。反对布哈林主义的胜利，也进一步巩固了第三国际，纯洁了党的队伍，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一）布哈林反党集团的出现和危害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国际形势迅速变化，资本主义在渡过了暂时局部的稳定期之后，又面临着一场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全世界的工人运动逐步由低潮走向高潮。各国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苏联在国际上的威望日益增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

地之间、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深化。随着这些矛盾的深化，帝国主义为镇压各国的工人运动，削弱共产党的影响，巩固其反动统治，发出了一片反苏叫嚣。他们妄想孤立苏联，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各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则同他们里应外合，密切配合，掀起了反苏反共的大合唱。

在此期间，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

一九二七年，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中央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反党联盟，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已经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正在迅速向前发展。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工业生产相比，出现了不相适应的状况，特别是粮食的生产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造成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基础是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而富农在农村的破坏活动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很明显，不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能前进。因此，在一九二七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同时决定加强对富农的进攻，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了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抗。在农村，富农拒绝出卖粮食给国家，破坏生产，减少播种面积，暗杀集体农民和农村中党、政工作干部，放火烧毁集体农庄和国家谷仓。在工业部门，资产阶级的反动上层，也积极从事破坏和暗害活动。在机关中，

暗藏的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对苏维埃的各种革命措施实行怠工甚至进行破坏活动。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又在迅速激化。

国际国内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在共产党内部反映出来，布哈林反党集团的出现，就是这种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布哈林反党集团的出现，在国内反映着富农和一切垂死阶级的反抗，在国际上则反映了帝国主义妄图颠覆和破坏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年），是联共（布）党内和第三国际组织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投降派。

布哈林生于莫斯科的一个数学教师的家庭，早年就学于莫斯科大学，一九〇六年混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一年他从流放地逃赴欧洲。一九一二年他与列宁认识后，参与了布尔什维克党《真理报》的编辑工作。一九一六年布哈林在纽约参加俄文报《新世界》编辑部工作。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他从美国回国，先后窃取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一九一七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三年起）、《真理报》主编（十月革命后开始）、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一九年起）和主席（一九二六年起）等要职。

布哈林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布哈林“政治上极不坚定”（《给亚·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六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0页）。他以理论家自称，

但“他的理论观点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还大可怀疑”，“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懂得辩证法”（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62页）。

长期以来，布哈林一直歪曲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逐渐形成了布哈林主义，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以前，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一五年二月，在瑞士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布哈林抛出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提纲，即所谓《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和策略的提纲》。在提纲中，布哈林表面上赞成列宁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又鼓吹用“争取和平”的口号来补充“国内战争”的口号，而且反对列宁提出的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使本国政府失败的主张，胡说这会使党脱离群众。布哈林的这些谬论，实质上是反对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提纲中，布哈林还否认俄国有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他胡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谈不到进行什么民主革命，他认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相容，反对列宁关于在俄国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以此破坏俄国革命。列宁痛斥布哈林的这个提纲是一个“荒谬绝伦；无耻之极；半无政府主义”（《给亚·施洛普尼柯夫》，一九一六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0页）的提纲。

一九一六年，布哈林在《青年国际》上抛出了一篇关于

国家理论的文章。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在这里，布哈林鼓吹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内。列宁在当时写的《青年国际》一文中对布哈林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列宁说，“无政府主义者想‘取消’国家，把它‘炸毁’”，而布哈林却“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6页）。列宁还揭露布哈林歪曲恩格斯的话，鼓吹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就会“消亡”。布哈林的这些修正主义国家理论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二月革命后，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又跳出来反对列宁关于俄国应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他胡说帝国主义资产者已经同农民结成了联盟，农民不会跟着无产阶级走。他认为农民得到土地后就心满意足了，第二阶段的革命，只能是在西欧的支持下，实行没有农民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在会上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布哈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缺乏阶级分析，没有看到：虽然富裕农民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但贫苦农民是会跟着无产阶级走的。布哈林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否认工农联盟，同托洛茨基的观点完全一样，要害是反对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学说。

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观点和路线集中到一

点，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一八年初，列宁从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出发，决定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德帝国主义面前实行暂时退却，与其签订和约，那怕是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以争取一个暂息时机，恢复国民经济，建立革命军队，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布哈林伙同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组织了一个名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反党宗派集团，他们同托洛茨基紧密配合，疯狂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鼓吹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恶毒污蔑列宁的主张是“和帝国主义勾结”。列宁尖锐地指出：“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布哈林一伙的罪恶目的正是妄图借德帝国主义之手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

布哈林一伙在反对列宁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同时，还针对列宁的主张，反对引导人民群众认识资产阶级法权并抵制其腐化作用，以便任其泛滥，从而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改革了工资制度，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的工资水平。但为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技术，一九一八年春对他们实行了高薪。列宁认为“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2页），并且强调要警惕这种“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会“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影响到工人群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3—504页）。布哈林一

伙却竭力否认这一点，他们胡说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转引自《列宁选集》第3卷第548页），列宁指出：“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墜落到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2—503页）。列宁的话正好击中了布哈林一伙的要害。他们力图隐瞒这一点，正说明他们是一伙资产阶级政客，他们妄图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一九一九年三月，布哈林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就公开叫卖“唯生产力”论，胡说什么“当我们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种白菜，否则我们要饿死。问题就是这样摆着……。”（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一九年，当苏维埃俄国正同帝国主义策动的十四国武装干涉进行着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时，布哈林却在《共产主义入门》一书中，竭力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将不经过任何革命而转入共产主义”，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别有用心地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他打着“组织生产”的旗号（见《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主张在工会工作中采用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来对待工人群众，妄图制造党与工人群众的对立，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托洛茨基在组织上还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列宁和俄共（布）中央同托洛茨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狠批了他的种种谬论。这时，布哈林却拼凑了一个所谓“缓冲”集团，他打着“公正”

的招牌，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发表了题为《论工会的任务与结构》的反动纲领，他采用折中主义的手法，帮助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布哈林说什么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托洛茨基则是从“经济上”看问题，似乎双方各有道理，各有片面性，以此抹煞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列宁严厉驳斥了布哈林的折中主义谬论，深刻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页）。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布哈林“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28页）。这个所谓“缓冲”集团，不久就公开转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他们联合提出了一个《职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草案）》，反对列宁，反对党的路线，其目的也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二一年，布哈林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全面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大肆贩卖“阶级合作”论和“唯生产力”论。这是他在以后的年代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路线，并继续叫卖“唯生产力”论、胡诌“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从一九二二年起，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布哈林大搞政治投机，他表面上站在斯大林和联共（布）

中央一边反对托洛茨基，实际上却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下，疯狂地兜售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逐步形成布哈林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核心，在国内方面，就是推行布哈林所捏造并大加宣扬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主义和城乡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如果说托洛茨基否认贫农、中农与富农的区别，一概否认农民能够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并主张革农民的命；布哈林则是否认富农与贫农的本质区别，宣扬富农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说：“我们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不在于主张还是反对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时候长入的问题”。“修正主义者……断言这种长入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开始了。而我们认定它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才开始”。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布哈林在共产主义学院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报告中，歪曲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一步提出所谓“工人革命胜利之后长入社会主义的学说”。他胡说什么“一般说来，‘长入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是我们十分仇视的术语”，但是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就开始了真正的长入社会主义”。

一九二五年，布哈林发表《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这一黑书，更加露骨地宣扬“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熄灭”论等谬论。他说：“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

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同年四月，布哈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题为《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鼓吹发展富农经济，鼓吹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和物质刺激等谬论，攻击党“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过分热衷于压制富裕农民”。他叫嚷“必须取消对富裕农民……的许多限制”，并提出“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的修正主义口号。布哈林还鼓吹：“我们要不断关心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即小业主的利益。这丝毫不用害怕，因为，归根到底，农民由于自己经济的发展，将会使自己本身和他的经济变成我们全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小部分，正如同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长入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系一样。”

一九二七年底，联共（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并加强对富农的进攻以后，布哈林这伙富农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便再也忍耐不住了。布哈林伙同李可夫（当时窃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托姆斯基（政治局委员、工会负责人）等组成了新的反党集团，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妄图改变十五大确定的政治路线，推翻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同布哈林反党集团的斗争，便成为继反对托洛茨基反党集团之后的又一次

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苏联党和国家命运，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必须彻底批判布哈林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粉碎布哈林反党集团，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保卫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斯大林和联共（布）反对布哈林集团 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底，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由于当时全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彻底粉碎和清算托洛茨基反党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对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批判。十五大以后，由于托洛茨基反党集团已经被粉碎，布哈林一伙结成了新的反党集团公开跳出来攻击和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因而布哈林主义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成为“党内右倾的旗帜，成为机会主义的旗帜”（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页）。反对布哈林反党集团的斗争也就成为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当时的首要任务。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斯大林的《致中央政治局委员（答弗鲁姆金）》一文揭开了联共（布）反对布哈林主义斗争的序幕。弗鲁姆金当时是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他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给党中央的信中，抓住由富农的疯狂反抗等原因造成的粮食问题上的暂时困难，把苏联国内的形势描绘

成一团漆黑，似乎苏维埃政权已经到了末日，国家已经濒于绝境。他把富农的反抗说成大多数贫农和中农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情绪，说“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说“这种情绪已经开始渗入工人中心”。他恶毒攻击十五大确定的党的路线，胡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对农村采取的新的政治方针加剧了我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他提出党应当“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要党抛弃“更坚决地向富农进攻”的政策，抛弃农业集体化的任务。他胡说“宣布富农为非法引起了全体农民的不法行为”，叫嚷“我们不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2、103、232、105、108、235页）等等。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弗鲁姆金的这封信完全是企图把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一系列最重要问题的决议都化为乌有”，“弗鲁姆金的信是一封要求宽容富农、取消对富农的限制的申请书”（《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答弗鲁姆金）》，《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07、110页）。

弗鲁姆金的观点正是布哈林一伙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后来弗鲁姆金在引用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的机会主义观点时就声明过：他和布哈林的观点是一致的。在一九二八年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以前，布哈林一伙在关于工业发展的速度，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关于对私人贸易自由的限制，关于对富农的非常措施等问题上，就反对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中央七月全会的斗争，布哈林一伙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赞同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一致通过了有关决议。但实际上他们继续反对党的路线。九月，

布哈林抛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一反党黑文。正如斯大林指出的，这“是一篇反党的折衷主义的文章，它指望减缓工业发展的速度并按照大家知道的弗鲁姆金那封信的意见来改变我们党的农村政策”（《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6页）。与此同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为了迫使党改变路线，竟以辞职相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上发表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演说。他指出，“右倾问题是关于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规定的发展前途是否正确的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3页）他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它的表现是“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右倾问题的实质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当时，斯大林在演说中还没有点布哈林一伙的名。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召开了十一月全会，经过斗争，布哈林一伙又一次玩弄两面派手法，表示同意中央的路线并收回辞职声明。但会后，他们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至二月初，联共（布）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最终查明

了布哈林一伙组成秘密反党集团的事实，查明了布哈林于一九二八年七月背着党与加米涅夫进行幕后谈判、以便组织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来反对党中央的事实。斯大林在会上作了题为《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报告，第一次在全党公开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主义和布哈林反党集团的罪行。

就在这时，布哈林等人的反党活动更加嚣张，他们重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陈词滥调，恶毒诬蔑党中央“没有民主”、“培植官僚主义”、“党内制度已令人不能容忍”等等，并且他们还装出“受屈”的样子，恣意诽谤党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恶意攻击”（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号增刊第61页）。

为了彻底粉碎布哈林反党集团，一九二九年四月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揭露与批判了布哈林主义和布哈林反党集团的罪行。斯大林首先揭露了布哈林分子的无耻反党伎俩，揭露了布哈林分子关于不存在路线分歧的虚伪言词，并指出了分歧的实质所在。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

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页）

接着斯大林对布哈林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对布哈林反党集团的批判，首先指向布哈林一伙反对党的进攻富农的政策。

俄国的富农，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它在政治上极为反动。十月革命以前，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它是地主阶级政权在农村中的重要支柱。革命胜利后，它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主要代表者，它对苏维埃政权极端仇视。正如列宁所说：“富农暴动遍及全国。富农咬牙切齿地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斩尽杀绝。”因此，“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大战》，《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38页）。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富农就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到处制造暴动事件，妄图用反革命暴力一举推翻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利用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当时富农提供的商品粮占商品粮总数的20%，而且富农手里还掌握着相当多的存粮），多次制造粮食危机，妄图借此搞垮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在一九二七年，他们再次制造粮食危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公然拒绝把粮食出售给国家。富农在粮食战线上向苏维埃国家发动的进攻，使红军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布哈林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富农阶级的忠实代理人。

布尔什维克党为了打退富农在粮食战线上的进攻，一九

二八年实行了一些非常措施以打击富农的反抗和破坏活动。国家以强迫手段向富农收购粮食，把违法的富农送交法庭审判，同时没收其粮食。

党对富农实行的非常措施，对富农的打击，使布哈林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感到切肤之痛。他们恶毒攻击党对富农展开进攻的政策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5页），他们大叫大嚷地吓唬党说，对富农的进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他们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恢复和扩大富农经济。因此，他们要求宽容富农，不要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他们还胡说，只要向富农让步，粮食问题就可以解决。

斯大林痛斥了布哈林等人的荒谬主张，指出：苏维埃要解决粮食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而绝不能依靠富农经济，决不能走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对于布哈林一伙鼓吹宽容富农和“不妨碍富农经济”的主张，斯大林尖锐地指出：“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6页），也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了解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死敌。他们不了解实行宽容和放纵富农的政策就是使我国整个政治状况恶化，使国内资本主义分子更有

机可乘，使我们失去乡村的贫农，使中农灰心丧气，使我们和我国工人阶级决裂。……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都同列宁政策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原理绝对不相容”（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7页）。

布哈林作为富农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还竭力歪曲联共（布）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胡说新经济政策就在于“开辟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他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对富农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实行的种种限制，叫嚷要“保证农村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见《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私人贸易完全自由”，使市场“常态化”（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4页），也就是要完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市场和贸易的管理和限制，使市场完全资本主义自由化。他还主张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还在一九二三年四月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列宁就针对这一主张痛斥过布哈林，说他是“搞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290页）（“耐普曼”是俄文译音，指新经济政策实行期间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斯大林驳斥了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无耻歪曲，指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和党在国内战争以后为了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巩固工农联盟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的特殊政策；新经济政策虽然允许私人贸易的某种自由，但它“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而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

贸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0页）。联共（布）采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相反。斯大林指出，如果按照布哈林的主张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市场的领导作用，放弃价格政策，使市场完全资本主义自由化，实质上是把苏维埃俄国推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结果必然是“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只会有利于城乡富裕阶层，……占便宜的是富农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阶级”（《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2、43页）。斯大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3页）正象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如果让自由贸易泛滥成灾，“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6—507页）。很明显，党绝不能走这条复辟资本主义的死路，绝不能放弃国家调节贸易的政策，必须对城乡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坚决斗争。

布哈林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替富农和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打掩护，反对党的路线，大肆贩卖布哈林早就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以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对抗。这个理论的中心内容就是鼓吹富农、资本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宣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下层组织的巩固”，“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

第33页)。布哈林说什么富农的合作社所以能“经过银行等等长入”社会主义体系中去，是因为“富农合作社，如果要得到发展，同样必须象其他一切合作社那样，与国家经济机构联结在一起”，“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样富农就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见《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因此，他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要“宣传内战”，而要宣传“国内和平”（见《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

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集团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布哈林的“和平长入”论作了有力的批判。

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指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页）斯大林接着说，正是因为这种不可调和性，所以，在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特别是现在，在我们向阶级敌人展开进攻的时候，由于阶级敌人的拚命反抗，阶级斗争不但没有消灭，而是更加尖锐化了。接着斯大林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并论述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指出，“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生活：是我们把他们资本家打倒，……还是他们把我们打倒”；“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4—35页）。因此，这些反动阶级必然要进行垂死的挣扎，以保护自己的生存，不管下层苏维埃机关是好是坏，敌人的反抗是客观存在的，

他们是不会停止这种反抗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会终止的。如果按照布哈林的理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反动阶级的反抗正在减弱，剥削者正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么，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进行斗争呢？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采取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呢？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但是既然城乡资本家，既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会长入社会主义，那么，一般说来是否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如果需要，那是为了镇压哪一个阶级呢？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中指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没有这种利益的对立性，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的协调。”（《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页）他接着说，如果认为由于我们的前进，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一切阶级可以在一个早上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怀抱，这种神话是根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斯大林继续说：“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页）

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布哈林一伙鼓吹富农、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谬论的实质，他说，布哈林集团鼓吹这种谬论的目的就在于同富农阶级结合，用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代替党的革命政策，用“和平长入”论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阶级斗争理论。斯大林强调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页）布哈林的资本家、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页），也就是便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当布哈林一伙所鼓吹的“和平长入”论被批判得臭不可闻以后，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又大肆贩卖所谓的“平衡”论。这种理论主张：社会主义的大工业与个体小农经济长期同时存在，共同向前发展。他们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好象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等到它们相交的时候，就“有了”社会主义。

这种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不过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翻版。

对这种“平衡”论，斯大林批判说：“在这两个所谓‘箱子’后面站着阶级，而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页）。“平衡”论的鼓吹者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企图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寻找一条根本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斯大林指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

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页）。斯大林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走第一条道路，或者是走第二条道路，或者是向资本主义倒退，退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向前进，进到社会主义。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平衡”论的鼓吹者所幻想的第三条道路是想要苏联从农业集体化再回到个体经济去，不过不要地主和大资本家，只容许富农和小资本家作为苏联经济制度中的合法现象而存在。斯大林指出：“其实，这并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第二条道路，即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7页）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批判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这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既然农村可以自发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小农经济的农村同样也可以自发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此不必为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操心。其实，这种理论同样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谬论的翻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在分析批判这种理论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是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个体经济基本上是一类型，都根植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是社会主义生产，农村是个体经济，它们不是同一类型。尽管社会主义城市对个体小农经济的领导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但是农

村却不会自发地跟着城市走，因为农民会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2页）斯大林还说，尽管苏维埃制度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提供了可能性，但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它变成现实，就必须抛弃机会主义的“自流”论，无阶级社会是不会按照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展开阶级斗争、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鼓吹“自流”论的实质是企图给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提供一种新武器用以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党向富农进攻的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斯大林指出：“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因此，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如果不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就等于取消革命，瓦解社会主义建设，使资本主义复辟。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为了捍卫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鉴于布哈林集团一再对党玩弄两面派手法，进行反党派别活动，联共（布）中央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全会决定撤销布

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严重警告了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责令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党的路线和决议的活动。但是，布哈林集团的头子们，却不顾党的一再警告，仍在暗中煽阴风、点邪火，继续从事反党的罪恶勾当。在这种情况下，联共（布）中央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召开了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清算了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罪行，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布哈林反党集团发动的猖狂进攻终于被彻底粉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基本完成了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第三国际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机会主义思潮，流毒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危害作用。

如果说布哈林主义在苏联国内的主要表现是推行布哈林所捏造的富农、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那么在国际上的主要表现则是大肆贩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这种谬论主要是鼓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消灭了竞争、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而被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代替，这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变种。这种论

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布哈林的这一谬论也是由来已久的，早在一九一五年他写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和一九一六年写的《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中，就已表露出来。他当时名曰批判考茨基主义，实际上却变相地抄袭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提出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消除了竞争的谬论。他胡说“单个的资本家正在消失，正在变成集体资本家，成为组织的一员，不同本国的‘同乡’竞争了，而同他们合作，因为竞争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世界市场上，而在国内，竞争正在消除。”（见《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

一九一七年夏，布哈林在《斯巴达克》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谬论。他说：“先前分散和无组织的资本主义正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代替。”他认为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国内已经消灭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一九一九年三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谬论。他说：“在战争的影响下”，“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在各别国家中由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所代替”，“随着经济矛盾的消失不见，在各别国家中，分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随后，布哈林在一九一九年底写的《共产主义入门》和一九二〇年写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谬论。他胡说，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资本的积聚和集中逐渐消灭了竞争”，“生产是有组织的，资本家与资本家不角逐，不竞争”，“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从不合理的体系成为合

理的组织”，“金融资本消灭了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等等。

一九二三年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暂时走向低潮，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暂时稳定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更加露骨地鼓吹上述谬论。一九二五年，他发表了《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一书，胡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这里没有危机，因为已经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只有合理的计划。”

由于布哈林窃据第三国际的要职，他大肆贩卖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也先后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如德国的布兰德勒之流、捷克的伊列克之流、美国的洛夫斯顿之流、法国的薛列之流、瑞典的启尔明之流、意大利的谢拉之流、瑞士的洪别尔——德罗之流等。他们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相呼应，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稳固”论和“健康化”的谬论，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破坏国际工人运动。但是，机会主义总是要在事实面前碰壁的。

一九二八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在经过了五年的相对暂时稳定之后，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国际工人运动这时也由低潮逐步走向高潮，形势的发展对无产阶级十分有利。在这种形势下，第三国际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份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利用他窃取的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权，抛出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在这一提纲中，布哈林依旧胡说什么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内

部矛盾日益缓和，目前没有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资本主义的稳定是持久的、巩固的，以此美化资本主义，破坏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针对布哈林的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纲，联共（布）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逐一批判了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最后，第三国际六大指出，目前国际工人运动已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矛盾加深，相对稳定局面动摇，新的革命高潮日益增长的时期，因此各国共产党应该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这样，布哈林妄图把他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便未能得逞。

当时，布哈林在国际上的追随者、第三国际主席团成员谢拉（意大利）、洪别尔——德罗（瑞士）等人积极配合布哈林反对“六大”关于资本主义稳定性正趋于动摇和瓦解的论断，说什么当前的斗争已经不是处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瓦解时期，“相反地，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和国家政权的巩固时期”（洪别尔——德罗）。他们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事实。洪别尔——德罗在一次演说中把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说成是自发的，基本上只带有防御的性质。因此，他们主张只应在现有的改良主义工会范围内领导这一斗争。

对布哈林之流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四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上进行了严肃的揭露和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在动摇着还是在巩固着，——共产党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针都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我们现在是处在革命运动低落的时期即单纯聚集力量的时期，还是处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

日益增长的时期即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阶级战斗的时期，——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照布哈林的提纲说来，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相反地，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当巩固。”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页）斯大林指出，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变动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页）。

斯大林还批判了洪别尔——德罗的谬论，指出，各国共产党人应当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但是决不当把群众工作局限于改良主义工会的规范和要求，否则，就是要共产党去扮演无产阶级斗争消极观望者的角色，就是放弃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联共（布）通过了一个《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决定撤消布哈林在《真理报》和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担任的领导职务。死不悔改的布哈林，两个月后又发表了《有组织的经营不善论》，仍然坚持他的反动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稳固论。但是，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斯大林的科学论断，从一九二九年起，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政治、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铁的事实把布哈林之流的谬论击得粉碎。

布哈林的追随者、第三国际主席团成员之一谢拉（意大利）也无悔改之心。他竭力为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辩护，说“富农的危险不是什么致命的危险”。他认为目前对富

农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定义，认为“俄国大部分富农的收入，还不超过我国（指意大利）中农的收入”。

布哈林之流还公然违背第三国际“六大”关于同右倾以及调和态度作斗争的指示，积极支持德国共产党内的布兰德勒、捷共党内的伊列克、美共党内的洛夫斯顿、法共党内的薛列、瑞典共产党内的启尔明等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进行派别活动和分裂党的活动；支持他们反对第三国际“六大”的路线；支持他们篡党夺权，破坏工人运动。

一九二九年七月，第三国际召开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展开了反对布哈林右倾集团及其在第三国际中的追随者的斗争，批判了布哈林主义的种种谬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指出：“跟联共（布）的路线相对立”，布哈林“提出另一条路线，一条反对对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进攻、否认必须加强跟富农作斗争……对资本主义分子投降的路线”。全会还指出：“联共（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进攻，乃是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一个因素，而布哈林……等人则低估了这个因素的作用，这实际上便为整个第三国际的右派分子的政策奠定政治思想基础”。全会还指出，为了反对党的路线，布哈林竟堕落到从机会主义立场出发来否认资本主义稳定已日益动摇这个事实，因而又势必要否认革命工人运动的新浪潮的日益高涨。从这种立场出发，布哈林提出了他的所谓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趋于缓和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在所谓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仅仅存在于世界市场这类词句的掩盖下来偷运这种理论。这种作为第三国际一切右派分子的思想基础的“理论”，正在被资本主义整个发展情况所推翻，它实质上是向改良主

义思想意识（希法亭的“资本主义健全”的理论）的投降。全会还指出，布哈林的《有组织的经营不善论》这篇文章表明，他非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缓和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不断加深自己的错误。

第三国际第十次全会对布哈林集团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坚决斗争，对于肃清布哈林主义的影响起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布哈林集团的这些反革命活动严重地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上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肯定了联共（布）所通过的关于撤消布哈林在第三国际中的领导职务的决议的正确性，决定解除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主席的职务，并且把布哈林的追随者谢拉、洪别尔——德罗等人一并开除出共产国际主席团。

在第三国际和联共（布）的坚决斗争下，布哈林集团及其在国外的追随者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四）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斗争的胜利，布哈林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布哈林反党集团在被揭露和批判后，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便采用更加阴险、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暗中进行其反革命复辟活动。

在一九三四年联共（布）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了悔过的声明，他们一方面说自己犯了错误，拚命地责骂自己，给自己扣上许多帽子，另一

方面又用一切最华丽的言词过分地颂扬党，把党所取得的成绩吹得天花乱坠，以此来掩盖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就在他们作这种虚伪而又丑恶的表演的时候，一个更加毒辣的罪恶阴谋，就在他们之中进行了。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布哈林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秘密勾结，组织了秘密的“列宁格勒总部”和“莫斯科总部”，专门从事暗杀联共（布）党的领导人的勾当。首先是企图暗杀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基洛夫同志被托布秘密恐怖集团凶恶地杀害了。无耻的是：这伙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却公然在基洛夫死后写了颂扬死者的祭文，还要求把祭文公开发表。

托布匪帮所进行的穷凶极恶的反苏维埃政权、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激起了联共（布）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三六年托布匪帮集团被破获，苏联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并对这伙恬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彻底清算了他们的滔天罪行。一九三八年布哈林等人被处以极刑。这伙杀人犯、卖国贼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从列宁、斯大林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布哈林这伙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投降派，总是千方百计维护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保证农村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他们采用折中主义手法，把政治

同经济平列起来，等等，都是为了维护和扶植新老资产阶级反动势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历史证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布哈林反党集团虽然被粉碎了，但是，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苏联人民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苏联国内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更没有结束。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修叛徒集团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继承了布哈林的反动衣钵，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竭力宣扬什么在苏联已完全消灭了剥削和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他们进而打起“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幌子，实行资产阶级统治，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变成了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当然，这种历史大倒退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它绝对改变不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转引自一九七〇年《红旗》杂志第5期）

中国的刘少奇、林彪之流，也打着“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破旗，贩卖“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等黑货，妄图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结 束 语

一百二十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不断战胜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还提出了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论断，是对我党历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高度概括。认真理解和掌握毛主席有关路线斗争问题的论断，特别是“三要三不要”的教导，是我们学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指导原则，也是我们进行路线斗争的锐利武器。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用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我们要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同党内资产阶级，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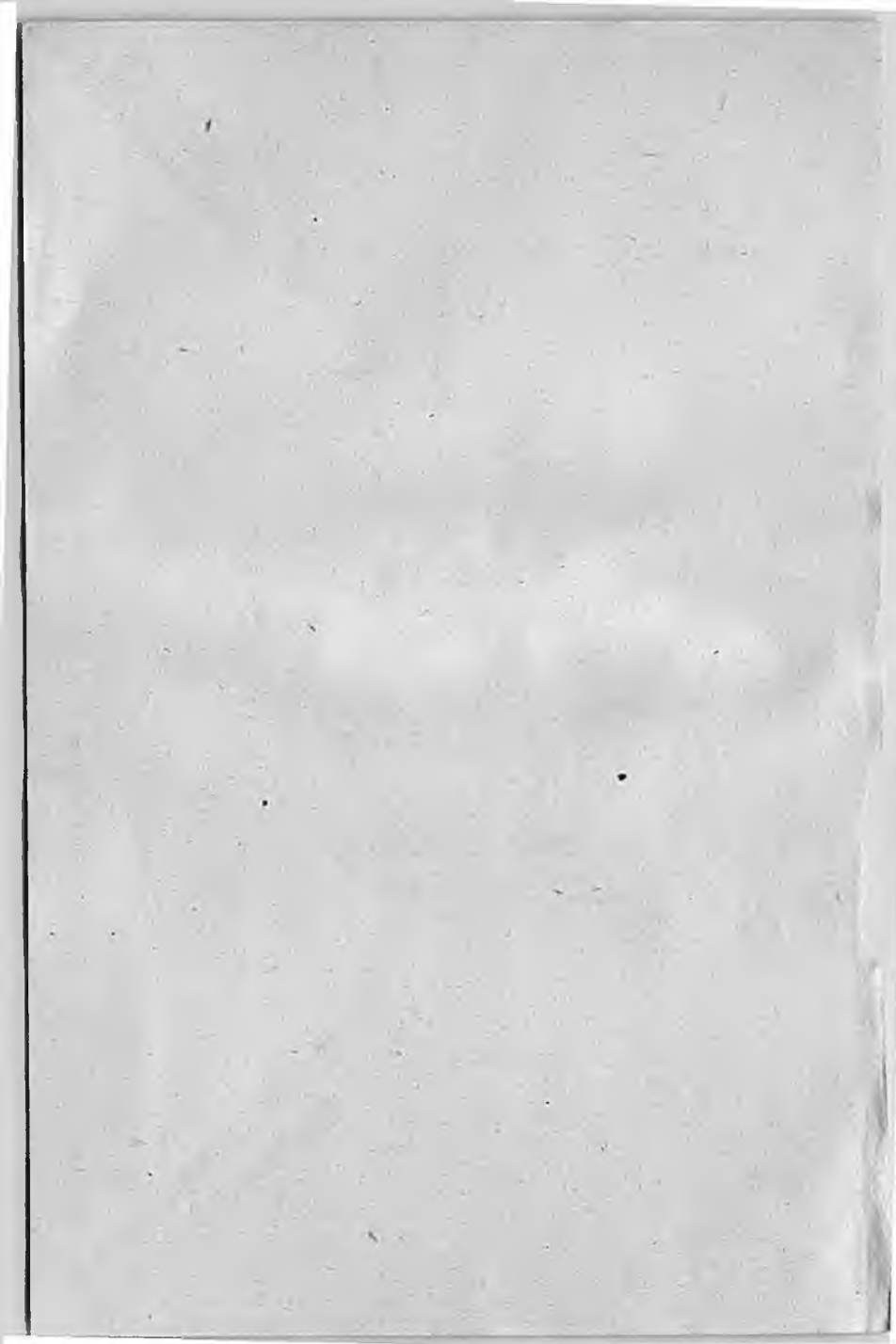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两条路线斗争简史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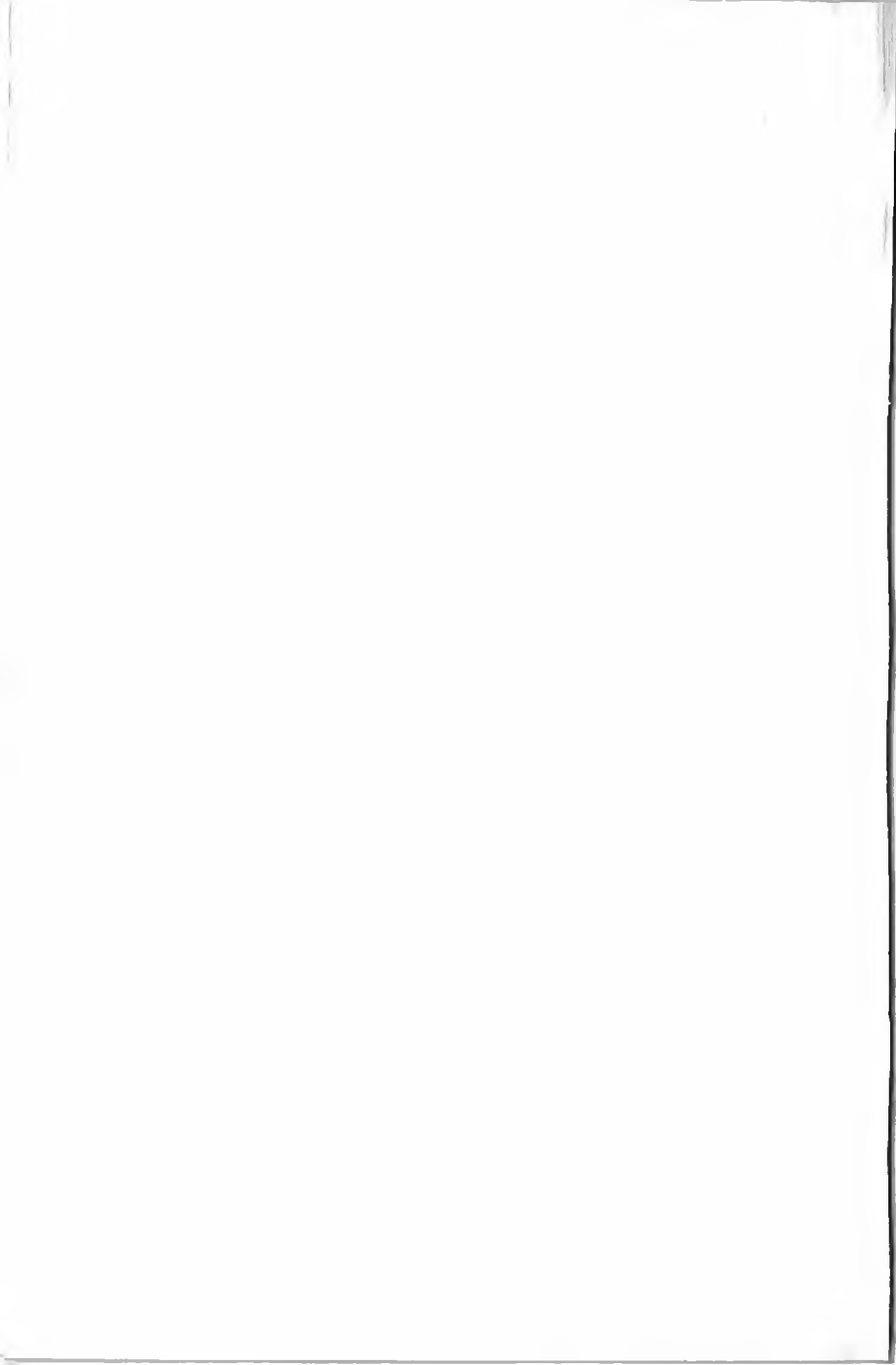
*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78,000字
1978年7月第1版 197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071·88 定价：0.53元





书 号：11071·88

定 价：0.53 元